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双月刊·2023年第5期(第34卷)

学报编辑委员会

主任：罗日新

副主任：邓路遥 梁经成 黄龙杰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路遥 农祖荣 许立坤 吴红博 吴强 何文钜 何绍红

罗日新 岳劲 黄龙杰 梁经成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

双月刊

(1996年创刊)

第34卷 第5期

2023年10月18日出版

主管、主办单位: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主编:梁经成

副主编:何文钜

编辑部主任:杨绪强

地址:南宁市西乡塘区新村大道6号

邮政编码:530007

电子信箱:GXSYXB@163.com

访问网址: <http://www.gxsy.org>

电话:0771-2381657, 3891622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033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250/D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

印刷单位:广西汇望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10.00元

目

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探赜

..... 张 艳,程静强(5)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价值旨归、实践效能与创新路向

..... 谢鑫辉,李效东(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三重向度

..... 廖小明(22)

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与发展路向——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视角

..... 黄 磊,黄会奇(29)

统战理论与实践

大统战工作格局视域中的人民政协:功能角色与路径探索

..... 康晓丽(36)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 张佳慧(43)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历史探索及其实践要求

..... 辛 岳(50)

政党制度研究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探究——以广西为例

..... 张淑瑛(57)

录

民族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探究
..... 陈 力(62)
- 左江花山岩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一
..... 覃彩銮(71)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
..... 阳菲菲(78)

宗教研究

- 高校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价值探析
..... 林怀艺(83)

中华文化研究

-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发展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实践——以思恩府为例
..... 赵乃蓉(9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

-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发展及经验研究
..... 阳 阳,覃蕾璇(99)

干部培训研究

- 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提升服务教学科研水平的途径——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为例
..... 农晓芬(107)

本期执行编辑:杨绪强

封面设计:梁新建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Bimonthly

(started in 1996)

Vol.34 No.5

Published on Oct. 18th 2023

Administrator and Sponsor: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or and Publishe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Editor-in-Chief: LIANG Jing-cheng
Deputy Editor-in Chief: HE Wen-ju
Editorial Director: YANG Xu-qiang
Add: 6 Xincun Rd. Xixiangtang District.
Nanning.

P.C.: 530007

E-mail: GXSX@163.com

URL: <http://www.gxsy.org>

Tel: (0771)2381657, 3891622

ISSN: 1009-0339

CN: 45-1250/D

Distribution Area: P.R.China

Distributor: The Editorial Dept. of Journal
of GIS

Printing: Guangxi Huiwang Fenghuang
Printing Co.Ltd

Price: ¥10.00



英文翻译:陆姝彤

JOURNAL OF GUANG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Main Contents

- A Probe into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CP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 ZHANG Yan, CHENG Jing-qiang(5)
- The Value Purpos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and Innovative Direction of External Narr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XIE Xin-hui, LI Xiao-dong(14)
-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 LIAO Xiao-ming(22)
- The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Style Democrac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Democratic View
..... HUANG Lei, HUANG Hui-qi(29)
-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United Front Framework: Functional Status and Path Exploration
..... KANG Xiao-li(36)
- Study on the Path of United Front Work for Key Groups of Cyber Personnel under the Great United Front Framework: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 ZHANG Jia-hui(43)
- Theoretical Tracing, Centenni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 XIN Yue(50)
-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Bas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of Democratic Parties: Taking Guangxi as an Example
..... ZHANG Shu-ying(57)
-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mmon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CHEN Li(62)
- Zuojiang Huashan Rock Painting: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Blending
..... QIN Cai-luan(71)
- The Significant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Path of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 YANG Fei-fei(78)
-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Resisting Foreign Religious Infiltration Education
..... LIN Huai-yi(83)
- On the Promo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Great Unity” Though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xi Academy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ZHAO Nai-rong(91)
-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 YANG Yang, QIN Lei-xuan(99)
- Approach to Improving the Servi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Level of the Library of the Socialist College in the New Era: Taking Guangxi Socialist College as an Example
..... NONG Xiao-fen(107)

“两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探赜

张 艳,程静强

(宁夏大学,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紧密关联。正是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滋养、淬炼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与此同时,历史主动精神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在两者的有机互构中,揭示了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具体路径。应遵循“两个结合”特有的框架和逻辑,在坚持真理、传承经典、进行伟大斗争中,深化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性阐发,涵养其文明性旨归,推动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性转化,为党和人民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锻造更加强大的精神武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两个结合”;历史主动精神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1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05-09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要“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1]-2},同时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1]6}。“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7-18}，“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可见,历史主动精神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其生成和发展与“两个结合”重要论述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

联。在“两个结合”视域下深入理解历史主动精神,有助于有效拓展历史主动精神生发的理论源流和价值意蕴,为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提供更加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两个结合”蕴含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发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主动把握历史规律、主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担当历史使命,从理论、文化、实践等多重维度激发、滋养、淬炼了伟大的历史主动精

收稿日期:2023-09-09

作者简介:张艳,女,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程静强,男,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神。“两个结合”在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激发历史主动精神

精神形态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撑,科学的精神需要科学的理论为其奠定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之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彰显着唯物史观的思辨光辉,凝聚着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确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把握主动、赢得未来的精神品质。这正如毛泽东所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奠定了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根基。就本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中国的具体历史现状为转移而不断深入发展的实践活动。科学揭示这一实践活动所内蕴的历史主动精神,必须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饱含对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考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践履,不仅体现在党中央基于国内国际的普遍现状,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具体性的、历史性的判断和部署,还体现在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以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为依据,准确揭示社会主要矛盾,有目的、有策略地稳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不断激发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担当和历史主动。另一方面,尊重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历史思维诊断时代脉搏,在尊重人与自然客观规律前提下,积极探索和追寻实现共产主义具体规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锻造生成了具有“行动指南”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体系,不断深化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与理解,进而激发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夯实了历史主动精神的群众基础。为人类谋解放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理想。因此,马克思始终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彰显人的主体价值。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等人将民众视为“精神的敌人”、消极被动的“群氓”的观点作出了严厉批判。马克思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消灭人的异化,确证有个性的个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征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基本观点相结合,为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增强了主体性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人民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本源之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唤醒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确定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伟力的前置条件与根本保证。作为共产主义同盟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全面论述了共产党人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革命性与先进性,这种革命性与先进性具体体现在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同时将无产阶级推上了历史舞台。这样一群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理想、有信念的人走到一起,创建了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使“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4]。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滋养历史主动精神

一个政党内精神的赓续传承离不开国家和民族深厚的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两者虽未明确提出

“历史主动精神”的具体概念,但它们共同遵循和追求的社会理想、价值理念、实践法则皆为内涵丰富的历史主动因素,深刻诠释了党和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底气所在、力量所在。

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相结合,树立了历史主动精神远大的目标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18]。在此意义上,由宇宙观而观之,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社会,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宇宙全局把握天人关系,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内在相通。从天下观而观之,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理想在于构建“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古人所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理想社会的美好向往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融会贯通,领导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攻坚克难,积极有为地朝着更加美好的社会愿景奋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主动精神之所以能够赓续百年,并在当今时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其始终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靶向,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完成自我升华。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孕育了历史主动精神恒定的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始终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民不仅是整部历史话剧的“演员”,又是其背后的“剧作者”,即“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19]。与此相对应,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奉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民本”一词出自《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人民是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突出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朴素的人民性。由此可见,两种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

的社会思想,都对人民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尊重。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初心和使命正是对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的正确回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才能统合磅礴的历史伟力。坚持人民至上,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最鲜明的价值底色。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认知同中国传统的尊重规律、主动求变的实践观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主动精神正确的实践导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十分注重实践,由此形成了内在相通的实践观。马克思指出,人类并非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0],强调尊重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是人们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只能被动地服从于现实,人类的劳动过程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121],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不变法则。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重视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22],同时强调“变则通,通则久”的主动精神^[123],主张“顺势而为”从事实践活动,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之实践。时至今日,这种尊重规律、主动进取的实践认知早已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基因里,成为党带领人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的实践导向。

(三)“两个结合”在百年征程中的光辉实践淬炼历史主动精神

“两个结合”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革命实践,淬炼了历史主动精神“坚守理想、百折不挠”的内在品质。在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虽未出现关于“两个结合”的明确表达,但关于“结合”的话语已经广泛见于党的理论著述。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12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

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生动揭示了中国共产

党面对艰难险阻主动识变、主动应变、主动求变的艰辛历程,在此历程中凝练而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坚守理想、百折不挠”的历史担当与历史主动。

“两个结合”成长于新中国奠基立业的建设实践,淬炼了历史主动精神“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内在品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如何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党执政后面临的崭新课题。对此,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次结合”。刘少奇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关键在于联系实际。”^[1]在这些宝贵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在经济领域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造和建设,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文化领域,毛泽东倡导并践行“双百方针”,鼓励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以《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东方红》等为代表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大量涌现,开创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以铁人王进喜等为代表的石油工人用“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热血激情,建立了我国最大的大庆石油基地;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众科学家隐姓埋名,将青春与生命奉献给新中国的国防事业。这些英雄人物和时代楷模所展现的历史主动精神,必将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两个结合”丰富成熟于富民强国的改革实践,淬炼了历史主动精神“革故鼎新、开拓进取”的内在品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巨大的历史主动性,

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从认识上走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于观念上打破市场与计划相对立的传统,揭开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与此同时,党的理论创新并未忘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邓小平借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康”概念正确揭示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胡锦涛则以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为基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这些富有浓厚人文底蕴的理论创新成果,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联系。

进入新时代,“两个结合”思想逐渐发展成熟,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此科学思想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理论品格,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在安全上,党和人民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成功抗击新冠疫情,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在民生上,党始终坚持“天下为公”“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战胜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外交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立足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传统邦交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等等。这些都集中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革故鼎新、开拓进取的内在品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正以更强烈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担当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

二、“两个结合”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意蕴

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兴,国无精神不强。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实践中转化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与此同时,“两个结合”的发展成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精神动力,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指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保障。

(一)历史主动精神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精神动力

历史主动精神的价值意蕴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对理论创新的内在驱动。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推进“两个结合”的价值旨归,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势必要挣脱旧有思想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束缚,在理论与实践中实现新的发展新的突破,亟需历史主动精神开新局、谋新章。

坚定理论自信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先决条件。“历史主动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基础之上发挥作用的。”^[13]崇尚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精神内核。所以说,历史主动精神是保证理论自信永不涣散的精神中枢。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和人民坚持真理,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虽然当今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处的年代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阐释在当代以至未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我们要时刻警惕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历史主动精神为引领,在精神层面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将其转化为自信自强的行动力,积极有为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积极主动创新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题中之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党和人民面对大量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在此时代境遇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任重而道远,“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错误”^[14]。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必须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并

不能自主实现,其中暗含历史主动的迫切需求。主动以马克思主义回应当今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在明确问题导向的前提下,提出应对风险、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案,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科学性和时代性。如果脱离历史主动精神的引领和支撑,将会丧失理论创新的勇气,陷入墨守成规、思想僵化的消极境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无从谈起。

(二)历史主动精神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指引

文化与精神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精神品质的生成与发扬需要文化的滋养,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依赖于精神品质的引领促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凭借着刚健勇毅、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行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但自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存续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亟需以一种全新的主动精神作为指引,实现新的涅槃。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中自觉能动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鲜血液,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可见,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有利于党和人民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大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在传承发展中始终与历史主动精神保持互动,两者紧密关联。在内容上,两者都可以被视作主体在实践活动中所展现出的自觉态度、奋斗意识、主体情怀和创新思维有机统一的思想整体;在功能上,两者皆在特定历史时期引导和激励中华民族为国家与自身的前途命运而不懈奋斗。这种内在的契合性,为历史主动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互构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底蕴极为深厚,但也存在明显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面对传统文化“是去是留”的深刻诘问,中国共产党自信主动地选择了“扬弃”而非“放

弃”,在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完成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化。为什么历史主动精神能促成这一时代性的转化? 一是因为历史主动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 创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确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服务于人民; 二是因为历史主动精神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辩证法, 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积极主动地批判性继承,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三是因为历史主动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将实际应用价值作为发掘传统文化的出发点, 自觉摒弃空泛而不切实际的文化内容, 并确保发现和整理后的传统文化能够广泛应用于现实, 而非束之于空中楼阁, 在应对和解决社会实际矛盾中促使其不断完善和进化。因此,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 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 仍需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 促进其与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合,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精神指引。

(三)历史主动精神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保障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 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 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 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 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5] 正因如此,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品质, 以其全新的理论释说和实践演绎, 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能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强大的精神保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政治格局因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动荡不宁, 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趁机传播渗透, 由此引发国内经济建设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相互交织, 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叠加演变, 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巨大考验。面对国内外局势的新变化、新挑

战, 亟需保持清醒的历史认知, “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乘势而上, 砥砺前行, 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16]。历史主动精神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首先是在认知上扬弃历史模式, 主动打破“现代化 = 西方化”的迷思, 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主动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根基深埋中国本土。所以, 只有这样的精神才能引领党和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中摒弃以资本扩张、掠夺为发展逻辑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立足自身国情, 纳东西方现代化之所长,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其次是在立场上尊重历史主体, 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群众根基。以人民为中心是历史主动精神最鲜明的价值底色, 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7]。可见, 弘扬历史主动精神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价值契合点, 两者的有机互动, 势必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赋能。最后是在行动上担当历史使命, 以实干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停留在理论释说的表层, 而是需要实干型政党的领导以及敢做敢为精神力量的托举, 将现代化建设落到实处, 保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实干为民的情怀,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初心和使命。历史和实践不止一次地证明,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 现代化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只有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取得丰硕的实践果实。

三、“两个结合”揭示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具体路径

在新的伟大征程上,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 中国共产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应保持积极主动的赶考心态, 在“两个结合”的框架和逻辑中, 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科学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广博性,深化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性阐发,涵养其文明性旨归,并结合伟大斗争,在实践中推动历史主动精神完成自我批判性超越。

(一)坚持真理:深化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性阐发

任何形式的精神形态要在不同时代欣欣向荣,首先应该具备思想的纯洁性和理论的先进性。崇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是历史主动精神最鲜明的理论品格,在一百余年的奋斗史中,中国共产党自觉能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为党和人民认识历史、把握历史、创造历史提供了科学而强大的思想武器。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紧扣“两个结合”的理论主旨,坚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7],深化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性阐发。

深化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性阐发,一方面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需求理论的内在本质,增强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自觉性。从理论阐释入手,阐释历史主动精神在理论内涵上所具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彰显历史主动精神对于改造人们物质与精神世界的能动作用,增强人民对于历史主动精神的情感认同,从而自觉地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进行劳动生产实践。同时,要注重发挥党的领导在理论宣传中的巨大优势,将强大的执行力和思想引领力转化为满足人民对精神生活美好向往的强大效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民精神主动的价值规约,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转化为人民精神主动的动力目标,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转化为人民精神主动的焦点主题,让人民心中的朴素愿景同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产生情感共鸣,最终在行动上展现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要深刻挖掘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强大理论释说力,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所蕴含的历史主动因素。在理论学习和宣

传的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这一思想所内蕴的尊重规律、主动进取、人民至上、开拓创新的宝贵精神,在科学思想的指引下牢固树立“两个确立”的政治意识和党性意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转化为“两个维护”的行动自觉,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四个自信”的精神信念,深化全体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理论认同,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历史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精神。

(二)传承经典:涵养历史主动精神的文明性旨归

创新的前提在于守正,守正的本质在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主动精神生生不息的血脉基因,如果剥离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灵魂,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则属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荟萃,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保境安民、兼善天下、和合共生的价值情怀。弘扬历史主动精神要诠释中华文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尊重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同频共振中涵养历史主动精神的文明性旨归。

涵养历史主动精神的文明性旨归,不仅要自觉能动地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断拓展历史主动精神的文化底蕴,还要积极主动地走出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增强历史主动精神对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贡献。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劳动生产实践中,塑造了中华文明个人与集体、天地与万物一体贯通的显著特征,彰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塑型力,其所蕴含的智慧哲理,对当今人类面对的全球性难题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中华文化要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首先要坚持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原则,顺应人类文明进步潮流,以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取代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治逻辑。要在世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凝聚人类社会的价值共识,以此超越部分西方国家的文明优越论,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开拓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路径,塑造新型文明关系。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塑型力和感召力,搭建实践主体与客体的情感共鸣。例如,从“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文明理念中,阐释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中,阐发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从“守正不阿、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中彰显我国人民对于国际道义的始终遵循;从“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价值追求中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进一步提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涵养历史主动精神的文明性旨归提供持久充沛的文化源泉。总之,要善于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广博的世界视野和开放包容的人文意蕴,并将其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融会贯通,在思考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汲取优秀成果充实自己,并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夯实历史主动精神深厚的人文底蕴,为我国在国际交流中展示担当有为、积极主动、胸怀天下的精神形象奠定文化根基。

(三)进行伟大斗争:推动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性转化

坚持真理、传承经典,从理论领域持续拓展了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思想基础,为历史主动精神向实践领域逐渐过渡搭建了桥梁。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历史主动精神能否实现代际传承,为当今社会发展持续提供积极主动的精神力量,关键在于其能否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并转化为主体的行动自觉改造客观世界。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因此,新时代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必须落脚于中国具体实际,将其转化为清醒自觉的实际行动,时刻进行伟大斗争。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面向全党发出“三个务必”时代号召的内容之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向第二个百年

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仍然面临各种社会隐患和矛盾斗争。从国际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激烈交锋,大国博弈日益频繁,意识形态斗争暗流涌动,人类命运何去何从充满未知。从国内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前景总体向好,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纷繁复杂的发展态势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精神风貌回应当今世界之问与人民之问,将历史主动精神转化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行动自觉。要同一切阻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痼疾和利益藩篱作斗争,以伟大斗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在斗争中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激发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的伟大愿景不断靠近。要自觉维护我国发展主权,同干涉我国内政、威胁我国主权安全、领土安全的活动作斗争,并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外交关系,为我国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要同一切顽障痼疾、腐败现象作斗争,全力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要深刻总结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积淀的历史经验,吸收他国政党兴衰更替的历史教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大腐败惩治力度,在全党树立廉洁标兵,以常态化的自我革命机制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人民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在掌握历史主动中抓新机、拓新局。总之,要以伟大斗争精神统领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以社会革命革故鼎新,消除社会隐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为自我革命提供正向反馈,不断完善自我革命制度,增强自我革命的勇气和能力,真正把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统一于党和人民接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伟业的实践中,促进历史主动精神在改造现实社会的实际行动中不断完成自我批判性超越。

结语

历史照亮未来,征途未有穷期。回眸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顺势而为、因势而

谋、乘势而上,关键在于党始终将“两个结合”的思想主旨贯穿于主动求变、主动进取、主动创造的历史征程,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面向未来,党和人民要以更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接续做好“两个结合”的时代课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拓更加宏阔深远的前进道路。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习近平在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人民日报,2022-10-24(2).
-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32.
-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0.
- [8][战国]荀况.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98.
- [9][唐]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285.
-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02.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54-155.

- [13]张士海,安瑞龙.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弘扬路径[J].东岳论丛,2022(10).
- [14]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24.
-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2020:76.
- [16]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01-01(2).
- [1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6.

责任编辑:许立坤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价值旨归、实践效能与创新路向

谢鑫辉,李效东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和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进行对外叙事,对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塑造大国形象以及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能够有效破除西方国家通过话语权为中国发展设下的藩篱和陷阱,解构西方国家对于国际话语的垄断地位,在国家间的话语博弈中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提升对外叙事的实际成效,要在叙事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让叙事“言之有理”;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际成效,让叙事“言之有据”;构建全过程创新的话语体系,让叙事“言之有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价值;效能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2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14-08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表达,并指出当前全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集现代化建设普遍性和中国国情特殊性于一体的现代化道路,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探索的重要成果。只有沿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前进,才能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才能让世界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践问题,同时是对中国话语的崭新表达。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2]国际社会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运用场域,让世界听见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是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话语主体,创新我国对外话语叙事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完善我国对外叙事体系,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让世界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听到更清晰、更有力、更全面的中国声音。

一、价值旨归: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满足多重任务需求

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在传递中国声音的基

收稿日期:2023-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KSB038)。

作者简介:谢鑫辉,男,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李效东,男,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功能之上,还承载着众多任务,体现着不同维度的价值。对外叙事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话语层面,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对于国家发展和世界进步的推动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对提升国家话语权、塑造大国形象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话语需求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是提高中国国际话语质量的应有之义

提升国际话语权是当前我国的紧迫任务之一。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有助于提高我国国际话语质量,为提高国际话语权注入强劲动力。国际话语权的分量与话语质量有着密切关系。在国际话语权的争锋之中,任何国家如果舍弃话语质量而顾其他,则会失去国际信任,话语权亦走向式微。提升话语质量应确保话语真实客观、逻辑严谨,同时话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可以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表述,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基本特征。在叙事过程中将不断形成新表述、新概念、新理论,不断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与新经验,以不断丰富内涵表达来增强中国国家话语的真理色彩,以真理的魅力提升国际话语权。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成果,叙事逻辑严谨是其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强调各国建设道路的特殊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理念,在此理论上探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世界说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37]。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将用稳扎稳打的现代化实践成果向世界诠释中国叙事的真实性,增强中国叙事的吸引力,以真实可信的话语逐步提升国家话语权。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道路的现代化,在其叙事体系中“和平发展”是底色,“以天下为先”是情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平等相

待”等和平理念是叙事常态,呼吁摒弃“零和博弈”“冷战思维”等是叙事要求。当前国际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世界人民对于和平有着强烈期盼,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传递中国对于和平发展的正确主张,和平的精神内涵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需求,契合大部分国家的精神理念,能够在国际话语场上获得更多支持和认同。

(二)从国际价值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是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关键之策

国际话语权和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二者有着密切联系。强大的国际话语权是构建更良好的国家形象的必要条件与基础,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同,从而巩固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不仅可以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也可以构建更良好的中国形象。

其一,国家形象的塑造主要由“自塑”和“他塑”两个方面构成。当前在以美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话语世界情境下,美西方国家通过歪曲中国和平倡议,如将“一带一路”扭曲宣扬为“新帝国主义”、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等不正当、不正确的概念,对中国人民和国家形象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产生了误解和误读,中国国家形象受到“他塑”严重影响。

其二,国家形象塑造需要明确的目标导向。习近平强调在塑造国家形象时,要重点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32]。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中在向构建如此的大国形象方向前进时,应注重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融合、中国话语和世界话语的有机衔接,才能高效完成塑造大国形象的重大使命。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肩负着扭转西方语境下的“负面形象”和重构正确国家形象的重要责任。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要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将国家形象由“他塑”为主转变为以“自塑”为主,应在

国际舞台上发出嘹亮的中国声音,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新形势和新素材,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立场和人类立场构建对外叙事话语,转变西方语境下的非写实的中国国家形象,重塑鲜明、立体且全面客观的中国国家形象。

(三)从奋斗目标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西方社会以“社会主义失败论”不断唱衰社会主义,捍卫社会主义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中国身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探索的新境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水平。只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才能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认识视阈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可以让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更深刻的理解,能更好地认清其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从认识上改变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扭转现代化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和标准的错误理念。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有利于创造更多关于现代化发展的话语,有利于凝聚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共识,增强世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信念。

从理论视阈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之一,与时俱进是其优良品质和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话语表达上的新内容。实践的进步不能脱离理论的指导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进行思想武装,不断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从实践视阈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探索发展的新境界。“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全面进步。”^[4]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模式,加速发展生产力,仅以数十年的建设时间快速追赶了西方资本主义自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建设水平,通过切实的国家发展让各族群众过上了更加美好的生活,物质和精神进一步富足。通过对外叙事话语可以让世界各国看到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的蓬勃生命力,以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增长和人民生活殷实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二、实践效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破解对外话语困境

在当前风云激荡的国际社会交流中,西方国家往往垄断国际话语,时常对中国声音的真实含义进行曲解。习近平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5][22]}要摆脱当前客观上存在的“话语失语”窘境,必须以更新、更有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直面当前的话语博弈困境,勇于和西方话语霸权作斗争。

(一)设置国际性讨论议题,解构西方话语的垄断与霸权

国际议题是国际话语交流的重要载体,当前国际话语场域仍以西方话语为主导,国际性的议题多为西方国家所抛出,并获得世界关注,这就形成了“话语霸权——决定讨论议题——增强话语霸权”的闭环。要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必须积极主动对国际议题进行设置,坚持从自身出发,不断厚实话语议题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可以设置关于领导力量的讨论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成功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关键。任何现代化道路要发展,必须具备一些基础要素。例如,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划,是否具有清晰的发展目标、是否具有正确的方向

引领,等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凝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做到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让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持久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党的长期执政还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避免了一些国家因领导力量更替而导致的道路选择不清和政策摇摆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等问题。当前,我国正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进。坚持党的领导是核心,这与西方所谓的政党轮替的“民主”形成强烈对比。西方的政党更替只不过是不同的资本力量在政治中的映射,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为资产阶级和大财团利益服务。何种领导力量才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领导力量的基本立场应该如何以及领导力量的真实能力等相关议题,都可以是国际话语场的讨论议题。中国共产党以领导的实际成效向世界展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之中设置关于领导力量的讨论议题是可行的,也是打破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必要之举。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可以设置自主性发展的讨论议题。无论是中国历史或是世界历史都表明,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全球化,才能在与世界交流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但是在对外开放时,如果不能把握自主性,就容易在开放的过程中成为他国附庸。例如,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依附于美国而实现了经济的短暂快速繁荣,但发展权受到美方控制,只能看美方的“脸色”行事,当美方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这些依附力量就成为危机转移的重点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是因为我国把握发展自主性,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新时代全球分工位置的多次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极大提升。因此,在对外叙事中设置关于发展自主性的议题,通过展示中国在拥有自主权的发展状态下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能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比之中增强对发展自主权重要性的认识。

(二)更新现代化建设话语,破除西方语境的藩篱与陷阱

凭借前两次工业革命的优势,以英美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建设,现代化话语的塑造也由其开始和发展,因而西方国家对现代化话语起着主导甚至决定性作用。要破除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话语的藩篱与陷阱,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对现代化建设话语进行主动更新,增强现代化建设话语的中国色彩。

更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叙事话语。首先,从国内来看,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是为了谋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当现代化建设目标话语中出现“人民立场”“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人民谋幸福”“美好生活”等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自身发展规律的表达时,可以让世界慎重审视西方现代化的立场和目的,重新思考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其次,从国际来看,当前西方不断陷入“分裂的社会、高涨的民粹主义、堕落的精英、互相否决的两党政治”等涉及社会多方面的发展危机之中^①。这表明西方现代化话语已难以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更不能成为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灯塔”。在现代化的目的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解决发展难题和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新的借鉴和路径选择,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使命,更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有的责任担当。

更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图景叙事话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②。在现代化建设图景叙

述中强调“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和谐共生”等充满中国智慧和中國经验的话语,不断丰富现代化建设的的话语表达。现代化建设话语被更多的中国经验和中國方案所丰富,有助于破除西方对于现代化建设的话语表达的藩篱和陷阱。

(三) 奋争舆论格局主动权, 重塑中国话语的秩序与优势

国际舆论格局是在一定时间内国际上各种舆论力量相互联系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7]。当前,国际舆论格局严重失衡,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国际舆论格局具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官方及非官方的经济组织和国际商会等大多是在西方国家理念倡导下形成,对西方舆论话语起到巨大的维护作用。这就导致中国多年来取得的多重历史性成就的优势效能未能高效转化为话语优势,难以在国际舆论格局中获得相应的地位。要扭转“发展优势”同“话语劣势”之间相悖的现状,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获得应有的国际舆论格局地位,重塑国际话语秩序。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将扭转西方宣扬所谓“普世价值”的现状。长期以来,“西方话语背靠强大的硬实力,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化为唯一合法、合情、合理的东西”^[8]。事实证明,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从唯物辩证法看,人类社会在一定的范围内和在一定的问题上,是可能存在价值共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绝对“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寻求价值共识应以推进全人类共同发展为立场和出发点,不应该以排除异己为目的,打压其他国家发展特殊性话语的表达。因此,从根本上说所谓的“普世价值”违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不可能存在的虚幻。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体现出了独特的中国视角,以兼收并蓄的特点为世界展示符合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道路应有的广泛包容性。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具体形式,是对现代化建设道路多样性的生动例证,也是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有力反驳,中国

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正以深厚的现实基础,让世界认识到“普世价值”的谬误本质。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将更好回应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一方面,面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和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西方国家对我国“定制”了唱衰术语,如所谓的“中国威胁”“中国霸权”“中国崩溃论”以及“历史终结论”等,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赤裸裸的霸权打压。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将为世界传递出真实的中国声音,让世界清晰认识到中国是“和平”“开放”以及“为世界作贡献”的中国,并不是西方话语陷阱中具有威胁性的中国。另一方面,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热衷于对我国进行无端指责、恶意揣测并制造国际话题,试图让中国在国际话语场上成为众矢之的,如通过“人权”“民主”等话题以及历史虚无主义对我国进行肆意抹黑。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能够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的实际图景,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至上”等理念及实践成效,让西方的抹黑不攻自破,以破解西方故意制造话题对我国进行攻击的恶劣行径。

三、创新路向:以“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术”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38]。为了更好地将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价值和实践效能扩大,必须不断创新其叙事思想、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让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术。

(一) 言之有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构建中国现代化的话语体系,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指引。任何实践的成功都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丰富的理论体系中不断获取方向的指引,增强叙事话语的科学性。

一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提供了基础理论指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指出资本主义是“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9]230},并且坚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10]，“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即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9]161}，“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9]179}。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话语表达给予了非常高的地位,认为其对于思想的传递、政权的存在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为了摆脱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重视话语叙事的手段,以共产主义的正确思想凝聚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提供了直接理论指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1]从总体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 and 战略布局等中国现代化建设诸多方面的内容,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用之不尽的内容源泉。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可以向世界传递更多、更好、更新的中国主张和话语。具体来看,习近平指出,“夺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2]，“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9]213},并多次在重要场合对国际话语和传播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提供了直接理论指导。

(二)言之有据:展示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要获得更高的国际认可

度和吸引力,除了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保持自身科学性,还需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中国式现代化以实际绩效,让对外叙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做到言之有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一个经历过近代战争摧残又有着巨大规模人口的国家之中进行现代化建设,意味着现代化建设的难度是其他国家所不曾面临的。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背景下,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重大难题,带领十四亿多人口实现了全面小康,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实际体现。在接续奋斗中,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进一步满足,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必然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主要解决的是公平正义的问题,但“不平等与再分配问题,历来是政治冲突的核心”^[13]。纵观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其现代化建设成果在放任的市场机制下趋于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鸿沟愈加不可弥合。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的是全体人民现代化,这意味着在追求现代化成果的工具理性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分配公平的价值理性,这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和超越,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是全体人民共享,向世界展现了不一样的现代化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习近平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4]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高度丰富的精神文明,且二者能够协调发展,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物质基础大量发展但精神世界相对虚无的全面超越。只有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要向世界

阐明符合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现代化应该是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中,对自然进行征服和剥夺是一大特点。中国式现代化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要求,追求二者的和谐状态,这是对人类在工业时代面对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元悖论”的破解。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世界看到现代化建设可以摒弃“先建设,再保护”的西方现代化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是我国一贯立场及原则的延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相比于西方国家从“发家”开始就走的战争和掠夺的道路,以其他民族的惨痛代价为基础推动自身现代化发展的恶劣行径,我国必然在以和平为底色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开展与世界的和平合作,以互利共赢的结果赢得世界的尊重,获得世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可。

(三)言之有术:构建全过程创新的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必须在已形成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基础之上,做到对外话语传播的全过程创新,提高对外叙事的水平和能力,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话语环境。对外叙事话语可以分解为产生、转译和传播三个过程,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必须实现同步提升,才能切实提高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实效。

一是从叙事话语的产生来看,叙事话语必须具有科学性、权威性。对外叙述话语不是随意产生的,话语的产生具有不可逆性。要确保话语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必须严肃对待对外叙事话语的产生环节,以首脑外交和主场外交丰富对外叙事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计划地出访有关国家和地区。在此过程中不仅将中国声音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且不断产生出新的对话话语。主场外交也是丰富

对外叙事话语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积极承办重要国际会议,如金砖国家峰会、“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冬奥会等。主场外交可以以即时承办的重要议程为话题,生产出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阐明中国观点、弘扬中国倡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上,对外话语的产生要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事访问和主场外交所产生的叙事话语为蓝本,传递出更科学、权威的中国声音。

二是从叙事话语的转译来看,叙事话语必须契合目标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范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环境。在对外叙事的过程中,如何转译叙事话语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叙事话语经常被曲解、文化被误读,一大原因就是转译环节产生了“叙事折扣”。“文本编制时的编码损耗、渠道传播时的传输损耗以及用户解码时的‘认知——加工’损耗”^[15],会出现在“叙事折扣”环节中,起始和输出环节都需要重视话语转移工作。要高效匹配目标叙事对象的文化语境和语言形式,必须重视相关人才培养。只有掌握一定的对外叙事技能的人才,才能将“折扣”降到最低,最高效率地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重要任务。首先,要培养出出色的翻译人才。只有对中华文化、叙事目标对象文化及语言都有充分了解的翻译人才,才能避免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的误解,让对外叙事更加顺畅。其次,要培养专业的新闻传播人才。专业的新闻人才队伍可以提高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覆盖面和认同度。再次,要培养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只有对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的合法权利。

三是从叙事话语的传播来看,叙事话语必须具有科学的规划。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23]16}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必须从顶层设计上做好整体布局,保证叙事过程的连贯性和有序性。同时,要对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进

行创新。对外叙事既要在传播过程中汇聚对在国家话语场上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或渠道,还要积极打造自身的专属平台,以高质量的叙事水平吸引国际观众,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在国际话语场上实现突围。要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对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传播平台和手段,增强传播策略灵活性,让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叙事最大程度地获得目标最大的心理共鸣。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7.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3.

[15]喻国明.跨文化交流中的三个关键性传播节点——关于减少和消除“文化折扣”的传播学视角[J].新闻与写作,2020(3).

责任编辑:许立坤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关巍,张澍军.中国式现代化开辟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境界[J].思想教育研究,2023(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郑永年,杨丽君.如何叙述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J].青年探索,2021(4).

[7]吴璜.国际舆论格局与我国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J].当代传播,2009(5).

[8]陈曙光.中国话语:说什么?怎么说?[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238.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11.

[1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6.

[12]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4.

[13][美]托马斯·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M].赵永升,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三重向度

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成都 610071)

摘要: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整体价值向度,在于坚持人民至上提供主体依据,坚持自信自立提供精神力量,坚持守正创新提供立场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提供发展面向,坚持系统观念提供思维和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提供国际视野。同时,其发展目标质量向度在于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维度下的新时代新征程政治发展要聚焦社会主要矛盾、聚焦高质量;其多维认同向度在于通过有效范式表达以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目标质量;多维认同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3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22-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从广泛意义上说,这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最大政治。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在坚持广义政治概念和狭义政治概念相统一的基础上,把准基于世界观、方法论的整体价值向度,把准基于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发展目标质量向度以及把准基于范式表达的多维认同向度。

一、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基于世界观、方法论的整体价值向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

思主义政治观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大政治观。习近平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2]。新时代新征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基础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整体价值取向,“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3]6}。

(一)坚持人民至上提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的主体依据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了“人是天生的

收稿日期:2023-08-11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SC22ZD001)。

作者简介:廖小明,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党的建设。

政治动物”的命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政治追求的应然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提供了认识把握政治的整体性价值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由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并且强调政治主体不同导致的政治目的和本质的不同。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党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从目的与手段、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把准了价值的整体性。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这就要求党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要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置于这一任务之中,自觉服从这一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认识特别是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推进政治发展的认识,要有宽广视野及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广义上,坚持人民至上,要求坚持大政治观,把人民至上这个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其他方面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在推动相关领域事业发展过程中,始终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反映人民诉求,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始终维护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在狭义上,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把人民置于中心位置,让人民在民主参与和法治建设进程中实现权益,体现公平正义,彰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生命力和显著优势。

(二)坚持自信自立提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的精神力量

自信自立是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基因血脉中的精神力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是党把握历史发展方向,赢得历史主动的重要条件。新时代新征程坚持自信自立,就是从根本上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坚定不移、坚韧不拔,

为认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整体价值提供精神力量。从广义上看,坚持自信自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要求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大政治观,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更加积极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所强调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概念,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整套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理论、结构要素、制度体系以及文化价值观等,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政治发展相当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维结构中的政治。因此,广义上的政治发展,就是“国家政治基于经济发展而运动和前进的历史过程,是执政党和国家确定政治道路、制定战略方针和方针政策,推进政治建设和治理,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政治命题”^[9],实质上是一种大政治观,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其他领域建设等诸多方面。将这些内容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认识把握其发展要求,就是要以大政治观的视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其他方面发展,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旨意。从狭义上看,坚持自信自立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要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理念、模式、道路、制度等方面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自觉认可和认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观念、模式、道路、制度等,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鲜明特征。

(三)坚持守正创新提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的立场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创造活动都要基于一定时代既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推向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立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必须在既有发展基础上不断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坚持

守正创新,就是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从广义政治范畴上看政治发展,以坚持守正创新为基础,要求我们坚持大政治观,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发展中,始终从守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之正,落实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文化之正,同时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敢于说前人没说过的新话,干前人没干过的事情,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其他领域建设的整体进程,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价值。从狭义上看,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就是要在民主法治建设中认识、把握和坚持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正确和成功的方面,同时积极学习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做到坚持“以我为主”,立足本来,面向未来,不断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发展。

(四)坚持问题导向提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的发展面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也是实践发展的根本方向。政治发展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从广义上看,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坚持大政治观,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中始终坚持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直面问题又敢于解决问题,不断创造新的业绩。从狭义上看,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正视不足,分析问题,在坚持根本原则和要求的基础上促进问题的解决,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旺盛生命力。

(五)坚持系统观念提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的思维和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普遍联系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和认识事物,才能把握其中的规律,顺应发展,推进发展。坚持系统观念,总体上就是要坚持整体的、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把握各项事业发展。从广义上看,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系统观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求我们坚持大政治观,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统筹起来,在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微观与宏观、主要与次要、特色与一般等关系中总体把握,系统认识,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开创各方面工作新局面,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彰显政治发展的整体价值取向。从狭义上看,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系统观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整体、全面地把握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和过程,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统筹推进民主发展建设,彰显政治发展的整体价值取向。

(六)坚持胸怀天下提供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整体价值的国际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因此,既要始终立足于自身建设发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根和魂,把准整体价值目标和发展要求,同时也要具有国家视野观察世界政治变化的规律和方向,顺应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促进世界政治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在广义层面,坚持胸怀天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彰显整体性价值,要求坚持大政治观,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国家利益与人

类发展利益统一起来,既服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又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进步、促进世界大同这个世界性的政治发展。在狭义层面,坚持胸怀天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能因为自身具有优势和特色而封闭僵化,相反要在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独立自主的对外交流中彰显特色和优势,相互借鉴、相互成就。

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基于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目标质量向度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广义与狭义相统一的大政治观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彰显社会主义政治优势,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是指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内容、形式和任务,处理各阶级和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则主要指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经济与政治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政治发展必须聚焦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质量向度。

(一)新时代新征程政治发展要聚焦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需要放到经济与政治相统一这一基本关系维度中把握,而这种把握又能使我们清楚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聚焦社会主要矛盾的必要性。一方面,在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关系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传统和优势。从党的百年历史进程看,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是在

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维度中进行的。从正面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在经济与政治的统一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党都始终坚持大政治观,在二者的统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发展。从反面看,一旦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关系,脱离实际只强调政治,往往会犯大的错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关系中进行的,这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另一方面,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鲜明体现了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辩证关系,要求政治发展必须聚焦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大政治观视野下推动政治发展,形成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客观上为我们认识把握新时代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首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表现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9-20],这包括了政治和经济的涵义和指向。其次,从供给端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本质既是内涵丰富的发展,也是参差不齐的发展,显然也包括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最后,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来看,也必须要在“经济——政治”的整体性维度下,在辩证认识处理好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促进矛盾供需两端的平衡和解决。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因而需更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发展一体推进,以完善制度促发展,让人民成为发展的受益者。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聚焦高质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3]这里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高质量,是包括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的高质量。高质量

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标准和要求很高。就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聚焦高质量的内涵和标准。首先,高质量作为一种综合性评价的标准和要求,本身体现了大政治观视野下的总体性标准和要求,这必须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总体性要求和标准,而且是高的标准。其次,高质量作为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统一关系下的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面临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复杂性。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之间关系,促进二者科学有效地相互促进,需要有更好的政治能力,具体体现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既反映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反映到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能力。再次,高质量作为衡量政治发展的一项标准和要求,就要针对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民主法治方面用了两个部分的篇章进行阐释,体现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更高标准和要求,也是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权利发展和维护的高度重视。同时,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这个层面上,要求聚焦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不断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提高人民的法治素养和党员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等。概言之,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总体性要求中,不断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彰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成功和优势,更好地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要求。

三、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基于范式表达的多维认同向度

2021年2月21日,习近平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要不断增进全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新时代新征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通过有效的范式

表达实现守正创新,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通过有效的范式表达以增强政治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要着眼于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党和治理等方面的范式创新和话语表达的创新,提升政治认同度。政治认同是人民群众对于政权的赞同态度、支持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权代表的国家的心理归属感^④。就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说,增强政治发展的政治认同就是要将政治发展置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之下,突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政治认同,最基本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认同,最根本的是对人民立场的认同。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在范式和表达上已经形成了诸多的创新,比如顶层设计层面的“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自我革命”等,微观实施层面的“八项规定”“纪检监察一体化”“七个有之的问题判断”“执纪的四种形态”等。这些范式和表达的创新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也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独特优势,推进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路径方法政治理念上的认同、方法路径上的认同、情感价值上的认同都意义重大。上述范式和表达的创新从整体上看,要升华到从党和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地位、政治立场、政治价值内心认同,突出坚持和认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通过有效的范式表达以增强思想认同

思想认同就是要从思想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体系性、有效性发自内心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创新范式和话语表达,在思想层面集中体现为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一个丰富的观念体系、内容体系、结构体系和方法体系。一是在宏阔视野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政治价值、政治文化等的总结。二是在中观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体系和方法建构的探索,这主要体现为治国理政的科学内涵、基本原则、显著特征和方法体系等。三是对微观层面如何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指导。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为例,概括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等九个方面,本身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本范式和表达的坚持和发展,其中不少内容有新的概括和表述,也有对守正创新的具体呈现。通过把这些内容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学习和把握,就能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思想认同。概言之,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论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坚持,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时

代坐标、经济基础、社会主体、总体主题、宏伟目标、系统动力、本质规定、推进路径和评价标准,形成了系统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①,本身具有思想的伟力和魅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形成的这些守正创新成果,必然有助于增强政治发展的思想认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通过有效的范式表达以增强理论认同

政治发展理论有许多流派,其主张和理论基础各有不同,容易产生理论上的冲突。比如,在有关腐败问题的分析上,中外学者就提出了诸如权力原罪说、经济决定说、社会转型说、潜规则文化说、精神分析说等理论学说。习近平没有简单运用这些理论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而是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性教育这个角度进行阐释,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是“表”,党员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根子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丧失、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这为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范式表达创新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理论,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突出政治发展之于社会主义的内涵丰富性和外延扩展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在范式上不断突出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创新理论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表达形式,既能够把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原则融于内容体系之中,又能够以直观明了的形式让大众感知。这样的政治发展理论应该得到更大的认同,而且在推进政治发展中不断增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范式和话语,坚持“两个结合”,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有利于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认同。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需通过有效的范式表达以增强情感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不同于以往剥削

阶级“见物不见人”的政治发展言说,是一种始终为了人、发展人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民主发展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体现情感温度的权利实现形式。这样的民主要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所以它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形式当然应该得到情感上的认同。同样,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要从各方面建设法治体系,推进法治实践,而且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真正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让每一个人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辉,增强全民的情感认同。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背景中进行范式和话语表达的创新,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同向同行的,因而对二者的情感认同是统一的,既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中实现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情感认同,又要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情感认同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总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政治范式和话语表达,增强情感认同,从感情上客观、积极地体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等,自觉认同新时代新征程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是党之幸、国之幸、民之幸,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

版社,2023.

[2]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N].人民日报,2020-12-26(1).

[3]王浦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思想论析[J].政治学研究,2018(3).

[4]常轶军.政治认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与魂[N].光明日报,2018-02-08(15).

责任编辑:刘菊香

中国式民主的优势与发展路向

——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视角

黄磊,黄会奇

(延安大学,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科学地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基石和价值遵循。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式民主新道路,中国式民主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彰显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群众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深刻认识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和前景,不断在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宝库中挖掘理论新资源,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路向,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中国式民主;优势;发展路向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4

[中图分类号]A81;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29-07

“民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它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治理实践,本意为“人民的统治”,即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民主的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在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扬弃前人“民主”观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主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考,蕴含着对民主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为此后社会主义民主的形成和发展

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启迪。

2021年10月,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1]中国式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民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新型民主模式。近年来,在“中国道路”“中国之治”“中国奇迹”的讨论热潮中,中国式民主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

收稿日期:2023-09-12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规划项目(2022B057);教育部基地重点项目(22HSJD-03)。

作者简介:黄磊,男,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黄会奇,男,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陕甘宁边区史和延安时期党史党建。

主要从中国式民主的逻辑形成、发展过程、基本特征、价值评判、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新的视角解读中国式民主,如李影、韩喜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民主的历史文化基因,赋予中国式民主深厚的力量和底气^[2];李姐认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逻辑起点,揭示了发展方向,确立了价值旨归^[3]。本文将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视角,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式民主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旨在彰显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优势和光明前景,坚定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自信,进一步探索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路向。

一、中国式民主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总结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进程中得出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关于民主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和看法。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本质要求与核心内容,并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新境界,展现中国式民主的独特魅力。

(一)继承“人民主权”原则,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420]这里的民主包括国家的类型和形式两层含义,涉及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实质上是统治阶级所享有的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42]另一方面民主是保证公民平等权利的一种形式,正如列宁所说:“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

国家的平等权利。”^[420]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6]这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观基础上,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阶级性本质。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的核心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马克思在1843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明确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进一步揭露了国家制度背后的神秘面纱。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抽象的,国家制度只表现为“人民的自我规定”。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41]这进一步阐明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和追求,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列宁也充分肯定,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的原则,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作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根本政治制度层面保障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8]这一重要论述把人民看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观点的最新表达和运用。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让人民真正成为“参与者”和“受益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同富裕”思想的践行,再到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追求。

(二)继承“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议行合一”的理念,最早见之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认为,最好的政体应是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于一体的政体。1871年的巴黎公社受其影响,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成立公社委员会。作为巴黎公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公社委员会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可以决定大政方针,是能充分反映和代表人民意愿的权威性机关。马克思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9]与西方的“分权制衡”原则正好相反,“议行合一”体现的是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原则,提高了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效率,具有显著的优越性。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坚持“议行合一”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民主集中制”,但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开展革命实践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集中色彩。例如他们起草制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所有盟员一律平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明确提出“要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10],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重要性。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1]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直接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的兴衰成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加强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注重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用,形成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大形式,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三)继承“普选制”原则,不断丰富民主选举内容与形式

普选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民主,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12]。巴黎公社在扬弃西方民主制基础上,实行成年公民普遍参加选举的制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普选制。马克思认为,在巴黎公社的体制下,人民可以对公社直接管理,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制”。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评价道:“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13]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就实行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推进“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成为后来民主选举的典范。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它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选举制度。后来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民主选举受到严重破坏。1979年7月,我国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坚持原有选举原则的前提下,把推行选举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县级,在选举机构、程序方面也有很大改进。在此之后,又分别

于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对选举法进行了7次修改,使得我国选举制度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世界潮流,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并举,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4]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智慧成果,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它贯穿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民主领域,范围最全面、最广泛,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从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豆选法”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再到新时代创造性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都体现了我国民主选举日臻完善。

二、中西方比较下中国式民主的独特优势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格局也在加快调整。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大面积“西方之乱”,如债务危机、难民问题、党派纷争、种族冲突、暴力恐怖等现象,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相比之下,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世界从未有之奇迹,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形成了国泰民安的“中国之治”^[15]。“中国之治”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式民主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一)中国式民主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是实现民主的根本保证。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各党派相互竞争、轮流执政,严重影响政党之间的团结合作,不利于社会整体力量的凝聚和发挥。这种建立在

政党竞争基础上的制衡和监督,具有严重的政党偏见,存在各党派之间相互拆台、相互掣肘的弊端。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中国式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并带领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出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政党等也曾进行过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干革命、搞建设、促改革,一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化解各种危机和矛盾,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尤其是近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国共产党更是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首要位置,在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换句话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式民主之路就行不通。

(二)中国式民主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

制度是实现民主的重要载体和保障。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制度,主张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这种“分权制衡”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容易造成各国家机关运行效能偏低的情况。与此相反,中国式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最能体现人民意志的组织形式。这样的制度体系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集中力量办大事,并通过民主集中制,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保持亲密合作,进行广泛协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民主党派成员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认可。再

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地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是直接面向基层群众,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落实,使民众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政治生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除此之外,从我国的实践来看,协商民主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有着特殊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协商民主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写进党代会报告,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在我国当前的民主实践过程中,主要采取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既强调选举民主的作用,人民通过直接选举、间接选举等方式进行投票;又注重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每个公民都有参与讨论、协商的平等机会,最终通过讨论达成共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保证了过程民主与结果民主、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

(三)中国式民主具有广泛的群众优势

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毋庸置疑。西方民主普遍采用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广大选民只能数年参加一次选举投票来决定由谁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而不能自己直接参与国家权力运行。西方国家“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看似自由平等,实际上人民常常被政客、媒体、利益集团等蒙骗和玩弄。如面对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西方党争民主仍以竞选为头等大事,打着民主的幌子,置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于不顾,赤裸裸地暴露出政党、财团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本质。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式民主内化于人民群众生活日常,在基层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1]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这个国家的人民最

有发言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国城乡基层民主的活力得到进一步彰显。从城乡社区的居(村)民议事会、民主听证会,到当地人大代表进社区,从线下的圆桌会、议事厅到线上的各种微信工作群、相关网站,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摸索出许多基层民主新形式。2022年“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显示,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比上一年提高了9%,达到91%,位居被调查的27国之首,为10年来最高水平。而德国民众对德国政府的信任度仅为47%,比2021年下降了12%,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仅为39%,比2021年下降了3%^[6]。根据调查结果可知,全球政府信任度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态势,这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在积极解决社会问题、改善民众生活等方面取得的绩效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实践以投票代替其他民主参与环节,很难保障人民的真实意愿。相比之下,中国式民主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于形式的选举弊端,充分动员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真正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通过对比“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不难发现,中国式民主优势明显,决策效率高,执行力强,日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而西方民主决策效率低下,乱象丛生,日益走向衰落。在世界人类文明处于深度危机和历史性重建的大变局形势下,一定要对中国式民主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价值审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发展与完善。

三、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视域下中国式民主的发展路向

(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阐述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权威的关系,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全面领导的重要性。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政治保障。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式民主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同党的性质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是一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凝聚起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磅礴伟力,不断推进中国式民主向前发展。当前,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地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前进道路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

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制度,是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好制度,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有效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不断丰富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应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更有效地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打通基层“最后一公里”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群众立场对民主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而形成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同民主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创造者,看作社会历史的主体。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因此,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提升基层治理实效性极

为重要。在具体实践上,一是党和政府要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及时了解并回应群众需求,制定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措施,加大基层社会保障投入力度,聚焦乡村振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领域,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帮助基层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二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体系,制定合理的规则和流程,完善候选人信息公开,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渠道,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形成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三是推进基层治理工作创新,注重发挥“党建引领、双线融合”的作用,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以微网格、微服务为突破口,及时为基层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精细化服务,让民意表达畅通无阻。

(四)提升中国式民主国际话语权

民主话语权是当代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核心理念,对维护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安全至关重要。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占据着国际民主话语权,极力美化西方的“自由民主”,给我国添上“非民主”的标签,并对我国进行极其隐蔽和高明的意识形态渗透^[7]。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坚持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逐步构建起了中国式民主话语体系。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在民主国际话语权方面仍处于弱势地位,迫切需要打破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提升中国式民主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具体来说,一要深入对中国式民主的主题研究,把中国式民主的独有魅力有机融入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考察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与实践经验。二要创新基层民主实践平台,搭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渠道,加强政府政策解读,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三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净化网络环境,坚决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作斗争。四要加强中国式

民主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民主故事,充分利用各种媒体、网站,搭建国际民主论坛,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的成就,在国际上赢得更大话语权和主动权。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民主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新形态。事实证明,中国式民主在我国走得通、很管用。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仍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式民主必定将成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一剂良药,中华民族也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求是,2022(5).
- [2]李影,韩喜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国式民主的力量[J].广西社会科学,2016(2).
- [3]李坦.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价值意蕴量[J].求索,2012(4).
- [4]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0.
- [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7.
- [10]列宁.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25.
-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7.
- [12]列宁.国家与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5.
-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0.
-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2-10-26(1).
- [15]周佑勇.大变局下中国式民主的制度优势与宪法保障[J].中国法学,2023(1).
- [16]刘晓琰.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蝉联全球第一[N].北京日报,2022-01-21(7).
- [17]张瑜,韩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J].理论导刊,2023(3).

责任编辑:刘菊香

大统战工作格局视域中的人民政协:功能角色与路径探索

康晓丽

(厦门市社会主义学院,福建厦门 361027)

摘要: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新时代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指明了前进方向。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担当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责任使命、承载着推动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功能、发挥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组织效能,这成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的重要体现。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对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重要特征和理论基础,牢牢把握人民政协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实践准则,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筑牢团结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组织优势,增进团结的共同思想意志;要切实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增强统一战线组织的凝聚力。

关键词:人民政协;大统战工作格局;功能角色;路径探索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5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36-07

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2]这里讲的有关方面,是指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民族、宗教、港澳台侨等相关部门负责的统战工作,这些都是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3]。2019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4]这明确了人民政协的主要功能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大统战”成为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5]。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明确了人

收稿日期:2023-09-25

基金项目:2023年度福建省社科基金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专项课题(FJ2023TWZX001)。

作者简介:康晓丽,女,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厦门市行政学院、厦门市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华侨华人与国际关系。

民政协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功能角色,就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也与人民政协组织的职责和使命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这一重要论断对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定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人民政协在新时代加强团结、增进团结的功能作用所指。

一、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功能角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作为“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确立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功能角色,要进一步厘清大统战工作格局与人民政协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责任使命、政治功能与组织效能,推动人民政协成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独特力量和重要标识。

(一)人民政协担当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责任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人民民主政权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中,统一战线、人民政协和协商民主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依靠统一战线,通过协商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6]。党总结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丰富实践,探索了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推动协商民主成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可以说,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离不开人民政协。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形式和组织形式,承担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7]。人民政协担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责任使命,不仅包括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也包括对人民群众生活实际问题的协商;既涉及政权机构、政协组织、执政党、参政党,又涉及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各个领域和渠道等,还有全国、地方、基层等不同层次。这种国家和社会协同共治的格局是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和生动实践。

(二)人民政协承载着推动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功能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与生俱来就是要做团结和民主两件事情。大团结大联合不仅是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要求,更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功能体现。人民政协把团结和民主贯穿于一切工作的始终,在巩固团结的基础上充分发扬民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前提下巩固团结,这亦是统战工作格局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直接体现。人民政协作为连接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群众与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桥梁,不同政治力量和利益群体通过人民政协这个组织形式可以有序参与国家事务的协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并对国家机关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功能旨在创造良好环境,让各方面畅所欲言,并把他们的意见建议真实准确地反映给决策机关。正因如此,党和国家重大事项是“在”政协协商而不是“与”政协协商,政协不是协商中的一方,而是协商的一个平台。政协“政治决议”所表达的是各参加单位和委员形成的共识,其表述方式为“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认为”或“与会委员认为”等,这是政协的特点,更是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功能属性所在。因此,强调人民政协要实行大团结、大联合,要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象征和功能^[8],这不仅系统地回答了人民政协发展的历史责任、独特优势和重要原则,也与大统战工作格局助力大团结大联合的主旨辩证统一,更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理念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实现重大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人民政协发挥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组织效能

人民政协作为各界群众和权力机关之间的桥梁,组织效能十分重要,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一方面人民政协要为社会各方利益群体的代表人物提供一条实现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畅所欲言的民主渠道^[9],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则有了一条通过广泛了解不同界别群众意愿诉求并据此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进而作出正确决策的体制通道。因此,在人民政协的章程以及相关文件中,都把保障各种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和依法维护委员的民主权利,作为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原则予以明确规定,这为人民政协发挥思想政治引领提供了规范化、制度化保障。与此同时,人民政协发挥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组织效能还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保障。这个制度保障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中得以体现,如明确强调了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战略定位,把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制度保障;明确把提高职能发挥水平作为主轴,将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凝聚广泛共识作为核心;明确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方向;强调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凝聚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为不同阶段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服务的战略目标;强调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咨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4];等等。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了人民政协凝心聚力的组织特性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制度效能。

二、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对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工作高度重视,提出了“问计于民、与民协商”“人民政协要实行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团结海

内外中华儿女”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思路 and 理念,并通过一系列重大实践整体谋划、积极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创新发展,推动全社会形成了人民政协大团结的崭新局面。习近平明确指出,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10]。基于此,作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原则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仅与政协工作加强团结、增进团结、凝聚共识的组织特性相契合,而且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认识^[11],有助于深入推进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的制度建设。

(一)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特征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体现在人民政协组织大团结大联合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的重要论述,科学提出了人民政协的大统战创新理念及其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独特地位,明确了人民政协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的独特优势和历史责任,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制度性创新。统战属性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属性,统战职能是人民政协最基本的职能^[12]。习近平关于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协商民主的角度科学界定了人民政协团结的性质,指明了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职责使命,明确了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凝聚共识的目的与统一战线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原则深度契合。因此,只有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重要特征,才能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组织效能。

(二)学深悟透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关于人民政协加强大团结、大联合的科学阐述,本质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①。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人民的实质性参与,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团结和民主真谛。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发展统一战线、推进党派合作与发展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和融合,人民政协的目标和任务是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②,解决的是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这一最大的政治问题。加强团结、增进团结、凝聚共识是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功能和作用所指。因此,只有学深悟透人民政协大团结大联合的理论基础,才能从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理论与实践。

(三)牢牢把握人民政协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实践准则

在做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工作的同时,要把凝聚共识作为政协重要职能^③,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推动全社会形成人民政协大团结的崭新局面。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提出了人民政协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实

践准则。这些准则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实践,不断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才能建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是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是实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④。坚持党领导人民政协工作首先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加强团结、增进团结、凝聚共识的理念,这就是“大统战”理念的核心内涵。1995年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时就曾着重强调,“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必须善于依靠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①,要“充分认识政协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②,明确“政协的地位不能削弱,而是更加重要;政协的任务不是减少,而是更为繁重;党委对政协工作的要求不是降低,而是更高”^③,指出“对于一个地方的党委领导来说,如果不重视抓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就是一个手拿法宝而不会用的不称职的领导”^④,提出“要把重视不重视政协工作、善于不善于做政协工作,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战略眼光、政策水平和民主作风的一个重要标志”^⑤,同时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强调“政协工作是党的工作全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

二是必须提高人民政协职能发挥水平才能建成

①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市政协七届五次会上的讲话(1992年3月2日)。

②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5年2月28日)。

③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3年2月15日)。

④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0年10月11日)。

⑤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95年2月28日)。

⑥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八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96年3月28日)。

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到“建言资政等、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从“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关于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增进团结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①,立足于习近平关于提高人民政协职能水平的基层实践基础,更立足于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凝聚共识层面的重要作用。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反复强调提高人民政协职能发挥水平的重要性。1991年2月28日,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各级政协要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要求,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认真参加全市大政方针的协商讨论,及时反映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努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②。1992年3月2日,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七届五次闭会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做好新时期政协工作,既要靠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又要靠政协自身发扬主动参政议政、求实创新精神,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③1993年2月15日,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会会议上指出:“在新形势下,政协要准确把握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责任,要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识,要乐于、勤于、敢于和善于参政议政。”^④此外,习近平还十分重视通过制度推动政协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政协履职水平,助力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推动出台了进一步加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与协商的意见,通过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谈心会等行之有效的

制度,在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知情出力创造条件的过程中,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参政议政意见、建议和调研结果给予切实的落实和反馈,身体力行践行了大统战工作格局原则,如明确各级政府有关会议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重大外事活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完善各级政府部门与民主党派的对口联系制度,聘请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特约监督员等。

三是必须以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建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习近平就人民政协大团结作用的发挥效果,提出了明确的考量标准和具体要求。1991年3月27日,习近平在福州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办签收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面‘镜子’,最能反映我们工作的得失”^④，“希望政协的各位委员经常深入城乡基层,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为困难地区和困难企业出主意想办法”^⑤,强调“要坚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反映群众愿望,维护群众利益,继续做好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工作,起到党和政府联系各界人士、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⑥。为保证人民群众满意,习近平始终重视发挥人民政协组织、政协参加单位和各界别委员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强团结、增进团结提供制度化保障。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首创的“于山季谈”被党外人士称为“于山上的春天是民主政治的春天”,强调人民政协组织要搞好协商议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参政议政,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看全局、想大事”“抓宏观、议大事”,

①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七届四次会上的讲话(1991年2月28日)。

②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七届五次会上的讲话(1992年3月2日)。

③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闭会上的讲话(1993年2月15日)。

④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办签收会议上的讲话(1991年3月27日)。

⑤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福州市政协七届四次会闭会上的讲话(1991年2月28日)。

⑥参见福州市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人民政协工作重要论述展览——习近平在市政协八届四次会上的讲话(1996年3月28日)。

更好为福州建设发展、民生改善履职尽责、贡献力量。199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八闽大地民主风——福建省政协工作的实践与开拓》一文,也突出报道了福建省政协协商工作机制。在报道里,习近平介绍了福建省党委为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加强大团结大联合所采取的规范化、制度化措施。作为对福建省委决定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1999年《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发布。1999年12月16日,福建省政府和省政协举行了首次联席会议,建立起了福建省政府和省政协的联系制度和情况通报制度^[7]。习近平在首次联席会议上强调:“政府与政协联席会议制度,是依法治国要求的具体体现,是加强政府与政协联系沟通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的一种很好的形式,践行了大统战的主旨和理念,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8]

三、人民政协在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发挥作用的路径探索

新时代人民政协建设必须随着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坚持和完善而不断发展。人民政协应当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不断深化大团结大联合的实践,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筑牢共同思想基础;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组织优势,增进团结的共同思想意志;切实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增强统一战线组织凝聚力,进而不断提升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一)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筑牢共同思想基础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新时代人民政协“是什么”“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重大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鲜明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和根本保障。人民政协因党而生、由党而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

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是人民的历史选择。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坚持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工作,首要的就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时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大力增进政协委员并带动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10],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夯实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力量支撑。

从各级政协来说,筑牢共同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加强理论学习。政协系统专门组织召开专题学习和研讨会,运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并用以指导政协工作实践。二是交流学习。人民政协可通过解读领会、学习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政协各组成界别和有关单位做好团结工作提供思想指引。三是寓传承弘扬于大统战工作格局实践。政协组织要加强同统战部门的沟通协调配合,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政协协商等,推动传承弘扬与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同向而行,同步着力。

(二)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组织优势,增进团结的共同思想意志

新时代人民政协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协商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实施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11],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广泛协商,为增进民主团结、科学决策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积极营造团结合作、平等相待、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协商文化氛围^[12],努力做到求真知、说真话、真协商,真正使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专”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13],进而真正做到鼓干劲、出实招、谋良策、促发展。人民政协集聚了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政协委员,要以“大统战”理念团结凝聚政协委员,完善协商民主程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升政协组织凝聚力。一是设计系列专题内容,搭建党政领导与

政协委员面对面协商的平台,推动“大统战”理念成为党内和党外的共识。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通过小程序等加强委员联络服务工作,做到沟通无障碍、交流无限制,增进委员对政协组织的归属感和大统战意识,提高政协委员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三是通过各种平台助力政协委员在履职中践行“大统战”理念。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台、各方参与、服务群众”的总体要求,积极开展主题调研活动,让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面对面协商,根据政协委员界别和专业属性,在不同的园区、社区、企事业单位建设线上“同心e站”+线下“同心驿站”,将其打造成“党委政府好助手、人民群众好去处、委员履职好平台”。增加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媒体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等新成长起来的具有影响力的统一战线领域成员的议事活动机会,提供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扩大团结覆盖面。

(三)切实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增强统一战线组织凝聚力

力量源于团结,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9]。大团结大联合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要以“大统战”理念团结凝聚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加强大团结大联合,增强统一战线组织凝聚力要牢牢把握三个准则。一是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人民政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这既是人民政协的本质属性所在,也是其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要牢记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加强团结、凝聚共识的功能定位。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了人民政协的功能定位,即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10]。三是准确把握人民政协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增进人民群众团

结的思想工作。作为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在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及时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推进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可以通过委员们深入基层,在敏感话题、群众关切议题、引发风险焦点等问题上解疑释惑,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将凝聚共识与推动工作同向发力。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 [3]汪国华,乌日尼勒.习近平“爱国统一战线”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 [4]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政协,2019(18).
- [5]张峰.论人民政协凝聚共识职能[J].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21(1).
- [6]包心鉴.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制度化建构[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 [7]王雄刚.新时代人民政协统战功能探析[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1).
- [8]全国政协“加强新时代中华儿女大团结”课题组.新时代人民政协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研究报告[N].人民政协报,2023-02-14(3).
- [9]张瑜,韩升.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J].理论导刊,2023(3).
- [10]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1).

(下转第56页)

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张佳慧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浙江嘉兴 314001)

摘要:近年来,浙江省立足互联网大省、数字经济强省和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实际,积极探索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新路径,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新时代做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积累了经验。当前,更好地发挥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优势作用,应围绕健全制度机制、加强思想引领、创新工作载体、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着力构建网络化、社会化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大统战工作格局。

关键词:大统战工作格局;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特征;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6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43-07

2019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首次共同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做好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作为新时代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指出要重点做好从事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网络人士的工作^①。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网络人士的重要地位作用,明确了做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②。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做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是巩固和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任务。当前,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对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实践进行总结,提出优化路径,对进一步推动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构成与特征

(一)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构成

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③网络人士可以概括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平台,从事经营管理、生产传播、技术研发、投融资等活动,具有舆论传播能力、信息内容生产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人员^④。作为党的统战工作对象,网络人士在构成上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指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技术人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

收稿日期:2023-09-19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A070)。

作者简介:张佳慧,女,浙江红船干部学院文化与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互联网治理。

条例》明确将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一部分纳入统战工作对象。二是网络意见人士,指的是在互联网上“发声”的人,既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既有“红色”地带的,也有“黑色”“灰色”地带的,来源构成复杂、价值观念多元、政治态度分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应用与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崛起,网络人士将成为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性更强的概念^[4],所涵盖的人群也将进一步壮大与细分。

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在对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首次共同召开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主要内容进行解读时指出,“要把网络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统一战线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坚持分类施策,突出重点群体,做好培养使用工作”^[1]。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属于网络代表人士,主要为网络企业负责人、网站负责人、网络社团组织负责人、新媒体代表、电商代表、网络意见领袖、头部网红主播以及与网络、新媒体密切相关的行业领军人物,这些群体是统战工作部门应关注和开展工作的重点对象。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0.76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8%^[5]。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分别达10.44亿人、7.65亿人,占整体网民的95.2%、71%^[5]。随着自媒体用户规模、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不断增多,各类新型就业群体、新型职业从业人员的大量涌现,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二)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特征

准确把握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特征是做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发挥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积极作用的基本前提,也是探究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路径的重要依据。

1.“以网谋生”与“借网发声”:社会影响力大。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是掌控现代网络媒介资源的社会精英群体,是新媒体平台的经营主体和互联网的发声主体,他们在网络空间治理、舆论引导、创新创造、服

务社会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扮演着思想观念的引领者、网络舆论的监督者、网络正能量的传播者、网络文明的践行者、网络生态的维护者等角色,对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有着广泛影响。其中,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作为新媒体平台的主要搭建者和多元信息的第一接触者,将视频创作与直播、网络写作、在线教育等作为谋生方式,并凭借自身较高的专业知识和网络话语权威,对关键信息的解读及阐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意见领袖作为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生产者和意见气候的营造者,在微博、微信、知乎、小红书等网络舆论的汇聚地中拥有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他们不仅充当着大众传播与普通受众之间信息“中转站”的角色,更对网络民意的形成与聚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要充分发挥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影响力,使其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内容生产的主动创造者和积极传播者。

2.“最大流量”与“最大变量”:利益诉求多元。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处于职业结构的中上层,普遍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管理能力,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动机和诉求表达日益多元。作为社交、支付、搜索等“流量大户”的互联网企业主、新媒体行业负责人、领军人物等群体大多关心国家大政方针,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诉求,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希望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源于社会各个阶层、领域和行业,成分复杂多元,开拓创新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强,易于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潮,但思想多元、诉求多样、价值分歧等特征也会增加凝聚共识的难度。如何使最大变量转化成为最大增量,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都将是当前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面临的巨大挑战。

3.“圈层化”与“异质化”:群体内部差异较大。在社会阶层分化的大背景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内部“圈层化”特征愈加明显,每个圈层内部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同时,由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影响,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内部成员的政

治态度、政治立场容易呈现出较大差异,如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与网络意见领袖、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平台以及同一新媒体平台的不同岗位间收入差距均十分明显。这些差别不仅会造就不同群体以及群体内各类型成员不同的社会地位,还会形成复杂多元的价值观、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意向,并反映其正负效能。比如,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从业人员代表人士大多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参政议政意愿较高,对主流价值的认同需求也更为强烈,而追求以网络流量变现经济利益的创业型网红群体的政治参与相对不积极^⑥,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凝聚价值共识的难度,同时给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挑战。

4.“流动性大”与“分散性强”:联络与开展工作难度较大。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是互联网、新媒体等新业态的创新者和推动者,他们大多是某一领域的精英人士,以党外人士为主,具有岗位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等特点,经常在不同行业 and 不同所有制之间频繁流动,其内部分化组合的疾速已成为一种常态。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崛起,催生了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改变了生产生活治理方式,也促进了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范围愈来愈广、工作对象愈来愈新。由于门户网站、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以信息加工、生产和服务为主业的体制外新媒体平台从业人员,以及以线上产品销售为主业的网络主播、视频红人等以自由职业者居多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更加远离“单位”和“组织”^⑦,导致统战部门与他们的沟通联系难度较大,开展统战工作的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

二、浙江省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实践探索

浙江省是互联网大省、数字经济强省。截至2022年底,浙江省网民规模达5 642.9万人,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 631.6万人,占全省网民总数的99.8%^⑧。浙江省拥有众多知名互联网企业,孕育和集聚了一大批互联网行业领军人物、优秀互联网企业代表人士。浙江省是全国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2012年,浙江省开始在全国率先探索网络人士统战工作;2013年,温州市和台州

市开展网络界人士联谊会建设试点。同年,温州市成立全国首个地市级网络界人士联谊会。近年来,浙江省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推进”的原则,围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做什么、怎么做”的主题,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新路径。目前,浙江省11个地级市均成立了网络界人士联谊会,杭州、宁波、温州、嘉兴、台州等地已实现市、县及部分重点乡镇网络人士联谊组织的全覆盖。浙江省各地立足当地丰富的网络人士资源,努力组织和团结网络人士重点群体,通过发挥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专业特长,打造富有浙江特色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品牌,不断推动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搭建平台

平台是开展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基础,通过搭建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组织平台、活动平台、服务平台、实践创新平台等各类平台,能够有效整合线上线下统战工作资源,推动线上线下统战工作共促共进。同时通过发挥平台联系最密切、服务最便捷的功能优势,形成统一战线与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双向互动的场域。如嘉兴市南湖区打造数字化特色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蜂巢会”,面向南湖区电子商务(文创)产业园800多家企业,为优秀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创新创业提供人才政策支持、创业辅导、法律咨询等配套服务体系,汇聚网络人士统战力量共同助推数字经济发展。衢州市搭建网络人士“云议事”线上平台,引导网络意见领袖、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参与建言献策、话题交流等在线活动。同时,在钉钉直播平台上线“云监督”“云票选”等活动,引导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在线发声,激发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又如,杭州市上城区打造全省首个服务网络影视人才的“山南影视·同心荟”数字统战平台,全面挖掘影视基地的知名网络主播、著名网络作家等网络代表人士和网企精英,充分发挥网络影视人才这一领域重点群体的独特正能量及示范作用,引导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

(二)打造品牌

品牌就是名片,是增强统战工作辨识度、吸引

力、传播力的有效方式,通过找准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有效服务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及利益的交汇点,围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等主题,打造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品牌,以品牌效益有力提升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影响力。比如,宁波市奉化区充分发挥农村电商创客网络代表人士优势,创建“新农创·学习”“新农创·建言”“新农创·服务”“新农创·乡创”四大特色品牌,为当地网络代表人士搭建学习培训、建言献策、服务创客、创业创新等桥梁,拓宽农特产品线上推广销售新渠道,促进本土农创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杭州市余杭区深入挖掘资源,充分利用地区网络高管和优秀网络技术人才集聚的优势,创设内容创造型“e侠”、智能技术型“AI”、桥梁纽带型“华立”3个特色“同心荟”^⑩,积极打造具有区域辨识度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品牌,绘就网上网下同心圆。

(三)创设载体

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具有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结合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特点,通过创设学习教育、医疗、法律援助、公益直播、民生救助等服务载体,从而凝聚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思想共识,发挥网络人士重点群体不同类型成员的正能量。比如,义乌市搭建“圆点联盟”“数贸荟”等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载体,将全市网络“大V”、头部网红、电商直播代表人士组织凝聚起来,创新“直播+电商”模式,建立数字统战直播间,开展义乌好货直播助农、助企等“e网同心·聚力发展”直播带货公益活动,形成一批助力农企经济发展项目。杭州市滨江区统战部探索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新路径,创新打造“1+3+8+N”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载体,将互联网机构、知名新媒体企业负责人等重点群体纳入“中国正能量网红·同心荟”,并通过“同心荟”APP将更多优秀网络企业及代表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努力把网络资源的集聚转化为统战力量的汇聚。嘉兴市及各县(市、区)相继成立覆盖粉丝面超千万的“嘉和圈”新媒体联盟,紧扣建党百年重大时间节点,组织开展了“从南湖到西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杭嘉自媒体联动创作”传播活动,吸引两地

近百家自媒体踊跃参与红色研学、合唱盛典等多项配套活动,将更多网络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四)拓宽阵地

阵地建设能有效延伸统战工作触角,通过拓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阵地,不仅能形成可观可感的“同心圆”、有形有效的“功能网”、合力合拍的“朋友圈”,还能畅通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发挥作用的渠道,扩大统战工作的覆盖面,增强统一战线的向心力、凝聚力。比如,杭州市西湖区委统战部以阿里巴巴等多家代表性网络龙头企业为辐射点,组建“互联·同心荟”网络人士实践基地,将统战工作阵地拓展至内容生产传播载体、线上线下融合平台、移动互联网阵地,搭建政府与互联网重点企业、网络代表人士的桥梁纽带,推动西湖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质增效。义乌市成立全国首个网上党委及全省首个中共互联网行业委员会,上线互联网行业党建综合服务平台,发挥网上党组织和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舆论引导、服务群众、辐射带动作用,以党建引领带动更多优秀的网络主播、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性人士向党组织靠拢,拓宽网络统战阵地。杭州市拱墅区成立由新媒体运营、直播电商、MCN机构、供应链管理等企业代表组成、涵盖直播行业全产业链条的“拱墅星汇”直播联盟^⑪,通过推进校企合作,打造网络直播产教融合基地,赋能直播产业发展。

三、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优化路径

浙江省坚持以思想政治引导为主线,以平台建设为基础,以品牌打造为着力点,以阵地载体创新为突破点,以作用发挥为落脚点,探索出了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浙江经验、浙江样本。但目前还存在对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成员思想把握不足,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机制还不够健全,统战工作人员新媒体素养和应用能力不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优化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路径,推动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一)健全制度机制,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

1.健全工作制度。成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调研小组,对网络经济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

社团组织人员等重点群体人员开展普查登记,建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动态信息数据库,准确掌握各类群体成员的分布、层次结构、职业专长等情况。探索制定网络人士重点群体信息资源共享制度,齐抓共管、上下联动,形成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合力,实现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由“单枪匹马”到“智慧聚合”转变。建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发展形势跟踪和研判制度,动态掌握这一群体的新情况。健全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联动机制,发挥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党政领导干部联系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制度,加强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常态走访,通过座谈会、茶话会、谈心交友、走访慰问等方式,掌握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思想动态,及时了解他们的所需所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2.明确部门职责。构建由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宣传、网信、公安等相关部门参加及社会团体参与的网络化、社会化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完善各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强化各部门资源统筹协调。统战部门要发挥牵头协调、检查督办作用,重点做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思想政治引导、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等工作。相关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3.落实责任链条。将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以考核导向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将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及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积极开展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构建全域化统战工作网络体系,明确各部门分管领导和部门(单位)、企业、社团党组织统战工作责任人,明晰各方权责边界。建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大格局中的职责范围和任务清单,完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综合管理服务体系。加大对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经费投入,确保组织阵地平台建设以及联络联谊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注重思想引领,扩大凝聚共识覆盖面

1.强化思想教育。将培训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纳入统一战线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教育培训主体班

次,针对互联网企业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网络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代表人士、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网络意见领袖等不同群体成员,有针对性地开设学习培训班。根据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成员的“兴趣标签”,通过数字统战平台将社会主义学院、同心学堂、同舟论坛、浙沪同心微课堂等培训机构及资源进行整合和个性化推送。采取线上直播教学和线下理论学习、情景党课、现场考察、一线体验、主题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动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优越性,强化政治理论培训和形势政策教育,不断增进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提高学习培训和思想引领的实效。

2.着力培育培养。作为网络人士中的关键少数,新媒体负责人、网络意见领袖、网企精英等重点群体往往能发挥“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作用,收获“团结一个、影响一片”的效果^[10]。选择政治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社会影响大的网络人士代表组建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智库,将其中的优秀代表吸纳为统一战线新型智库成员,充分发挥他们在引导网络舆论、反映社情民意、加强民主监督、服务科学决策、助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和掌握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人员名单,逐级建立各类群体人才库,逐步建成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领军人物队伍,坚持分类施策,实行动态管理。把领军人物队伍建设列入统一战线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根据数字统战平台相应的数字工作模块,分析掌握领军人物成长轨迹,为他们“量身定制”不同的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发挥“一根头发”的作用,以关键少数影响大多数,以领军人物引导行业自律和带动平台载体的有效运行。

3.加大激励举措。对在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新媒体重点单位、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网络意见领袖等,纳入组织人事部门和工会、

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评选表彰活动及相关部门、单位的创先争优活动。充分运用电视、报纸、互联网、新媒体等平台,多角度、多形式加大对典型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推介力度,达到“宣传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的效果,进一步扩大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影响力和带动性,激发其内生动力。提高优秀网络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度,为他们更好地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创造良好条件。邀请优秀网络人士参加各类重大活动,列席重要会议,听取他们对重大决策的意见建议,引导他们与党同心同德,增强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创新工作载体,构筑网上网下同心圆

1.打造“党建+统战”模式。完善互联网行业党建工作体系,加强新媒体头部企业、互联网行业重点协会及商会的基层党组织覆盖,把统战工作融入基层党建重要内容,打造“党建+统战”的政治引领新模式。坚持政治标准,有计划、有重点地吸收优秀的网络代表人士加入党组织。鼓励有条件的互联网企业、新媒体平台、网络社会组织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机构,为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提供有利条件。依托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党委,制定加强对互联网、新媒体重点企业政治指导的实施方案,增强重点企业的政治意识和行动自觉。赋予建有党组织的新媒体重点协会、商会统战工作职能,指导推动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邀请互联网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等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参加所在企业、行业协会党组织或属地网络人士联谊会党支部理论学习、组织生活会,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引领。

2.搭建组织平台。按照“组织起来”的思路,选择创客园、科技园、孵化器园等网络人士重点群体集中的园区、楼宇等,打造网络直播、电商合作、创业孵化等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把分散的新媒体企业聚集起来,通过集中抓、抓重点实现立点扩面。打造一批“项目化+社会化”形式的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创新示范点,成立自媒体分会、网络直播分会、网络作家分会、网络游戏分会、职业电竞手分会、动漫行业分会等不同功能的网络联谊组织,为他们提

供学习、交流、培训平台,提升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成长发展的“创新力”。鼓励和支持导向正确、影响较大的新媒体平台、自媒体机构组建网络“大V”联盟,组建新媒体和自媒体等社会化媒体负责人队伍、网络宣传员队伍、网络评论员队伍等骨干人士队伍,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正向引导网络舆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展现正能量,在创业创新、网络扶贫等方面发挥独特优势。激发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参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发挥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唱响“网络好声音”,共绘“云端同心圆”。

3.扩大线上线下的“朋友圈”。从根本上来说,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政策性很强、艺术性很高、人情味很浓。“键对键”的网络统战方式不能完全取代“面对面”走心交心的统战工作方式。因此,要坚持线上和线下的互补联动。一方面,做好“键对键”线上互动,利用统战网站、统战APP、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与网络人士重点群体建立经常性线上联系渠道,提高统战工作的活力与实效。另一方面,做好“面对面”线下交流,把联谊交友作为开展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重要一环,将重点群体人员纳入各级党委、统战部门联谊交友的对象范围。切合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采取幽默生动、轻松活泼的“网言网语”和对话感、亲切感的语态方式来进行沟通交流,利用“网上说话”“云端见学”“云路演”“公益带货”等方式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在互动互信中增强其政治认同,增进彼此的情感联络和思想共融。

(四)加强队伍建设,注入网络统战新动能

1.提升专业能力。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推动各级党委(党组)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增进对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全面认识和把握。加强统战干部业务知识学习,提高网络统战意识、树立网络统战思维、善用网络统战方法,充分发挥统战干部网上网下“组织员”“宣传员”“服务员”“统战员”的作用。统战干部要主动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要求,顺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语境,提升新媒体素养,积极触网用网,

真正做到“找得到人、交得上朋友、说得上话、沟通得上、引导得了、团结得好”。

2.改进工作方法。统战干部要学会同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打交道并增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做到“跟得上”“融得进”“做得实”,既要务虚更要务实。根据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从业领域、专业特长、兴趣爱好、年龄结构等,利用数字统战平台定向发布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活动动态和服务信息,全时段、零距离保持在线联系和提供服务,展现出优质、高效、暖心的统战服务。同时,根据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的分布特点和行为特征,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方法、形式开展工作。比如,相较“开会”,他们更喜欢“沙龙”;相比“台上台下”,他们更喜欢“平起平坐”。注重寓政治引导于日常活动之中,以服务为基石,以引导为目标,用心用情,用情用力,把服务与引导有机结合,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实现思想引领、正向引导。

3.强化工作保障。着力破解基层统战力量薄弱的问题,加大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力量和经费投入保障。着眼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建立更加完备的网络统战人才储备和选拔机制,让更多掌握网络信息技术,了解统战理论政策及工作方法,又熟悉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特征和活动规律的优秀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入统战工作。同时,注重统战干部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锻炼,提升他们的统战理论水平、网络技术使用能力、新媒体运营能力,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复合型统战干部队伍。

结语

做好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对于巩固网络意识形态的主阵地、扩大凝聚共识的覆盖面、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探索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新路径,不断提升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数字化水平。大统战工作格局下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牵涉条线多的系统工程,由于网络人士重点群体正呈现出愈加复杂化、多变化、差异化的特征,这一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加强和改进网络人士重点群体统战工作,必须与时俱

进、持续创新、久久为功。

[参考文献]

- [1]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召开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会议[N].人民日报,2019-11-29(4).
-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 [4]陈喜庆.关于加强网络统战工作的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
-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3-08-28)[2023-09-11].<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199-10830.html>.
- [6]赵雷.网红群体的特征属性、社会功能与统战工作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4).
- [7]张佳慧.“互联网+统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分众统战问题探讨——以浙江省为例[J].理论导刊,2018(1).
- [8]《浙江省互联网行业统计报告2022》发布 浙江省网民超5600万[EB/OL].(2023-07-31)[2023-08-05].<https://www.zj.xinhuanet.com/20230731/23d8c789238b4cfeb396d51c2d42dca0/c.html>.
- [9]杭州积极探索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新路径 33个网络人士“同心荟”构建最大同心圆[EB/OL].(2021-01-19)[2023-04-23].http://www.qxzh.zj.cn/art/2021/1/19/art_1229075152_58903883.html.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6.

责任编辑:张淑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历史探索及其实践要求

辛 岳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 130024)

摘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式民主的新形态。从理论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理论源泉,西方民主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提供借鉴。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是团结带领人民探索、形成、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回答了“谁”当家作主的问题;建构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解决了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探索了法治民主和基层民主等路径,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广泛路径;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发展路径不断完善。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必须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理论溯源;历史探索;实践要求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7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50-07

2019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1]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持全过程民主”^[2]。“全过程民主”从政策和学术语言提升为规范性法律概念。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3]。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4]。2021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进一步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涵、制度安排和民主实践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体现,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

收稿日期:2023-08-22

作者简介:辛岳,女,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的经验结晶。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669}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民主的新形态。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文化滋养,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科学的理论源泉,西方民主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提供借鉴。

(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文化滋养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运行,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传统。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内生的民主,不是凭空而来的政治臆想,而是在充分汲取和继承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民本思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主要强调“民惟邦本”“立君为民”“民贵君轻”等理念。在西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战国时期,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认为,不论天子如何更换,朝代如何更迭,民众永远是国家社稷的基础,有民才有国,有国才有君。唐朝时期,唐太宗认同民众对国家发展的意义,重视对民众的关怀,将民本思想进一步发展。明清之际,以黄宗羲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主张以“众治”代替“独治”,其限制君主专制的思想蕴含着把人民作为国家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精神。尽管从政治理念上讲,民本思想与人民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民本思想蕴含着重民、爱民、利民的价值导向和国家治理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和核心,注重人民意愿的充分表达和有效实现,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理论源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主作出了丰富的论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理论源泉。第一,民主

的实现以建立民主国家为前提。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5]304}。列宁也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6]他们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或形式,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的腐朽统治,建立自己的统治,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争取民主、建立民主国家是首要任务。第二,民主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马克思把民主看作是目的,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5]421}。同时,民主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7]。第三,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以民主的真实性为区分。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资本家的虚伪民主,指出资本主义所谓的“全民民主”只是假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实现。相反,社会主义民主超越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8]11}。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具有广泛性的民主,强调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管理整个国家的制度”^[8]。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真正价值在于人民真实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提出了实现民主的前提,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奠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根基。

(三)西方民主思想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提供借鉴

西方民主源于古代氏族和雅典城邦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直接民主。随着近代文明的发展,现代国家纷纷建立,西方国家选择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代议制民主,推动直接民主向间接民主转换。在此基础上,一些西方思想家提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人民可以让渡权力给政府,实行分权制衡、多数决定等民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西方民主以私有制为基础,普选制、议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等不过

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近年来,西方国家将民主简化、异化、矮化为选举民主,将其提升到“普世价值”、样板标准的高度,其理论缺陷和实践弊端日益凸显。同时,西方政党竞争愈演愈烈,国家行政效率低下,政治不稳定,西方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民主治理危机和民主滑坡现象,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民主”逐渐褪下华丽的外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志之士在探寻国家出路时,纷纷介绍、宣传、模仿和移植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对中国找到适合自身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习借鉴西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民主等理念。同时,在学习、借鉴和反思西方民主的过程中,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的局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历史探索

回顾历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伟大创造”^[9],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追求人民民主伟大实践的重大成果,在党的奋斗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的孕育与探索

民主是由历史定义的。1840年以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国革命首先面对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探索并实践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拉开了探索人民民主的序幕。

争取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之奋斗的目标。1921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10],初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目标。1922年,中共二大把“民主”纳为革命的奋斗目标,倡导建立民主主义统一战线。1925年,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11]。可见,党在早期实践中就认识到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使命和

建立统一战线以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学习“苏维埃”民主形式,进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实践。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苏区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劳苦大众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但这一时期,“人民”是“纯粹意义上的‘无产者’”^[12],具有阶级局限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根据地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以阶级成分划分选民资格的原则,扩大了边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提出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三三制”民主政权方案,开创了与党外人士会议协商、会下协商等协商民主合作形式,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尝试。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合作,一致反对独裁统治。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验,就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3],实现了党的主张由抗日民主政府向人民民主政府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人民民主的目标和人民主权思想,对人民政权进行探索,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民主合作,在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开启了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新征程。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基本建构

新中国诞生和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为形成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构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首先,党领导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阐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但是,1949年中国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新政协

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发出各城市和县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指示。在中央的号召和动员下,1950年到1952年,全国各地出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高潮,“到1952年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已全部召开”^[4]。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广泛实践并推向城乡各地。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角看,这一制度创设了崭新的民主政治结构。一是由人民选举人大代表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破解了如何建立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的千古难题。二是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接受监督,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重要保障。三是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各项法律和制度体系,确保人民依法依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建立以来,使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

其次,我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协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协商宪法实施等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以后,针对有人提出“政协没有必要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5],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合作的重要性。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能够保证各利益主体表达利益诉求和共议大政方针的权利,还能起到有效监督的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确处理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为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

的广度和深度,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第三,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将民主的范围推广至各民族地区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又一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结构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历史传统、民族分布特点结合起来,提出了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位。宪法颁布后,我国先后成立一批民族自治地方,为民族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从全过程人民民主来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拓宽了民主的范围,保证了少数民族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主制度是实现民主目标的载体和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基本建构了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确保了民主的广度、深度和范围,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法治民主和基层民主逐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建设主要集中在法治民主和基层民主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法治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基层民主调动基层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以此推动人民民主持久健康发展。

在法治民主建设上,党不断探索民主法治化建设,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在总结和反思民主政治得失的过程中,将民主法治建设提升到重要日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法制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1978年,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6]1982年,在制定宪法时,他进一步强调:“四个现代化,特别是高度民主、高度文明,过去

没有反映到宪法里,这次要反映进去。”^[17]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将法制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党的十六大明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8]53},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三统一”原则。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互为表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建立、运行和实施需要法治予以确认、规范和保障,法治的制定和运行等各个环节需要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推动我国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奠定法治根基。

在基层民主建设上,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丰富的基层民主实践形式,将民主深入到社会治理的基层。民主不仅需要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和引导,而且需要群众的参与实践。只有调动广大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民主才具有真实性、广泛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农村、城市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探索。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1982年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明确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扩大基层民主”的政治建设目标,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18]54}随后,党的十七大确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基层群众自治以人人参与为特点,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感。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展人民民主的经验,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高度重视协商民主发展,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2012年,中共中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发展的重点和突破口,正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形态。2014年,习近平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强调要切实落实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为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至2016年,中共中央密集出台了6个关于推进和落实协商民主的文件,各级党委和政府建立健全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目标成效显著。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性及任务,赋予其更加深刻的国家治理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并指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9]。协商民主融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环节,是群众民主参与的主要方式。目前,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领域、在涉及群众利益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有所运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多方合力、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方向;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制度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一)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环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9]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发展人民民主,领导人民创造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新时代,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一是把党的领导落实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个领域。要积极拓展经济民主、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的范围,促

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全面发展,从多维度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路径。二是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党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领导方式和方法,依照宪法、法律和法规规范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方向。三是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各环节,推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环节的衔接和互动。

(二)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政治制度化、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一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民意表达功能。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要充分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选举权,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完善代表候选人介绍制度,健全人大代表候选人同选民见面机制,增强人大代表选举的民意基础。优化人大代表组成人员结构,提升人大代表履职能力,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二是发挥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要加强立法工作,从法律层面明确各协商主体的性质、地位、职能,完善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用制度程序保障协商民主有序开展。完善协商渠道,在做好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的基础上,逐步探索跨界别的协商、恳谈协商、网络微信协商与社会公民协商。运用现代互联网、移动端等电子信息技术对不同平台相关公共事务的意见、建议进行收集、分析,拓宽面对面的协商形式。三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法律和现实需要制定完善有关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确保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全面贯彻实施。加大扶持力度,制定有利于提升民族地区开放度、促进民族经济加快发展的政策。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优势 and 后发优势,针对不同区域,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培植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把政策动力和内生潜力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发展基层民

主,增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活力和创造力。发挥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自治、德治、法治联动建设,调动基层群众投身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广大群众在基层治理和政治参与中增进民主获得感,增强政治认同。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价值取向。一是探索搭建精准化互联网平台,开辟联系群众、反映民意的新渠道。一方面,通过面对面的平台听取群众呼声和意见,反映群众诉求;另一方面,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了解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二是增强群众自我管理实效,巩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激发社会活力;发展群众自我服务功能,创新机制和平台,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切实做到“事事有人管”;调动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以群众自我监督促进社会和谐。三是完善人民群众民意反馈机制。完善处理反馈机制,及时了解群众问题解决程度。四是大力培育现代公民文化,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支持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参考文献]

- [1]张毅,廖文根,徐隽,等.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N].人民日报,2023-03-03(1).
-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3).
-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1.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67.
- [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马克思、斯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200.
-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
- [10]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
-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 [12]闫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一项观念史的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00.
- [13]董必武.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1.
- [14]刘政.建国初期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J].中国人民大学,2002(9).
- [15]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218.
-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4.
- [1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责任编辑:张淑瑛

(上接第42页)

- [11]燕胜三.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的指路明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的心得体会[J].甘肃政协,2020(3).
- [12]杨卫敏.新时代人民政协的统战责任和功能机制研究[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
- [13]聂家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 [14]高奇琦,李阳.公共政策的解释主义范式:发展历程、民主意蕴与实践限度[J].中国行政管理,2022(11).
- [15]王锐,安林瑞.人民政协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时代价值、内涵结构和机制建构[J].甘肃理论学刊,2023(2).
- [16]张效廉.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12).
- [17]石东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溯源——基于习近平福建足迹的阐释[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22(4).
- [18]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闽山闽水物华新 习近平福建足迹(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76.
- [19]侯东德,张丽萍.新发展阶段人民政协工作创新发展研究[J].甘肃政协,2022(1).
- [20]蔡戎.各级政协委员体会感悟[J].政协天地,2022(5).
- [21]习近平论爱国统一战线[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3).
- [22]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在京召开[N].人民日报,2020-07-21(1).
- [23]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N].人民日报,2019-06-27(1).

责任编辑:刘菊香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探究

——以广西为例

张淑璇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社会主义学院与各民主党派共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是社会主义学院助力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路径。近年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将自身共识教育优势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积极打造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聚焦“识、研、看、听、问、评”开展教学,突出实践教学基地的特色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标准化、实践教学基地管理的规范化、实践教学基地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以及实践教学基地效能的最大化,探索建立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的“院地共建”模式,取得了较好成效。当前,应从加大对实践教学基地的开发利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激发学员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着力,进一步建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

关键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8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57-05

202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强调“要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供给与需求精准匹配,更好满足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干部需求,不断优化教育培训方式方法,进一步增强教育培训的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1],对新时代干部培训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参政党的“细胞”,担负着反映民意、协调矛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助力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创新路径。近年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将自身共识教育优势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实际相结合,与广西各民主党派共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有效地增强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活力、凝聚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了民主党派成员履职能力和水平。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项目:2023年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一部一题”课题(GXSYYBYT202307)。

作者简介:张淑璇,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多党合作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多党合作制度、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

一、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民主党派成员提高履职能力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是参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载体。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参政党组织的根基,大量的成员都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开展活动,民主党的党务活动主要依靠基层组织落实,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更是要依托基层组织。可以说,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联系成员、服务所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民主党派成员交流思想、参政议政、增强凝聚力的依托和载体。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仅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学院党外人士教育培养工作的针对性,还有助于增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活力、凝聚力和创新力。一方面,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是社会主义学院助力民主党派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能够让社会主义学院教研人员走出课堂、走进实践,尽可能地摸准问题的脉搏、把握民主党派基层工作的节奏,及时总结和改进教学方式方法和内容,以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具有自身特点,它包含了理论授课和实践教学两大模块。与传统的课程授课相比,学习更为系统,涉及面也更广,能够充分凸显干部教育培训实践的应用性特点,更加有效对接学员培训需求,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助力提高民主党派学员履职能力和水平。

(二)有助于帮助解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具体问题

组织建设是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各民主党派认真贯彻落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各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地方基层组织建设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如个别年轻基层组织负责人在如何加强民主党派成员思想政治建设、如何开展民主党派活动、如何提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活力等问题时无从下手,缺乏思路对策。实践教

学基地的建设,能够使民主党派成员、党派机关干部和社会主义学院教员在开展教学活动中,通过相互启发、交流讨论形成思想碰撞,最终群策群力、博采众长,以众人智慧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能够让从事统战工作的领导干部通过实践教学基地这一平台,走近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贴近基层民主党派成员,真正了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建设过程中的困惑与困难,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

(三)有助提升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培训实效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明确规定,干部培训院校要开发一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学案例和现场教学点,深入研究理论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搭建理论学习网络平台,不断增强理论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2]。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学院应当加强教学方式方法研究,综合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和网络培训工作^[3]。近年来,各地社会主义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和《条例》要求,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着力提升教学培训的实效性。现场教学法是基于传统干部教育的一种教学方式上的创新,它需要教员和学员同时深入现场,通过对现场事实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总结可供借鉴的经验,或凝练观点和经验,从而提高学员运用理论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4]。实践教学法是对现场教学法的延伸与扩展,它通常是在现场教学中通过组织、引导学员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教学活动,从而不断提高学员的现场感知能力、实践认知能力和理论觉悟水平。实践教学法具有教学目的明确性、参与体验的直观性、选取案例的典型性、实地调研的积极性和研讨交流的互动性的“五性优势”,更符合干部教育培训院校的实际要求,也更容易引起学员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碰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广西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紧紧围绕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这一中心主题,多层面、多角度地探索深化实践教学基地作用

发挥,充分利用基地的资源和优势,抓特色、重实效,在提高培训学员理论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其实践能力,达到学用转换、学用相长的目的。

二、广西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主要做法与经验

为适应民主党派政治交接形势任务,针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现实问题,自2017年起,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积极探索与广西各民主党派共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截至2023年6月,共建教学基地9个,实现了对广西各民主党派的全覆盖。实践教学基地作为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的第二课堂,在开展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理论研究、发挥优秀基层组织建设典型示范作用、展示民主党派工作实践经验、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各方面建设、提高民主党派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加强教育培训效果和促进教研咨一体化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窗口作用。

(一)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基本情况

实践教学基地是现场教学的大课堂,是凸显教学主题、实施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更是彰显培训特色、提升培训实效的重要平台。因此,基地的选择、打造、运用关系教学培训的效果。为此,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前期,多次到广西各民主党派区委、市级统战部门开展专题调研,根据广西各民主党派和统战部门的推荐,实地走访考察了部分先进典型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充分了解各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特色亮点的基础上,共建设了9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这9个基地分别是民革广西区委会“党员之家”实践教学基地、民盟区直文化基层委“盟员之家”实践教学基地、民建区直文化支部南宁青秀区古岳坡实践教学基地、民建桂林市“会员之家”实践教学基地、民进南宁市江南区五一支部(江南区五一中路社区)实践教学基地、农工党南宁市委“党员之家”实践教学基地、致公党桂林市秀峰一支部“广西仁者社会服务中心”实践教学基地、九三学社钦州市“社员之家”实践教学基地、台盟南宁市支部“盟员之家”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各级统战部

门、民主党派组织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支持与肯定,各基地挂牌至今共培训学员600余人,接待区内考察参观人数8000余人,其中接待区外(包括海外)参观团组130多批,在增强教学培训实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实践教学基地教学内容及主要做法

在实践教学基地开展教学活动中,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围绕“识、研、看、听、问、评”六个关键字开展教学。“识”就是教师在院内课堂授课中安排参政党建设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等课程,使学员在开展实践教学前熟悉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基本知识,提升对基层组织建设的理性认识水平。“研”就是研讨交流,教师组织学员围绕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实际问题开展交流和互动,参加研讨的学员将个人思考与集体智慧相结合,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对策”的方式,使思想得以碰撞从而实现理论的提升。“看”就是教师和学员共同进入实践教学基地现场,让学员深入、直观、具体地感受基地的现场素材,部分实践教学点还结合实际情况安排学员亲身参与基层组织活动的开展,使学员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路径。“听”就是倾听基地负责人介绍实践教学基地的相关情况,了解他们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的经历体会、工作思路和心得感想。“问”就是座谈交流,学员将自己的所思所感所看所想,与专家、教师和同行进行交流互动,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评”就是教师进行点评提升,负责授课的教师从事实材料中总结规律,从交流互动中提炼观点、画龙点睛、升华教学的目的。

(三)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主要经验

在基地建设使用中,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通过“五化并举”,全方位提升实践教学基地的教学质量,形成民主党派基层实践教学精品线路,有力提升现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是突出实践教学基地的特色化。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在打造实践教学基地的时候,依托各个基地的特色、文化和品牌,撰写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现场教学系列课程设计》,实现一地一特色,一地一精

品。二是坚持教学基地建设的标准化。严格按照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现场教学基地建设要求和教育培训需求来建设现场教学基地,每个实践教学基地按照“六个一”的标准化模式开展,即一份材料、一组展板、一个图书角、一个视频、一支队伍、一场特色活动,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案,明确现场教学的主题、内容、步骤、线路、形式等。三是着力推进实践教学基地管理的规范化。研究制定涵盖现场教学基地确定、建设、使用、评价考核全过程的相关规范。四是实现实践教学基地教学内容的多样化。通过活动体验、故事宣讲、座谈交流、音像介绍等方式,开发相应的教学专题。五是着力提升实践基地效能的最大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后,有效整合了社会主义学院和各民主党派的资源,通过课堂教学与院外实践相结合,使实践教学基地成为展示多党合作新作为、民主党派建设新窗口和宣传民主党派知识新载体,为广西多党合作事业注入了新活力。

三、进一步建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实践教学基地的思考

(一)加大对实践教学基地的开发利用

具备一定数量的优质实践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的贯彻实施,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工作力度持续加大,各地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任务和培训人数持续增加。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党外干部培训的需求,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实践教学基地的开发利用力度,即做优基地存量,扩大基地增量,提高基地质量。一是坚持优化已有基地存量。在打造实践现场教学中,一方面要以高效、深度调研为抓手,依托民主党派资源优势,结合社会主义学院实际情况,不断创新基地的教学方式方法,推进由单一课堂讲授教学方式向“理论+研讨+现场教学方式”实践教学模式的转变,努力打造符合党外代表人士培训需求的精品实践教学基地;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进行梳理,根据其评价的高低和利用频次采用动态优化,同时开展基地评选活动,对优秀等次的基地给予一定数额

的经费补助。二是持续扩大基地增量。在实践教学基地的后期打造中,既要立足区内,又要放眼全国。要根据培训对象的变化及培训需求的发展趋势,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考察、推荐调研、主动问询、网络查询等方式,不断开发新的实践教学基地,力求建设一批布局合理、类型齐全、特色鲜明,能够满足不同培训对象需求的实践教学基地。立足区内,就是以本地优势资源为支撑,在全区14个地市挖掘具有典型性、指导性、特色性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教学实践基地,形成本土实践基地的网状布局;放眼全国,即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区外兄弟社会主义学院以及民主党派组织工作做得较好地区开展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当地优质资源,发挥协同互补优势。三是不断提升基地质量。进一步推进已有实践基地创新成果运用,促进已有基地优化升级,力求将已有基地打造成为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示范带动力大的领头羊,实现社会主义学院培训效能和基地影响力的双提升。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提升授课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知识储备。负责授课的教师既要做到专博结合,又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既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要具备授课的语言艺术、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授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说服力;既要能沉下心,刨根问底、探其究竟,又要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另一方面,要提升实践基地现场解说人员的能力和素养。引导讲解人员掌握现场讲解技巧,创新现场讲解方法,提高现场讲解能力,切实提升现场解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条件成熟时,对实践教学基地解说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培训形式可采取专题讲授和现场示范开展,培训内容以声音塑造、形象打造、语言表达、讲解词的撰写和政务接待礼仪等方面为主。二是提高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建立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保障必要的研究条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等举措,为教师成长进步提供坚强有力保障。三是提高教师授课的水平和质量。组织授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基地课程打磨工作活动,通过试讲、点评、总结、汇报、评估等活动,切实提

高教师授课质量。四是加强实地调研。实践教学基地要逐步组成教学团队,形成优势互补,团队成员要结合干部培训实际和培训要求,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挖掘、归纳总结本地资源、亮点和特色,逐步将各个教学点进行并线串联,形成行程上合理衔接、内涵和认知逻辑上无缝对接的实践教学路线。五是加强研学交流。组织授课教师赴周边兄弟院校、区外先进地区进行研学,学习他们在民主党派干部实践教学中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

(三)激发参训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是以目标为导向,力求教学效果“实在管用”。在教学前要做好学员需求分析,充分掌握实践教学的亮点、痛点、堵点,了解学员的实际需求和兴趣点,在实践教学基地的选点、主题的确定、教学方式的选择上有所侧重,提升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带着问题学习,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理论上解决问题,引导学员“学学相长”,充分发挥学员的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三是拓展延伸实践教学基地的“半径”。一方面可在实践教学开展前通过组织学员开展研讨交流、读书分享、微论坛、团队建设等多种形式,让学员在思想碰撞与学习交流中打破沟通壁垒、形成团队合作意识,以防实践教学中学员互动不足、教学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主题教室等教学资源,授课教师将主题教室功能设计生动地展示给学员,通过沉浸式教学引导学员身临其境、深入探讨。四是加强对学员的规范管理。学员管理是干部教育培训管理的重要内容,是促进院风和学风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提高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的重要保障。学员工作部门应积极探索学员管理的方式方法,完善学员考核评价办法,引导学员及时做好角色转化,积极参与实践教学活动。五是完善实践教学基地的总结与评估机制。建立完善实践教学基地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听取汇报、会议座谈、实地考察、随堂听课、查阅资料、个别谈话、问卷调查等方式,定期对实践教学基地现场评估和总结。通过评估,教师能及时发现现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提升培训质量和效益。评估后,教师团队在集体会商基础上,总结

归纳各个实践教学基地的工作成效和存在不足,提出意见建议,形成反馈意见。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二〇二三—二〇二七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N].人民日报,2023-09-01(1).
- [2]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N].人民日报,2018-11-02(5).
- [3]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N].人民日报,2018-12-26(1).
- [4]浙江行政学院课题组.现场教学法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5).

责任编辑:杨绪强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探究

陈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2)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将促进各民族紧跟时代步伐,团结奋斗、齐心发展、共同繁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意蕴,有利于在世界维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家维度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在社会维度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个人维度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要以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纽带,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民族工作;“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09

[中图分类号]D619;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62-09

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余年来的辉煌历程,党始终高度重视做好民族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通过实践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3]。我国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4]。这为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向未来,习近平指出:“没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5]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事业取得新辉煌,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彰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6],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

收稿日期:2023-08-03

作者简介:陈力,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

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时代价值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其在世界、民族、社会以及个人等维度上都有着丰富的时代价值意蕴。

(一)世界维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两个大局,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世界正处于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中国式现代化显著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3]。各个民族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由诸多共同体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中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是在统筹各民族利益、尊重各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的剥削压迫、暴力侵略、强行掠夺、奴役压榨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以各民族、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取向,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统筹了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5]。中国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全球性视野以及世界性贡献。

(二)国家维度: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我国在现代化建

设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阻碍,西方敌对势力持续对我国边疆地区进行“西化”“分化”,威胁到我国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受到外部势力干扰^[6]。因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可以有效应对美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一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干部,能够更好地发挥新时代民族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协调民族关系和推动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毛泽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7]新时代随着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干部需要始终保持忠诚、执着、朴实的品格,坚定不移维护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从而不断书写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佳话^[8]。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是法治更加健全的现代化,能够促进依法处理民族事务,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9]。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能够提升民族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平,从而促进民族地区人民主动地反对分裂势力,自觉地与民族分裂主义作斗争,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能够促进民族地区教育的现代化,帮助民族地区人民更好地辨别国际敌对势力和各种民族主义思潮,自觉反对各种危害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行为,坚决抵御民族分裂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对民族地区的渗透。

(三)社会维度: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追求^[1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1]中国式现代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仅包括不同地区的共同富裕,也包括56个民族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既能推动民族地区人民的物质富裕,同时能推动民族地区人民的精神富裕。

一是在物质层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推动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供给民族地区更多的公共产品,提升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能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二是在精神层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有利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繁荣民族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1]。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助于推动物质与精神双层面共同富裕,从而让全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新高度。

(四)个人维度: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也是现代化的对象,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实现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道路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5]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满足个人发展所需要的丰富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条件和支持。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构建人与社会和谐的关系^[1],超越人与社会形而上学的对立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能够通过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扶持政策,提升民族地区人口的综合素质,提升民族地区教育文化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能够通过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医疗扶持政策,提升民族地区人口的身体素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能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民族地区建设与发展,从而不断提升民族地区人口的文明素质,提升凝聚力和向心力,等等。三是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道路同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突出自然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性^[16]。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民族地区人民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理念,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有利于民族地区更好地实现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切实感受到良好生态环境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2]。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应以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纽带,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受命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危难之时,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17]。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及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中国现代化经历了“根本社会条件已经具备”“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全面夯实”“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丰富的物质条件基本奠定”“中国是现代化道路成功开创”的过程^[18]。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始,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随着中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民族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持续进步,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19]。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20]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关乎大局、关乎全局^[20]。从立足本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措施和政策,推动各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参与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推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效。从面向未来看,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提升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完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21]。新时代新征程开展民族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新局面,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

(二)锚定历史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式现代化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过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伴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结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是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的两个伟大目标,接续实现的两个伟大结果^[22]。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的历史进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23];另一方面,我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更有信心和力量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4];我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创造新的发展奇迹^[24]。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要以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伟兴为目标。习近平强调:“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25]因此,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要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民族团结进步和社会和谐的伟大事业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是在历史文化层面,中国过往的辉煌和璀璨的文化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习近平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5]二是在内容层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容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本身包含着在国家层面解决民族问题,推动民族发展,同时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中华民族问题具有同源性、同构性和同质性^[26]。三是在道路层面,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多年历程,明晰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百年经验和成就,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一直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27]。

(三)把握鲜明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报告,载入党章,成为指导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政治理念、工作指向和基本遵循^[2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动各民族共同现代化的基本遵循^[29]。

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道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牢牢遵循“五个认同”。一是增进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这本质地要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将判断实践和行动的标准确定为是否符合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将爱国主义融入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成为每一个社会公民基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二是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30]要紧紧把握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中华民族是国家层面的民族、强调一体性,各民族表现多元性,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体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各民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文化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是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始终明确自己的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1]。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奋斗,奋发向前。五是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8]。

(四)辩证重要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习近平强调:“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9]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在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中确保不断增进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科学统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和各民族的具体利益。一方面,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底色,是各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是推

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回顾党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地理上交错杂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32]。因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需要将共同性渗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关系。现阶段,仍存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考虑不同民族的实际需求,对于差异化、区域化的问题需采取精准化、针对性措施。具体来说,一是要尊重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信念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从而激活中华文化的活力。二是尊重和包容各民族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等,从而更好地将各个民族意识整合到中华民族意识的整体当中,夯实中华民族最广泛的认同基础^[33]。三是尊重各民族自身的发展需求和利益诉求,尊重各民族实现发展的正当利益追求^[34],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不断缩小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的差距,扎实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富裕。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目标体系。因此,应当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

(一)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科学解决民族问题,能够不断根据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35]。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持、政策和发展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抓手^[36]。

在实践当中,应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一方面是要继续坚持“两个结合”,即坚持统一与自治相结合,坚持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37]。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以维护国家统一为先决条件,必须承担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义务,在此方面必须接受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监督。另一方面是要深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夯实法治基础,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深厚的法治基础,如1984年根据《宪法》规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法进行的修订以及2005年《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出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形成完整的、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支持^[38]。

(二)在经济建设方面,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同时提出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重要特征之一。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一切问题的关键^[39],新发展格局下促进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

在实践当中,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一是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民族地区提供更加公平的发展机遇,让民族地区企业公平地参与市场当中。民族地区可以利用自身的地理条件优势,如西部地区温度符合散热要求、土地价格优势等让更多主体选择民族地区建设大数据服务中心,从而更好地带动数字经济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新发展格局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提高对外开放质量是民族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途径。民族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展开与各地的经济交流合作,从而优化自身产业布局,实现经济发展^[40]。三是发展自身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极具民族特色的地方产业,着力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地区特点的产业品牌,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三)在文化建设方面,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的内在特征,也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指向。增强文化认同与坚定文化自信,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重要路径^[41]。

在实践当中,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是要加强文化交流互鉴,为凝聚共同体意识筑牢文化根基。坚持共同性与一致性相统一,正确处理好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饮食习惯、民族服饰、建筑风格、节庆礼俗等,让各民族文化能够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42]。二是要引导各族群众认可马克思主义,增进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同。三是要积极开展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增强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四是弘扬英雄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英雄史观,通过宣传各民族一起开拓辽阔疆域、一起书写悠久历史、一起创造灿烂文化、一起

培育伟大精神等来强化党史国史教育、国情民情教育,以英雄精神激励各族人民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四)在社会建设方面,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民族在互动中加深了解,拉紧共同利益与情感纽带。”^[43]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动态的互嵌式社会结构^[44]。新时代新征程,大力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在实践当中,要着力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立互嵌式社会结构。2022年国家民委实施了“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和“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三项计划,以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45]。一是坚持加强各族青少年交流。坚持东西协作,实现各族青少年交流常态化、制度化、规模化,组织多种多样的夏(冬)令营,举办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研学活动,推动各族青少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联谊联心。二是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鼓励民族地区群众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就业创业,同时支持东部、中部地区群众前往民族地区就业创业,鼓励各族群众跨区域流动,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搭建新平台、拓展新空间、提供新便利。三是坚持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民族地区旅游供给,不断满足各族人民的旅游需求。以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为目标,赋予民族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新内涵,打造新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业态,发挥民族民俗文化优势以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46]民族地区拥有全国75%的草原面积、66%的水资源、42.2%的森林面积,是国家宝贵的生态功能区^[46]。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的高度重视和居民对绿色产品的迫切需求,为民族地区的生态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为推动民族地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发展,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机遇。

在实践当中,要着力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多次强调,民族地区是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要以生态富民为切入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维系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推动民族地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47]。要推动民族地区全面融入生态文明现代化。一是民族地区应坚持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守住“绿水青山”的底线,坚持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统筹保护好和利用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及资源^[48]。二是着力推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大力扶持绿色产业,加强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技术合作,支持民族地区以高端技术实现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三是加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教育,培养民族地区人民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将森林文化、花文化、竹文化、茶文化、湿地文化、生态旅游文化、绿色消费文化等生态文化融入生态文明和价值观的培育之中,形成尊重、热爱、善待自然的社会生态氛围^[49]。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刘晓霜,纳日碧力戈.高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个视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
-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 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2).
- [4]孙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重逻辑[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1).
- [5]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2021-08-28)[2022-11-26].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08/28/c_1127804776.htm.
- [6]黄金辉,陈崇仁.国民意识培育: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内核及其进路[J].探索,2022(1).
- [7]沈向兴,周月,李娅婕,等.新时代民族团结精神:建构与解析[J].云南社会科学,2022(1).
- [8]李学保.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1).
- [9]秦宣,陈金龙,杨凤城,等.新时代新征程向新目标进军思想和行动指南(五篇)[EB/OL].(2022-11-25)[2022-11-27].<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036.d.20221125.0927.004.html>.
- [10]高承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意义与铸牢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12).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14.
- [12]雷振扬,韦贵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论析[J].西北民族研究,2022(1).
- [13]魏莉,李少霞.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实践探索[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14]王希恩.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和时代化[J].西北民族研究,2022(6).
-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39.
- [16]王婷,李少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的全面发展[J].理论视野,2022(6).
- [17]唐亚林,郝文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建构与路径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 [18]秦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J].教学与研究,2022(10).
- [19]郝亚明,杨文帅.新时代新征程做好民族工作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与实践指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
- [20]傅锁根,解佳钰,秉浩.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2(1).
- [2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22]陈金龙.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6).
- [23]韩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N].人民日报,2022-11-01(3).
- [24]蔡为民.牢记“三个务必”确保“三个不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12).
- [25]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9-09-27)[2022-11-26].<https://www.neac.gov.cn/seac/xwzx/201909/1136990.shtml>.
- [26]张淑娟.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J].广西民族研究,2021(6).
- [27]丁守庆,李元斌.从三个维度理解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内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
- [28]郎维伟,陈瑛,张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9]杨昌儒,祖力亚提·司马义,郝亚明,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2022(1).
- [30]张龙,马昌富.试论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创新[J].民族工作研究,2017(4).
- [31]本书编写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

- [32]麻国庆.同步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N].光明日报,2022-03-10(4).
- [33]陈智,赵冬,金浩.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1).
- [34]马成明,崔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健康发展的“五位一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学刊,2022(11).
- [35]刘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完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百年回溯[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7).
- [36]朱俊.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成就与经验[J].民族研究,2022(2).
- [3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0.
- [38]李乐,杨显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纲”[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
- [39]李曦辉,陈温都苏,杨新文.新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J].区域经济评论,2022(2).
- [40]张秀萍,刘常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引擎及演化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41]陈育宁.中华民族历史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
- [42]董辉,孙少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向度[J].贵州民族研究,2022(5).
- [4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111-112.
- [44]许奕锋,李功员.民族共同体心理认同视域下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J].观察与思考,2022(7).
- [45]国家民委.2022年将实施三项计划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EB/OL].(2022-01-25)[2022-11-26].
http://www.gov.cn/xinwen/2022-01/25/content_5670272.htm.
- [46]黄泰岩,詹筱媛.民族地区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战
- 略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 [47]沈桂萍.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
- [48]李丽媛,胡玉杰,李明昕.民族地区“两山”耦合协调评价与时空分异研究[J].生态经济,2022(12).
- [49]林庆.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责任编辑:何文钜

左江花山岩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

——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之一

覃彩銮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南宁 530028)

摘要:分布于广西左江及其支流两岸的花山岩画,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骆越绘制的艺术杰作,是当时骆越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形象反映,并以其数量众多、规模宏大、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和具有多重价值闻名于世,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花山岩画绘制过程中,骆越人将其部族在社会活动中吸收和融入的中原文化元素反映到岩画上,丰富了岩画内容,为岩画增辉添彩。左江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左江花山岩画;中原文化元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西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10

[中图分类号]C956;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71-07

广西左江流域及其支流两岸悬崖峭壁上的花山岩画,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居住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骆越绘制的艺术杰作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当时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仪式集体拟蛙舞蹈场景的形象反映,集中反映了壮族先民的社会生活、文化风貌、思想观念、艺术特色和精神文化。在整个花山岩画中,以宁明县明江南岸的花山岩画规模最大、图像最多、内涵最丰富。在沿江一处一面宽210米、高约50米的崖壁上,密集分布着1890多个赫红色图像,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规模最大、图像最多的一处单体岩画,堪称左江岩画的代表作,因而将左江及其支流沿岸发现的岩画,统称为“花山岩画”。从左江上游

的龙州岩洞山到下游的扶绥县镇龙山,分布着82处岩画,绵延200多公里,形成了一道规模壮观的露天岩画长廊。因岩画分布密集、规模宏大、图像众多、形体高大、内涵丰富、风格独特,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首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岩画,也是广西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左江花山岩画是骆越文化、信仰和艺术风貌的形象反映。无论是岩画分布、画面上程式化的举手蹲足的拟蛙舞形态,还是由正身、侧身人物、钟鼓等图

收稿日期:2023-08-05

作者简介:覃彩銮,男,广西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壮族历史文化。

像构成的组合形式,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同时也包含有诸多中原文化元素,反映了中原文化南传和骆越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吸收与兼容。所以说,左江花山岩画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通过对左江花山岩画反映的文化艺术特色和蕴含的中原文化基因的辨识与解读,诠释中原文化对骆越文化乃至左江花山岩画艺术的深刻影响,揭示自古以来广西各民族及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广西各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研究,增进人们对壮族及其先民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和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认识和了解,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

一、享誉世界的左江花山岩画

穿流于广西西南部崇山峻岭之中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黑水河沿岸 200 多公里的灰黄色悬崖峭壁上,分布着 82 处岩画,其中龙州县 21 处,宁明县 7 处,崇左市江州区 29 处,扶绥县 23 处,大新县 2 处。这些岩画经历两千多年的阳光照射和风雨侵蚀,其赫红色图像依然清晰鲜艳,在灰色山崖和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焕发出神奇的艺术魅力。

岩画皆使用赫红色颜料绘成。画面图像由人物、动物(犬、鸟类)、乐器(铜鼓、钟、铃)、兵器(刀剑)等组成。人物是主体图像,占全部图像总数的 90% 以上。人物、动物和钟类图像均采用色块平涂法绘成,其形态呈剪影式,犹如人、动物的“影子”。人物图像有正身和侧身两类,正身人物高 0.8—1.2 厘米,最高的达 240 厘米(宁明花山);侧身人高 0.6—1.0 厘米,有的图像画有明显的男性(生殖器)、女性(孕妇)特征。正身和侧身人物图像的手足姿态基本相同,即双手曲肘上举,两脚交叉开呈半蹲姿势。各处画面的人物手足姿态大同小异,呈高度雷同化。动物则以犬类居多,皆侧身,且多处于图像组合中心的高大正身人物脚下方;鸟类亦侧身,处于画面中心高大正身人物头上方,但数量较少。乐器类以外圆、内带芒星的铜鼓图像居多,或成组排列,或处于画面中心高大正身人物脚下方,或处于侧身人群队列的上方。钟类以羊

角钮钟最具特色,因钟体上方有两只外撇的钟钮,形似羊角,故名。此类羊角钮钟是骆越特有的一种乐器。武器类的刀或剑,多斜挎于画面中心高大正身人物的腰间。画面上的图像看似凌乱无序,然细观之,其排列多有一定的规律与组合。其图像的典型排列组合,以一个形体高大、腰佩刀或剑、脚下有一犬或铜鼓的正身人物为中心,左右两侧或四周有序排列着若干形体相对矮小的正身或侧身人,形成众多形体矮小的人簇拥中心的高大人物的场景。画面上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乃至各种器物图像,都具有特定的寓意或功用。

那么,左江花山岩画是究竟是何时由哪个民族绘制?古人为何不畏艰险攀援至陡峭的悬崖上绘制规模如此之大、图像如此众多的岩画,且人物图像形态千篇雷同,画面上众多举手蹲足的正、侧身人物、画面中心高大人物脚下的铜鼓或犬类以及具有明显男女性别特征的图像有何寓意?岩画图像颜色为何经久不褪?关于这些疑问,因年代久远,又缺乏史料记载,故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使得神奇的花山岩画平添了一道神秘面纱。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文物部门组织开展左江花山岩画系列课题的研究,使学术界再次掀起左江花山岩画研究的热潮,区内外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积极申报并获准立项。学者们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现代科技手段,对左江花山岩画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族属、性质、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绘画方法、艺术特色、作画颜料、岩画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基本得到破译与揭示。学者们还通过对东兰、南丹、天峨等地壮族民间流行的蚂蛭节(又称蛙婆节)活动的祭祀仪式、拟蛙舞、敲击铜鼓、唱赞颂蛙神的山歌等场景,认证了壮族蚂蛭与花山岩画的历史渊源和传承关系,诠释了花山岩画的图像组合形式、文化内涵和举手蹲足图像是人们的蛙神(雨神或雷神)崇拜和跳拟蛙舞祈求风调雨顺、生

产丰收的深刻寓意。学者们根据岩画上的铜鼓、羊角钮钟等具有年代特征的图像和岩画上覆盖于岩画图像上、下的钟乳石、遗存的木桩等样品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的结果,认证了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绘制岩画的民族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骆越人,其岩画是当时骆越人为祈求风调雨顺、稻作丰收、人丁繁衍而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形象反映。画面上举手蹲足姿势的正身和侧身图像,是当时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时跳模拟青蛙跳跃舞娱神、祈求丰年的典型舞姿的定格造型,是骆越人崇拜青蛙、雷神或犬、鹭鸟的反映。被认定为画面中心的形体高大、身佩刀剑正身人像,应是有着崇高威望的骆越部族首领或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师,左右或四周身形矮小的是参加祭祀部族成员,众人在部族头领或祭师的率领下,踏着鼓乐的节奏,跳着拟蛙舞以娱神,祈求风调雨顺、生产丰收。画面上的铜鼓、羊角钮钟,是祭祀活动中用以节奏歌舞、营造热烈氛围的乐器。而画有勃起生殖器的男性、孕妇或男女交媾等图像,是骆越人的生殖崇拜,意在祈求人丁繁衍、部族兴旺。岩画颜色之所以历时二千多年的日晒雨淋而不褪,一是使用具有很强稳定性的赤铁矿粉为颜料,经研磨后加入含有草酸钙的植物汁液为黏合剂;二是石灰岩崖壁具有很强的吸附颜料的特性;三是当时骆越画师多选择沿江两畔略为向内倾斜的崖壁作画,可最大限度地避免阳光的暴晒和风雨的冲刷。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使岩画颜色经久而不褪。

另一方面,左江花山岩画的构图艺术形式也是独具匠心,并且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岩画以概括与夸张的手法,采用平面色块平涂、辅助少量线条的方法进行绘画,形成剪影式的艺术效果。左江花山岩画中人物、动物图像的构图,简约、概括、凝练而准确生动,又不乏夸张或抽象因素。诸如画面主体的人物形象,一般只表现出人的头部、身躯和四肢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的结构皆采用大色块平涂的圆形、长方形、正方形和三角形、腰鼓形等简略的几何形色块概括而成。人物形象既无面部五官,没有身体各细节结

构的表现,其外形完全是剪影形式的效果。犬及鸟类图像也是仅描绘其物象的外缘轮廓,使之呈侧身的剪影式。画面上的人物、动物及其它佩饰物、器物等图形,皆采用大色块作平面平涂,具有高度概括、笔法凝练、比例协调、形象鲜明、生动传神、布局合理、排列有序、主次分明的艺术效果。更令人赞叹的是,画师们在强烈的精神信仰的驱使下,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攀援到陡峭的悬崖上面壁作画,并且绘出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画像众多、形象生动、均衡对称、组合丰富、寓意深刻、千古不朽的画卷,充分体现了古骆越画师们娴熟、高超的绘画技巧和精湛的绘画技艺。

左江花山岩画运用绘画艺术形式,记录和再现了骆越部族的社会生活、稻作生产、精神信仰、文化风貌的生动场景,堪称一部印在岩石上的骆越史书,是骆越绘画艺术成就的绝笔,弥补了史料记载的缺遗,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因此,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0届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各国专家在审议中国提交的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文本或影像材料后,对“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给予高度评价,对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表示积极支持,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展示出独特的景观和岩石艺术,生动地表现出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后2世纪期间,当地古骆越人在左江沿岸一带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这是目前对该传统的唯一见证。左江花山岩画中的铜鼓及相关元素与当地铜鼓文化直接相关,见证了该区域广泛兴盛的文化特色”^[1]。此外,左江花山岩画中的铜鼓形象及其相关画面内容是对中国南方历史悠久、至今盛行不衰的铜鼓文化的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记录。铜鼓是流行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长达2000余年的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器物。铜鼓不是一般的乐器,带有厚重的神器礼器和权力重器的色彩。花山岩画中关于铜鼓的图像详细记载了当时骆越人使用铜鼓的场景,是研究铜鼓乃至我国南方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正如时任国家文物

局副局长刘曙光代表中国政府在发言中表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是中国第一处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为构建代表性、平衡性和可信性的《世界遗产名录》所作出的新的努力和贡献^①。

二、左江花山岩画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自古以来,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生活着诸多古老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奠定了中华源远流长、丰富灿烂文明的基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人口增长或国家开发战略需要等原因,不断出现民族迁徙与流动,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孤立存在,总是与相邻民族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接触、交往与交流。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文明类型。正是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差异,形成了民族文化类型的多样化和文化形态性的差异性。正是文化类型与形态的差异,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吸收,借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和互通有无,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交流的规律,通常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影响和引领。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是在这种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骆越人创造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的过程也是如此。

左江花山岩画铭刻着骆越稻作文明的印记,记录着骆越通过绘画艺术再现其丰富的生产、生活及祭祀活动的场景,承载着骆越独特文化和对土地、雨神(青蛙、雷神)的崇拜以及风调雨顺、生产丰收的祈求与愿望,诉说着骆越悠久历史、勇于开拓、不畏艰险谱写不朽岩画篇章以及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骆越稻作文化与中原汉族麦粟文化同属农耕文化类型,文化质态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原地区广袤无垠、江河横流、一马平川、土地肥沃、人杰地灵,富于开创精神,因而率先建立国家并进入文明时代,相继开创了闪耀着人类文明之光的青铜文化、古

文字(甲骨文)、铁器文化、牛耕和“四大发明”,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开创者和引领力量。而壮族先民瓯骆居住的广西地区,地处边塞,境内群山连绵、丘陵起伏、沟壑纵横、交通闭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且瘴气弥漫,生活环境艰苦,生产方式原始,社会发展缓慢。基于人类向往和追求文明进步的秉性,当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入广西后,便使得骆越人产生了新奇感和向往情结,加上中原文化与骆越文化同属农耕文化,使骆越人对传入的中原文化产生了亲近感和认同感,进而学习、借鉴和吸收中原文化,并将之融入本民族文化体系之中,助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骆越人在创作和绘制岩画过程中,吸收和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诸如岩画上出现的铜鼓、铜钟、佩持刀剑、舞蹈形式等图像,不仅丰富了花山岩画的文化内涵,而且为岩画增辉添彩,实现了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鉴与交融,折射出广西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图景。

(一)铜鼓图像寓含的中原文化元素

在左江花山岩画上,出现种类繁多的圆圈形、重圈形或内带芒星等图像,共376个。这些图像成组或单个处于人物图像组合上方或下方,数量仅次于人物图像。其图像形态有五型二十五式,即单环型(包括单纯环圈形、吊环形、撑环形、圈点形、芒星形、空心芒形、侧挂形、辐条形、吊耳形、内芒形、外芒形等)、双环型(包括重环形、内环带点形、内环连芒形、内环外芒形、环耳形、悬吊形、支撑形、内环点芒形及外环外芒形)、三环型(包括单纯三环形、外环外芒形)、实心型(包括圆饼形、芒线形及芒星形)、空心芒线型等,外无环圈,只有向四周放射的芒线,芒线的内端组成一个空白的圆形。

上述五种类型的圆形图像,由于图像简略抽象,多属写意性质,究竟属何物,有学者认为是铜鼓,也有认为是铜鼓、日、月、星辰,还有人认为是盾牌、铜锣或车轮等。若从图像的形态及其功用而言,那些重环形、三重环形、环形内带芒星纹或呈悬挂状的圆形图像,应是铜鼓图像的简化或象征,其数量居圆形类图像之首;还有一些实心圆或单环形图像,或属日月

星辰类,因为在骆越及其先民的自然崇拜体系中,曾流行对日月星辰的崇拜。之所以认定多数圆形图像属铜鼓,一是其图像与战国至秦汉时期骆越工匠铸造的铜鼓鼓面相似,不仅圆圈中心有芒星,而且还画有铜鼓的晕圈,有的圆圈边上还画有可供悬挂的半环耳,与实际出土的带耳铜鼓形态相同;二是这些带芒星或晕圈的铜鼓图形处于举手蹲足舞蹈人物队列之中或上方,应是在祭祀活动中敲击铜鼓以娱神或伴奏歌舞的反映。因此,岩画上内有芒星或晕圈、边缘画有环形耳的圆圈图形,应是骆越人铸造和使用的铜鼓图像。

反映先秦至秦汉时期生活在左江流域的壮族先民举行盛大祭祀活动场景的花山岩画上出现铜鼓图像,说明当时骆越人已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鼓。而铜鼓的铸造,与中原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传入广西密切相关。商代时,中原地区已开始铸造青铜器,出现了青铜文化,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周代时,青铜文化已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地处边疆的广西地区,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古国或方国时代,生产力尚较低下,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也较原始,尚未掌握青铜铸造技术。从文献史料记载可知,商周时期广西与中原地区已经有了交往交流交融。广西瓯骆人也向商周王朝贡献地方土特珍品,如《逸周书》卷七《王会解》载:“伊殷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又言:“禽人营,路人大竹,长沙鳖。其西鱼复鼓钟牛,蛮扬之翟,仓吾翡翠。”其中的“瓯”,即分布于今桂北地区的“西瓯”;“路”,即分布于今桂西南地区的骆越;“仓吾”,即分布于今桂东地区的古仓吾族。据考古发现,商代晚期中原地区铸造的青铜器已传入广西,在武鸣勉岭、兴安发现了商代晚期的提梁铜卣、铜戈,这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原青铜器。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传入广西的中原青铜器数量日益增多,而且种类丰富,在广西北部、中部以至西南部都有发现。青铜器主要由铜、锡合金铸成,具有质地坚韧、耐于蚀磨、经久耐用的特性;铸造的青铜兵器和生产工

具,锋利、坚韧而耐用。青铜器是人类发明的第一种金属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原青铜器及其铸造技术的传入,给广西骆越部族带来了中原文明的信息,特别是青铜器庄重的造型、优美的纹饰、坚韧的质地和优良的性能,引起了骆越人的关注与兴趣,给尚在使用原始石制或木制工具的骆越人以莫大的触动。向往和追求文明、进步和美好生活,是人类共有的秉性。关注、好奇和向往之心,往往成为创造发明的催化剂。正是骆越人在使用青铜器过程中产生的好奇、兴趣和欲望,激发了其铸造青铜器的热情。随着人们对青铜器性能认知的增加,到了春秋时期,骆越人终于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开始铸造青铜器。从目前广西武鸣区马头安等秧、元龙坡和恭城秧家村等地春秋时期墓葬里出土的可认定为骆越工匠铸造的青铜器及铸范可知,当时铸造的青铜器多是一些结构简单的小型实心体兵器和工具,如钺、矛、镞、斧、凿、铤、刮刀等,这是青铜铸造初期的特征。随着铸造经验的积累和铸造技术的提高,战国时期骆越工匠不仅继续铸造使用量和消耗量大的小型兵器和生产工具,而且可以铸造结构复杂的大型空腔类器物,铜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目前广西发现年代最早的铜鼓是田东县林逢镇和同村大坡岭战国墓发现的两面万家坝型铜鼓,该型铜鼓属铜鼓分类中的早期类型。秦汉时期,随着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移民迁居广西,带来了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青铜文化开始进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骆越工匠铸造的铜鼓不仅数量多,而且铸造技术精湛。铜鼓在骆越社会中,不仅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还被赋予通神的灵性,人们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都要敲击铜鼓。因此,在反映骆越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左江花山岩画上出现铜鼓图像,便在情理之中。正是中原青铜文化南传、骆越人对中原文化吸收,造就了骆越别具特色的铜鼓文化,既丰富了花山岩画的内涵,也为花山岩画增添了光彩。

(二)花山岩画舞蹈与鼓乐图像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左江花山岩画上,无论是正身还是侧身人物图

像,一律作曲肘举手半蹲姿势。画面上出现诸多铜鼓图像,包括在人物图像组合中,中心的高大正身人物下方,多出现一面硕大的铜鼓图像;更多的圆形铜鼓图像分处在人物队列上方,或10多个铜鼓图像平列一处;在宁明高山岩画上,还有4件羊角钮钟悬挂在一个呈“土”字形的支架上;另外宁明花山岩画上还有一件形似铜铃的图像。如前所述,花山岩画是骆越人举行盛大祭祀活动时,众人在其首领或祭师(司)的率领下集体跳拟蛙舞,舞姿和动作整齐划一。那么,众多舞者要做到动作整齐划一,必定需要统一节奏的方式。结合画面上出现铜鼓、钟、铃等乐器图像,应是在舞蹈过程中,通过有节拍地敲击钟鼓,以统一舞蹈节奏,达到舞律统一、整齐划一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祭祀活动中敲击铜鼓发出雄浑悦耳、撼人心扉的鼓声,可以营造神圣、热烈的气氛,提振众人的舞蹈激情,还企通过娱媚感动神灵。这种以钟鼓伴奏舞蹈或敲击钟鼓娱神之制,肇起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兴盛于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并且形成规制。商周以降,乐器的配置,以鼓、钟为主体,故有“钟鼓齐鸣”之说。因此,中原地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墓葬里,出土了大量铜钟或编钟^①,广西各地也发现许多从中原传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钟。关于中原地区的钟鼓配乐之制,西汉戴圣《礼记·乐记》有云:“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东汉郑玄释曰:“文谓鼓也,武谓金也。”金即指钟。西汉刘德《乐记·乐象篇》亦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随着秦汉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人南迁“与越杂处”,中原地区的铜钟(包括铜钲、铜搏)和礼乐文化也随之传入广西,对骆越音乐、舞蹈艺术产生深刻影响。骆越人学习和吸收中原汉族以钟鼓伴奏歌舞、节奏歌舞之制,在重大祭祀活动中敲击铜鼓、钟铃等乐器娱神、娱人和统一歌舞节奏。花山岩画上出现的集体舞蹈和铜鼓、铜钟等乐器,正是受中原汉族歌舞与鼓乐之制影响的结果,是

骆越对中原礼乐之制借鉴与吸收,丰富了花山岩画文化和骆越舞乐文化的内涵,提升了骆越舞乐文化的品位,反映了骆越舞乐文化与中原舞乐文化的交流与交融。

(三)花山岩画身佩刀剑人物图像中的中原文化元素

在左江各处岩画的人物组合中,许多处于中心位置的高大正身图像,腰间佩挂一柄长剑或环首刀,脚下方有铜鼓或犬类图像。此类身形高大、腰佩刀剑、装饰与众不同的人物图像,应该是骆越部族中德高望重的首领或祭师一类的人物。

剑是一种可随身佩带的近战抹杀或防身的短兵器,在商代时随着青铜铸造业的产生而产生。而佩剑之制,肇起于商周时期,兴盛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沿承之,成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身份、社会地位或显示男性勇武的象征。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佩剑有着严格的规制。据东汉许慎《说文》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战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晋书·舆服制》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所配之剑在长度和重量上,亦因佩带者的职位高低而有所不同。正如《考工记》所云:“身長五其茎长,重九铢,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茎长,重七铢,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茎长,重五铢,谓之下制,下士服之。”因此,佩剑成为达官贵人的一种时尚。先秦时期,骆越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古国或方国)过渡时期,既无剑,自然无佩剑之俗。秦汉王朝统一岭南后,随着大批中原移民迁居广西,中原地区铸造的青铜剑及佩剑之制随之亦传入广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统一岭南后,实行“以其故俗治”和任用当地民族酋首为官的羁縻政策,佩剑之制不仅在南居广西的郡县官吏和军队将领中流行,被汉王朝封授官职的骆越首领与中原汉籍官吏或将领一样,亦享有佩剑资格,

^①中原地区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墓葬里,还出土有许多铜钲、铜搏等敲击乐器,其用途及功能与铜钟相同。因鼓多为木皮复合制品,埋藏于地下的泥水里,极易腐烂,难以保存下来,故考古中极少发现。

并且开始佩剑于身,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身份与威严。大约到西汉末年至东汉,佩剑与佩刀并行,骆越首领身佩环首刀渐多,因而岩画上也出现了诸多身佩环首刀的图像。正因为如此,在反映骆越部族举行盛大祭祀活动的左江花山岩画上,位于图像组合中心的高大正身人物腰间,多出现身佩长剑或环首刀剑,明显是骆越首领在社会活动中受中原地区佩剑之制的影响在岩画上的反映,同时也见证了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以上所述,是左江花山岩画中所蕴含的中原文化元素之大端。由此证明,在秦汉王朝相继统一岭南、设置郡县、留军戍守、移民南居过程中,中原文化亦随之传入广西,对广西骆越文化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先秦时期广西骆越部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交往交流尚处在间接性或远程性的交流,那么,到了秦汉时期,随着岭南的统一和大批中原汉族的南迁“与越杂处”,则实现了中原汉族与广西骆越人的直接交往与交流。正是这种直接交往与交流,加快了彼此交往交流的广度和深度,提升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实效。另一方面,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规律,总是在民族迁徙、接触和交错而居过程中进行的。在交往交流过程中,通常是先进民族文化对落后民族的影响最多最深,这是由人类崇尚文明、仰慕先进、向往进步的秉性使然。先进民族文化之所以先进,就是以开放、包容的品格,善于吸收、兼容其他民族文化,用以充实、丰富本民族文化,进而引领其他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结果。广西各民族及其文化与中原民族及其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规律也是如此。左江花山岩画文化之所以享誉世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一方面是其历史的久远、宏大的规模、独特的风格、丰富的内涵、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重要的多重价值,并且生动地描绘了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约700年间聚居于左江沿岸的骆越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发展面貌,因而得到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另一方面,骆越画师在绘制岩画过程中,借鉴、吸收和融入了中原文化元素,丰富了岩画内涵,提升了岩画品质,使之更加璀

璨夺目。可以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是骆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证实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理论。

[参考文献]

- [1]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EB/OL].(2016-07-15)[2023-06-09].<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6/0715/c87423-28558353.html>.

责任编辑:潘宏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

阳菲菲

(娄底市社会主义学院,湖南娄底 417000)

摘要: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创党的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夯实思想政治基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立足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发挥制度优势,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意义;实践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11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78-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基本任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重要性,形成了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是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经验深刻总结,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形成了统一、团结、稳定的良好局面,为维护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通过所谓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在特定区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对我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了重大挑战。同时,少部分群众仍存在一些思想认识误区和错误观点,比如片面看待民族身份、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理解有偏差等,这容易误导各族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不利于民族团结。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收稿日期:2023-08-15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课题(XTKT202311)。

作者简介:阳菲菲,女,娄底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将全体中华儿女紧紧团结在一起,拥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稳定,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效抵御西方各种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颠覆,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是拥有辉煌历史的民族。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奋斗,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民族工作呈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需要高度关注。从外部看,一些国家频频制造民族话题攻击、抹黑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践踏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企图使民族问题成为让中国社会冲突动荡的祸根;从内部看,经济社会发展并不自然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思想工作,反而可能出现生活环境越是变好,越是跟中华民族共同体疏远的消极心理,弱化共同性,强化差异性,滋长狭隘的民族意识。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夯实中华民族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有效防范思想意识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有效应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活动,从根脉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思想保证。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联系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民族团结的基础深厚牢固。与此同时,存在着影响民族关系的新情况。一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新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仍比较突出,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任务艰巨,与各族人民的期待值存在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心理落差。二是一些地区仍存在影响民族和谐的现象。如个别地方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偏低,影响多民族之间的情感亲近和心灵相通;一些地方不同民族群众因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对民族风俗习俗的不理解等,还存在伤害民族感情的现象;一些地方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名义,仍然保持着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并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象征;等等。只有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使中华民族成为凝聚力更加牢固、向心力更加强大的命运共同体。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根据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中心任务调整民族工作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原创性论断,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要求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目标由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拓展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民族工作对象由重点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扩大为全体中国人民,覆盖全国各地;由主要考虑差异性转向不断增进共同性;由主要考虑经济发展,转向既“管肚子,也管脑子”;强调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民族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做民族工作的新格局,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我们要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个与共”,正确处理民族工作中的四个重大关系,贯彻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环节^①,着力增强“五个认同”,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

穿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2]。

(一)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夯实思想政治基础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脉,国家统一的发展方向始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共同培育了革故鼎新、勇于发明的伟大创造精神,勤劳坚韧、自强不息的伟大奋斗精神,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伟大团结精神,向往美好、不懈追求的伟大梦想精神,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涵。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要弘扬伟大中华民族精神,并使之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赓续精神血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加强“五史”教育。大力加强党史教育,宣传民族团结精神,如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族群众建立了鱼水之情;抗日战争时期,各族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时期,各族人民共同推动民主爱国运动等。大力加强新中国史教育,宣传弘扬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共同奋斗,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高潮,昂首阔步走向现代化。大力加强改革开放史教育,推崇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实现富起来的战略目标的伟大壮举。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宣传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程和成就。大力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教育,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用共同理想信念凝心铸魂。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引导各族群众立足中华多元一体格局,增进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联合,强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弘扬

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各民族文化创新^[4],使各民族文化与时俱进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5]。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没有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缺失了物质保障,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认同感、获得感和归属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既是党对各族人民的郑重承诺,也表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一要不断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不断深化民族地区改革,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二要推动民族地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准确定位自身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积极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以促进各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为切入点和发力点,着力夯实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调整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路子,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三要强化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果,并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相关部署有效衔接,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政策,深入开展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大力发展边境经济、推进边民团结幸福、巩固边防安全稳定^[6]。

(三)立足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一要有序推动各族群众跨区域流动,特别要加强西部民族地区和东中部地区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顺应并促进各民族大流动大融居的发展趋势,推动多民族形成互嵌式社会结构。二要根据民族习俗、民族居住地形的具体情况,合理统筹规划民族地

区的城乡建设布局,配置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服务资源,积极创造建设各族人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7],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促进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和文化上的团结统一^[8]。三要深入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活动,着力深化民族团结活动的文化内涵,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穿于民族团结活动的始终,丰富发展民族团结活动的形式,把爱我中华的种子深埋在各族群众的心灵深处。

(四)发挥制度优势,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要始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好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其次,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依据国情作出的正确抉择,是党的民族理论的升华,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创举。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各民族民生状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还能确保党和国家的基本法律政策的顺利实施,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10]。

民族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制度安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一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民族工作部门要做到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处理民族事务。二要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在突出区域化和精准化的同时,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事件,依法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11]。三要在遵守宪法、法律的前提下,尊重和保护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用法律法规支撑特定地区、特殊问题、特殊事项的处理政策。四要增强民族工作干部和群众的法治意识,培养法治精神,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

(五)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重大风险隐患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2]国家长期稳定、各民族紧密团结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补齐社会治理短板能够有效保证社会长期稳定、维护各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补齐社会治理短板,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3]。一方面,要着力搭建各族人民共居、共事、共生的社会活动条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绘就同心圆,共筑中国梦^[9]。另一方面,广泛吸收社会力量,特别是把各族人民的知识、智慧、技术等资源应用到民族事务治理中,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一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地,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3]。二要特别防范和有效应对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宗教极端活动。要强化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居安思危,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作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工作来抓,深谋远虑、深思熟虑,打有准备之仗。要加强风险隐患的全面摸排排查、科学监测预警、细致分析研判,对存量风险扭住不放、跟踪到底,对潜在风险开展拉网式调查摸排,确保无盲区、全覆盖,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要建全民族

领域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体制机制,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①。要加强协调处置民族领域风险隐患体制机制建设,构建由统战部门牵头,公安、网信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监测预警、风险研判、风险评估、防突处置与协调机制,细化实化工作预案,分类制定工作预案,把功夫做在前头、做在平时,牢牢把握处置突发状况的工作主动权。五要加强国际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海外华侨华人等方面的工作,不断壮大友我力量^②。要着重宣传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求大同的精神特质,讲清楚中国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讲清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方案,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读懂中华文明。

[参考文献]

- [1] 尤权.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中国西藏,2021(6).
- [2] 李志伟.奏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N].中国民族报,2021-09-25(1).
- [3] 杨正权.高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旗帜[J].社会主义论坛,2021(10).
- [4] 张锦花.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西藏大学,2021.
- [5] 陶斯文.百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自觉发展[J].民族学刊,2021(9).
- [6] 许立坤.十八大以来党对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5).
- [7]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中国民族,2021(11).
- [8] 罗惠翻.国家凝聚力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4).
- [9] 吕朝辉.同频共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构理路[J].湖南社会科学,2021(5).

- [10] 刘宝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3).
- [11] 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N].山西日报,2021-09-02(1).
- [12] 何庆良.凝聚力量 接续奋斗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J].民族大家庭,2020(6).
- [13] 苟鹏.基层社会治理要做到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N].重庆日报,2020-10-05(4).

责任编辑:杨绪强

高校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价值探析

林怀艺

(华侨大学,福建泉州 362021)

摘要:高校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价值体现在:以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教育,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向青年学生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坚定“四个自信”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以敢于斗争的理论勇气,引导青年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提升斗争精神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厚植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强化自觉性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应当准确把握高校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价值,包括不能将这种价值提到不适当的位置、增进思政课与各类课程的协同发力、善用“大思政课”来提升说服力等。

关键词:高校思政课;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价值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12

[中图分类号]G641;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83-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事关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要“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1]。在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文化渗透中,宗教一直是被利用的一个重要手段,其目的就是利用政治化的宗教组织和宗教意识形态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与我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关系到我国各宗教的健康发展”^[2]。为此,必须形成抵御渗透的强大合力。教育是境外抵御宗教渗透不可或缺的手段。作为哲学范畴,

价值揭示的是主客体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关系,即客体对人、事物、活动等所具有的积极意义。高校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具有重要价值,表明这类课程通过课堂教学等途径,能够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发挥独特作用。

一、高校思政课以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政党,历来强调学校教育应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求“培养德智体

收稿日期:2023-08-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KS116)。

作者简介:林怀艺,男,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59]。为此,我国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思政课。习近平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作用不可替代”^[4329]。办好思政课,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基本职责和思政课教师的首要岗位职责。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思政课作用于青年学生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进教材(课程群建设)、进课堂(思想观点供给)、进学生头脑(理论教育、精神武装、“三观”塑造)来实现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6]“三进”的核心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灌输给青年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宗教观,坚定“四个自信”。

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方法,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唯心主义宗教观鼓吹的“神创论”“灵异论”“泛爱论”不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依据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宗教形态的演变、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宗教作用的双重性、宗教消亡的条件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强调,宗教问题具有特殊复杂性。当今世界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一些西方国家打着宗教人权旗号攻击我国的宗教政策,插手我国的宗教事务,煽动民族分裂,进行非法传教,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实质上是政治问题^[6]。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我国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直面国际形势给我国宗教和宗教工作带来的挑战、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7],没有给任何形式的有神论留下后路。宗教教义的哲学核心是神灵观念,马克思则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这样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无神论之间,就不存在“骑墙

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志解放全人类,在政治行动上可以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9],并决心“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10],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1172]。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但青年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党员、团员)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才能真正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挫败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的企图。

俄国无产阶级建党之初,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是不能自发产生出来的,而只能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12328],“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12327]。同理,在境外敌对势力以宗教交往、慈善救济、文化交流、学术合作等为幌子,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大肆进行宗教渗透的情况下,离开了外部灌输,以为青年学生能够自发形成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意识,是几乎不可能的。思政课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是果断“出场”、及时介入,引导青年学生完整地、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把握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本质区别,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形成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

二、高校思政课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向青年学生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坚定“四个自信”,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399]。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政课的开设,是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形象地讲,

就是“毛”与“皮”之间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左传·僖公十四年》）。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始终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文明史、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近两百年中国近现代斗争史、百余年党的奋斗史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历史、理论及实践，反映了党坚持中国的宗教事务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的坚定意志，以这样的大历史观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思政课姓“马”姓“共”的必然选择，也是思政课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必然选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反对列强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文化渗透和思想侵略活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为美帝国主义侵华寻找根据时颠倒是非，提出“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对此，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揭露了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的把戏^[1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天主教和基督教开展自治、自养、自传运动。周恩来指出，这“三自”是能够实现的，“凡依靠人家而不自力更生的决不能自强，凡自主者才有前途”^[14]。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和天主教清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并摆脱了外部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15]，从而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创造了重要的社会生态环境。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宗教反动势力“重返中国大陆”的企图。1982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就明确提出“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的要求^[16]，陈云强调要高度重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17]。此后，江泽民、胡锦涛反复提醒全党，对于敌对势力在我境内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干涉和分裂活动保持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习近平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高度，多次强调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11][17]}。

在理论建设和创新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中国，通过不懈探索，形成了以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为基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习近平在回答新时代怎样认识宗教、怎样处理宗教问题、怎样做好党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时，提出了以“九个必须”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18]，揭示了我国宗教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党的宗教工作的着力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不是让信教群众放弃或者改变自己的信仰，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使我国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特别是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从而增进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将信教群众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1][18]}这是对党的宗教工作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凝练和总结，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提供了根本遵循。

纵观人类历史，宗教问题历来是影响、干扰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局稳定、族群团结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与时俱进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既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交流，又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中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思政课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润物细无声地传授给青年学生，启发青年学

生从中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道理,从而坚定青年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而有了这种清醒和自信,也就有了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志气、骨气、底气。

三、高校思政课以敢于斗争的理论勇气,引导青年学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提升斗争精神,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必然性。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该学说同错误观点和思潮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由此也决定了思政课在面对意识形态“虚无”“中立”“终结”等骗局时必须敢于发声、敢于亮剑,而绝不能“失语”“失踪”“失声”。习近平在剖析苏共垮台时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19],苏共在这个斗争中改旗易帜,思想搞乱了,最后只能作鸟兽散。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通过思政课在维护国家主权、应对重大事件等大是大非面前开展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斗争,是使命所在和职责所在。

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斗争中,较典型的是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借助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分裂活动、借助境外一些基督宗教团体对我国推行“福音化”。西藏、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藏独”“疆独”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新疆在党的领导下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保护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唱支山歌给党听》《党的光辉亚克西》等经典红歌表达着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西藏、新疆各族群众同全国一道,对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以宗教为幌子、“认贼作父”的言行极端愤慨,坚决支持党和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境外一些基督宗教团体对我国推行“福音化”,表面是鼓噪“神爱世人”,实质上却是推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达到

“基督羔羊”战胜“中国龙”的目的。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对此,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在应对重大事件上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斗争,典型的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利用自然灾害、贫困愚昧、疾病疫情、突发事件等进行发难。面对这些疾苦,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反动的地方,就在于它撕下了扶助危困、拯救生命、安抚情绪、慰藉心理、重建家园等温情面纱,趁机扰乱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秩序,希冀乱中渔利、不战而胜。凉山彝族自治州曾经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在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指引下,凉山彝族自治州7个国家级贫困县摘帽脱贫。习近平在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时,一位彝族村民告诉他,以前生病总以为是有鬼附身,后来就是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减少生病的。听了讲述,习近平说:“过去的确是有‘鬼’的,愚昧、落后、贫穷就是‘鬼’。这些问题解决了,有文化、讲卫生,过上好日子,‘鬼’就自然被驱走了。”^[20]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崇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以活生生的事实教育群众什么是真正的“鬼”、如何驱“鬼”。再如,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但《圣经》在美国的销售量却显著增长,“祷告”成为网络搜索高频词,不少宗教团体、教堂拒绝执行防疫禁令,有的自行恢复宗教活动或举办群众集会,有的甚至将要求民众“待在家中”的政府告到法院并最终胜诉,等等^[21]。与此相反,习近平强调新冠防控工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22]。中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按照“走小步不停步”的要求不断优化调整防控策略,向世界贡献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没有到宗教迷雾中去寻求抗疫途径,而是依靠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有效的科学防控,以活生

生的事实教育群众怎样才能消灭“瘟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境外敌对势力曾打算利用宗教渗透收割中国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成果,并且采取了种种见不得人的伎俩,但这在觉悟了的中国人民这道铜墙铁壁面前却难成气候。

思政课改革创新需要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4]331}。这样的统一体现了思政课不仅是“破坏旧世界”的批判武器也是“建设新世界”的创造武器,具有为真理、为人民利益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鲜明品格。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在新征程上全党“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2}、“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1]23}。思政课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以“不怕鬼”的唯物主义战斗勇气,彰显共产党人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力量,以此激励青年学生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成为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鲜活力量。

四、高校思政课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厚植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强化自觉性,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梁启超于20世纪初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后,如何在内忧外患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直是萦绕在先进中国人头脑中的梦想。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没能实现夙愿。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且“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3}。思政课教学历来强调情理交融,这个“情”最重要的就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感召,增进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坚决向境外宗教渗透说“不”。

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T.亚当斯首次提出“美国梦”。从源头来讲,宗教对追逐美国梦的美国的个人生活、人生价值、社会秩序等发挥着重要的影

响。17世纪初,正是一群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船踏上北美大陆。这些移民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生存意义,就是要“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24],美国梦表达的就是他们通过建立一座“山巅之城”来履行上帝使命的意愿。所以,美国牧师皮特·马歇尔指出,信仰上帝的宗教自由和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是美国梦的两个重要支撑^[25]。当美国学者亨廷顿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的双重身份来写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所面临的挑战》等著作时,他特别看重宗教因素。在他的“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中,他深忧“伊斯兰好斗分子”这一“现实的敌人”和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对美国的消蚀,因而一再强调“恪守盎格鲁——新教价值观”对于维系美国人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的重要性,以及宗教与爱国精神的相互交织、支持和印证,因为“绝大部分美国人既信教又爱国,这二者不可分割”^[26]。尽管受世俗化、功利性的冲击,美国梦的宗教色彩有所淡化,但回归宗教“根茎”的初衷却始终或显或隐存在。美国国歌、钞票、政要就职演说中无处不在的“上帝”要素表明,宗教深嵌于美国社会结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政府疫情防控不力的情况下,美国信教人数、虔诚度都不降反升,对“上帝”、对“原罪”的“认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逻辑。

与此相反,支撑中国梦的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没有给神灵留下任何位置。历史上,中国的宗教信仰多元兼容,世俗政权支配教权,宗教战争缺乏社会土壤,因而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何况不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只要希冀在中国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逐步适应中国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通过“中国化”扎下根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中国宗教包含的今生与来世、此岸与彼岸、众生与神灵、世俗与神圣等之间的相亲、相通、相融思想,使得中国宗教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功能。或者毋宁说,它们已经成

为包容性极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体现在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国家、民族与个人的梦想贯通起来。在它那里,爱国主义“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27],爱国不借助宗教元素,宗教必须强化爱国。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一民族精神之魂,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这一历史结论。宗教对外交往讲求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我国宗教同外国宗教不存在隶属关系,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因而对试图改变中国道路、使中国重新沦为西方附庸的境外宗教渗透,又怎能任其为非作歹呢?

习近平指出:“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28]五四运动之后,在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最终确立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的。思政课在这方面的价值,就是把中国梦同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厚植青年学生的家国情怀,使他们懂得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从而不仅向青年学生指明他们成长成才的康庄大道,也使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成为他们的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觉。

结语

习近平强调:“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29]思政课通过讲道理,引导青年学生明确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问题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不至于成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的俘虏。对于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的价值,有必要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一是不能将这种价值提到不适当的位置。首先,经典作家反对将宗教问题单独提出来加以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同宗教作斗争、坚持无神论原则,都包含在这个理论大厦的底层。对宗教的批判和克服宗教异化都要从其“在人间”的根源出发,从“改变世界”的指向解决问题。为此,马克思甚至建议“最好少炫耀‘无神论’招牌”^[30]。列宁强调对待宗教在策略上必须“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周密考虑”,反对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和对无神论的结论进行过度发挥的愚蠢举动,认为“这样做会使无产阶级政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31]。其次,如前所述,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宗教问题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将宗教问题纳入统一战线范畴,强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11]⁶⁸,而绝不是制造信仰上的对立。对宗教问题的这种定位,决定了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要正确把握自身价值,在合理的“度”的范围内组织教学,阐释好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简明而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青年学生关注的问题。否则,用力不当,就会背离教学的初衷。

二是增进与各类课程的协同发力。思政课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中具有积极意义,但思政课并非高校开展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的唯一课程。高校的课程体系尽管比较复杂,但思政课之外的各课程,不仅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课程,也包括自然科学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8]²⁷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过对社会、自然及其规律的研究,都能够得出“人类获得自由绝不是建立在对鬼神的畏惧、谄媚、购买和奉献财务的基础上”的结论^[32]。只有充分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发力,才能构建起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特别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宗

教学学科建设,为思政课教学中的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提供深刻的学理基础。最后,大中小学思政课应“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进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从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的教材看,大学本科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材、《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材均涉及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完善),但研究生教材、中小学教材基本没有涉及,形成很大的短板。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中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对处于“拔节孕穗”阶段的青少年意义重大,因而增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的系统性,是贯彻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107]的题中之义。

三是善用“大思政课”来提升说服力。习近平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13]。抵御境外宗教渗透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来讲”,就应当将其融入、嵌入、渗入人文关怀、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警示教育、惩戒等日常工作,让青年学生自觉做到不听、不信、不传、不卷入,并且积极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工作。此外,宗教界人士的言行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例如,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指出,在宗教工作中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意义重大,其中之一,就是“对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攻击我国的无耻澜言是个有力回击”^[134]。中国基督教“两会”原领导人丁光训在回答中国基督教如何对付海外渗透势力的问题时说:“努力把我们的教会办好,使信徒喜欢。多做信徒喜欢我们做的事,不做信徒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就能把信徒团结好,海外渗透势力就难以插入了。”^[135]在抵御境外宗教渗透问题上,宗教界人士的思考对于党和政府更好完善政策、法规,更精准开展工作,不无裨益。在“大思政课”

中恰当运用这些素材,可以充实思政课教学内容,从而达到用事实和真相说服青年学生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中心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70.
- [3]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5]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9.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76.
- [7]列宁.列宁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88.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8.
-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2]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05.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19.
- [15]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4.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

- 务局政策法规司.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70.
- [17]陈云.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 [1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66.
- [19]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5.
- [20]杜尚泽,霍小光.“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记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并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8-02-15(3).
- [21]丁柏予.新冠肺炎疫情下各国宗教乱象及其对我国宗教治理的启示——以韩国、美国、意大利为例[J].科学与无神论,2021(4).
-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91.
- [2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0.
- [2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78.
- [25]Peter Marshall. The Prayer of Peter Marshall[M]. New York:McGraw-Hill,1954:2.
- [26][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所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305.
-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 [2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9]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04-26(1).
- [3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 [31]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7.
- [32]任继愈.任继愈文集:第1卷[M].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4:372.
- [33]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N].人民日报,2021-03-07(1).
- [34]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下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1441.
- [35]丁光训.丁光训文集[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8:375.

责任编辑:潘宏纹

试论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发展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以思恩府为例

赵乃蓉

(南宁孔庙博物馆,广西南宁 530000)

摘要: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广西采取了以兴文教、修书院、“存土设流”等措施,强化和巩固了流官的基层治理权威。书院的繁荣发展不仅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还承担了为中央王朝拣选基层管理人才的责任,成为中央王朝在广西推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的并行之法。明代思恩府开广西土府儒学之先河,并带动土司辖区兴建书院,传承和践行“大一统”思想,在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明清时期;广西书院;基层治理;“大一统”思想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13

[中图分类号]G127;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91-08

一、问题的提出

广西书院的发展有据可循始自唐代。邓敏杰、邓滔编著的《广西书院研究》详细介绍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书院情况,并对书院建设乱象进行了批判^[1]。对广西书院发展史进行系统梳理的还有李彦福、雷剑所著《试论宋元明清时期广西书院》^[2],季啸风等著《中国书院辞典》^[3],高敏贵著《广西的书院》^[4],陈业强著《广西书院研究》^[5],蓝武和黄东成著《明代广西书院发展的历史分期、时代特征及其多维成因》^[6]等,学者们对书院基础数据的搜集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关于广西书院对地方文化发展影响方面的研究有《清代桂林书院与地方文化研究》^[7]《“岭西五大家”与书院》^[8]等,研究范围以桂东、桂北地区为主。广西书院的发展以王阳明创建南宁敷文

书院为转折点,至清朝发展至鼎盛。王阳明任两广总督期间对思恩、田州所行招抚之策,不费一兵一卒平定叛乱,是为“以文止武”的成功实践。根据史料记载,思恩、田州曾发生过三次土官叛乱。王阳明认为:“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既设流官,我反岁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且田州邻交趾,深山绝谷,悉瑶、壮盘据,必仍设土官,斯可藉其兵力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后必有悔。”(《明史·王守仁传》)孙先英、覃明在《敷文书院与王守仁的书院教育思想在广西的传播及影响》指出,广西地处边地,民族杂居,民风“尤称强悍”。叛乱之起“由学不明,人失其心”,在加强军事戍边的同时急需兴办书院,以仁德来感化百姓^[9]。书院的繁荣发展增强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聚合

收稿日期:2023-09-19

项目基金: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1BKG001)。

作者简介:赵乃蓉,女,南宁孔庙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遗产保护。

力,显示出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之策逐渐转向以文治为主导的多元共治模式。陈晨通过台湾、贵州、新疆、盛京等地的书院盛衰检视中央政府的治边思路^[10]。高福顺^[11]和蒋金玲^[12]论述了历代王朝在边疆地区推行的文教政策皆以维护边疆稳定为依归。可见,书院的中兴不仅与朝廷对书院的态度有关,在边疆治理政策推行和实施过程中更承担了不容忽视的责任,推进了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大一统”思想的认同。

本文以思恩府书院为切入点,对明清时期广西书院繁荣发展的历史动因、发展过程、运行方式等方面进行剖析与探讨,将明清土司辖区书院教育的发展历程与地方官员的选拔与任用机制相联系,从基层社会治理秩序恢复与重建的角度探究广西少数民族在参与建构、践行“大一统”思想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二、思恩府及其书院发展概况

(一)思恩府历史沿革

唐代设置思恩羁縻州,奉行“土人治土”原则,治所位于平果县旧城寨成山。旧城残垣依稀可见,岑氏墓园至今尚存。土官岑瑛曾下令勒石“悦服”“兴宁”四字于八峰山崖壁之上。明初隶属田州府,正统年间知土州岑瑛有功晋升为思恩土府。1442年改思恩军民府,增设流官,岑瑛随即将府治迁至今马山县乔利街西侧拉旧屯,并修建石城,将宜山县八仙诸峒划归思恩府管辖,成为广西历史上唯一的军民府。岑瑛官至正二品的都指挥使,被称为“土臣之英杰者”。弘治三年(1490年)岑瑛之孙岑浚因叛乱被平,遂改为流府,取消岑氏世袭制。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任两广总督,平定思恩、田州土官叛乱,主张将府治迁至荒田驿。万历七年(1579年),思恩府正式迁府治于今武缘县府城镇(荒田驿),将武缘县(今南宁武鸣区)割隶思恩府。初时,思恩府辖今马山、平果直至与云南省交界。清朝思恩府辖一州、三县、九土司、一土州、一土县,即宾州,武缘、上林、迁江县,白山、古零、定罗、兴隆、那马、下旺、旧城、都阳、安定土司,田州土州,上林土县。清光绪末年,广西布政使司整合划分为十一府二州二厅,其中,思恩府领宾州、那

马厅、武缘县、迁江县、上林县及白山、兴隆、定罗、旧城、都阳、古零、安定七土司,大致分布于今广西武鸣、宾阳、上林、马山、田东、平果、都安等县(市)。1913年,实施“废府置县”,撤销思恩府。陆荣廷任广西都督后,取“以武鸣天下”之意,改武缘县为武鸣县,随后升格为府。2015年设南宁市武鸣区。

(二)明清时期思恩府书院概况

由于史料记载较少,思恩府所辖范围于明清时期变化较大,笔者大致将明清时期思恩府修建书院情况整理统计如下(见表1、表2)。

表1 明朝思恩府书院概况

地区	书院	时间	创办者	文献来源
武缘县 (今南宁武鸣区)	修文书院	明嘉靖四十年	刘浩	《南宁府志》嘉靖四十三年
	阳明书院	明万历初年	侯国治	《武鸣县志》,1998年
隆安县	阳明书院	明嘉靖十六年	不详	《隆安县志》,1993年
宾州(今南宁市宾阳县)	敷文书院	明嘉靖七年	王阳明	《宾州志》,万历十五年

表2 清朝思恩府书院概况

地区	书院	时间	创办者	文献来源
武缘县 (今南宁武鸣区)	岭山书院	道光元年	张显相	《武缘县志》,道光二十四年
	西邕书院	嘉庆年间	李彦章	《武鸣县志》,1998年
	葛阳书院	道光十四年	不详	
	阳明书院	道光八年	李彦章及各地土司	
隆安县	榜山书院	乾隆五十七年	张树绩	《隆安县志》,1934年
宾州(今南宁市宾阳县)	宾阳书院	乾隆三十六年	陈之鹄	《宾州志》,光绪十二年
上林县	澄江书院	嘉庆九年	杨学昭	《上林县志》,光绪二年
	汇溪书院	道光五年	陈词	
迁江县 (今来宾市)	印山书院	乾隆四十八年	不详	《迁江县志》,1935年
百色直隶厅(今百色市)	鹅城书院	光绪七年	陈如金	《百色厅治》,光绪

地区	书院	时间	创办者	文献来源
田阳县	化成书院	乾隆二十年	岑宜栋	《中国书院辞典》,2019年
	崇正书院	光绪十四年	李霭春	《镇安府志》,乾隆二十一年
	日新书院	不详	不详	
	正经书院	光绪年间	不详	《中国书院辞典》,2019年
田东县	经正书院	光绪三年	陈如金	《百色厅志》,光绪十七年
安隆司长官司(今隆林各族自治县)	安隆书院	清康熙年间	不详	《隆林各族自治县志》,2002年

三、思恩府书院发展的历史动因及对“大一统”思想的践行

(一)以土司为主的官学教育

明太祖朱元璋大兴科举,坚持科举取士,明确非官学者不得参与科举,推动了全国各地兴办官学。当时广西各酋长以征战为务,不知尚学,唯岑瑛打破惯例,奏请在思恩军民府设立儒学,传授汉语儒学,办学80余载,是为广西土官办学之始。随着官阶不断提升,岑瑛也成为桂西土司领袖,其管辖地区治理有序,人才辈出,成为广西最具影响力和管辖范围最广的土府,逐渐强化了思恩府在各土府中的“正统性”地位。同时,这位“文武双具”的土官还创建了思恩八景(旧州八景),即“寒潭却暑、云深古洞、独秀荷芬、讲坛面壁、鸟道周行、松林夜月、丹荔蒸霞、岑后乔木”^[13],可见其儒学造诣之深厚。岑瑛在任期间,兴建学堂,鼓励少数民族文人积极入仕,开创广西土司辖区儒学教育之首。“又建社稷山川、郡厉二坛,开在城、古陵(零)、苏韦、慕化四驿为藩臬,暨诸庙宇”^[14],对推动思恩府及整个桂西土司辖区崇儒重道之风贡献颇大,右江各地都建有岑公祠以纪念他的功绩。1459年岑瑛被朝廷升为“都指挥同知”,为从三品官,流官职位,其“在任筑城池,创廨宇,立学校,建祠庙,政绩大著,传子燧”^[15]。明朝十分重视对土司继承人的教育,这不仅是对正统地位的承袭,更是在民族地区建构并延续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和民族观的需要。弘治十六年(1503年)六月,明王朝下诏:“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

入学者,不准承袭。”^[16]其后宣慰、安抚等土官皆创建儒学。弘治年间(1488—1505年),陈璘任思明土府流官同知时,“择子弟之俊秀者,聚而教之社学”^[17]。在地方官员的努力下,嘉靖、万历年间广西共建社学200多所,其中桂西地区新创办的官学近20所^[18]。此时官学招收的对象主要是土司家族成员。

由于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地方势力的利益冲突,思恩府官学逐渐衰微。《明宣宗实录》卷二十一有载,宣德元年(1426年)九月,“罢广西思恩忻城二县儒学时,巡按广西监察御史申春言,思恩忻城累因蛮寇攻劫杀虏,人民生员亦被拘略,今忻城全无一人,思恩止有四人。县民稀少,多是瑶壮。非但言语不通,不堪训海抑,且不愿入学,徒存学官无所施教”^[19]。当时的中央王朝已意识到仅仅对土司家族及其后裔等进行儒学教育,远远不能满足中央王朝对土司辖区实施管理的人才需求。

(二)书院的创办为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重建奠定基础

《大明一统志》载:“南宁府形胜:内制广源,外控交趾。金城之固,铜柱之封。九洞襟带,列城唇齿。南濒海微,西接溪洞。为邕钦廉三郡咽喉,地势险阻。横距邕为邻境,实犬牙相制之地。”^[20]与南宁府相近的太平府“故无附县……则太平孤立,土酋中大惧,不能自存”^[21],所辖百姓长期备受威胁,苦不堪言。上思州、龙州土司的内部争斗愈演愈烈,加上思恩、田州土官叛乱,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隐忧。因此,南宁府作为流府的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任两广总督期间,于南宁创办敷文书院,招抚并教化思恩、田州土官。嘉靖七年(1528年)发布《经理书院事宜》,要求对书院“法立事行”,正式开启了书院的制度化建设^[22]。其后,南宁府所辖各地风从效仿,仅嘉靖年间创建书院数量就达10所之多。在思恩府,创办有修文书院、阳明书院2所。太平书院有二,一曰肇化书院,内祀前恭政兵部尚书翁万达;一曰静庵,内祀前太平知府胡世宁^[23]^[40]。书院的大量涌现,一方面是受到阳明心学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是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实施文教导化的需求。

明朝时期,随着全国文化教化程度逐渐提高,不

同的文化有了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讲学、讲会、书院这类社会行为,不需要依靠科举和权力系统等行政力量的推动便可自力更生、发展壮大,大大拓宽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流途径,阳明心学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据1980年11月南宁北宁街广西储备局院内(敷文书院旧址)出土的一方“左江道修复王文成公敷文书院”碑文(以下简称“碑文”)记载:“余复奚庸于缀言,独以公平田州之功,经略兹土者,乃其精神学脉之所存……方卢苏、王受之挟邦相反也谓曰:是尝擒宁藩,剿闽寇,累累扬平大乱略者。归眷伏,股栗夺气矣。及公至,则愈韬晦。”可见,“以文止武”的成功实践始自王阳明平思、田之乱,即有“及公至,一切不论兵,而论学”,乃是敷文书院所承载之边疆经略思想核心。《明世宗实录》卷七四,嘉靖六年三月乙未条记载:“猛党卢苏、王受等诈言猛不死,借交趾兵二十万且至,夷民信之。”^[24]岑氏土司家族把持地方统治权数百年,与其他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王阳明认为:“据理审时……不宜偏执;应土应流,与土流兼设,尤在得人。”^[25]宜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增设流官以制约土官,具体措施包括:于思恩、田州设流官,移南丹卫于八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凤化县治于三里,增设隆安县治,添设流官县于思龙,于田州设十九巡检司等^{[26]315-324}。在广西平乱期间,王阳明举乡约、重礼教、兴学校,亲自参与创建南宁敷文书院,以挽救日益陷溺之人心士风,并对改流的善后措施进行了完善。“碑文”记:“公但密遣人约苏、受,曰尔罪在不实……公数其罪而薄遣之,悉放还农……四省将士得以解甲休养,亟蒙福祉,公之赐也。”其原因有三。其一,在思、田之乱以前已有流官在当地任职,但收效甚微。流官虽在任上,却势单力薄,形同虚设,以致上无将可用,下无兵可募,无法对土官进行有效约束。其二,改流后的地方社会状况十分复杂。地方官员若不采取有效的善后措施以平衡地方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则会导致地方社会乱象丛生。其三,改流后的土司家族仍掌握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地方权力,土司长期管辖之下的百姓缺乏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导致国家权威无法渗入。因此,欲定边安疆,“休养疮痍之民,绝覬觐之奸”^{[26]262},重要的是对当地百姓广施教化以重建基层社会之精神秩序。

王阳明创建敷文书院后,历经地方官员多次重修。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南宁府知府郭楠重修,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三年(1585年)左江道陈希美、知府陈纪等复修。“碑文”落款处诸立碑人分列其后,“南宁府知府:陈纪、许僦;通判:陈汶;同知:葛邦弼;推官:万煜;宣化县知县:陈志颐;管工官主簿:肖忠;同立石。万历十三年岁次乙酉春三月吉旦”。许僦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接替陈纪任南宁知府,陈纪带领接替其职位的许僦及各级地方官员共同参与了修复工作,修复敷文书院是许僦上任南宁知府的惠政。明末敷文书院基台塌毁,遂改为兵舍。清康熙九年(1670年)左江道宋翔、知府韩章组织重建,十一年(1672年)知府周起岐重修,二十五年(1686年)知府赵良璧,五十一年(1712年)知府戴锦、五十六年(1717年)知府沈元佐和同知闻人绅等先后重修。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知府刘梦兰、知县李天钰劝捐重修^[27]。组织重修敷文书院之官员皆为流官职位。历任流官经过六部严格铨选被派往边疆对地方土官行监察之责,代表中央王朝对地方实施管辖,是国家意志在地方的体现。土司家族在地方的统治基础深厚,因权益分配等问题导致各种冲突不断,致使经济和文教发展相对缓慢,文教举措难以施行。至明末官学在广西大量遭到毁坏,书院因此得以发展。在敷文书院及地方官员的努力推动下,地方兴学之风自东向西逐渐扩展,形成了独特的广西书院文化景观,使桂西土司辖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加之官学的衰微使中央王朝加强了对书院的管控,历任流官以重修敷文书院表达了历朝统治者对文教治边和“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广西的书院发展与中央在西南地区实施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政策交织运行。明朝时,南宁处于自桂西土司管辖为主的地区向东部流府管辖为主的地区的过渡地带,与桂西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风俗交往甚密,在桂西民族地区中思恩府的儒学底蕴最为深厚。明万历年间,中央王朝对广西地区土、流府的行政管理区域不断进行调整,以加强流官对土司的牵掣。在民族区域多元互动背景下,通过历任流官的不断努力,打破了之前历代统治者实行的边疆文教的局限性,增强了边疆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助推

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以敷文书院创建和重修前后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广西尤其是桂西民族地区书院的大量创办为边疆治理政策转向以文治为主奠定了社会基础。

四、思恩府书院对“大一统”思想的传承与实践

“大一统”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内核,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基石。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参与“大一统”思想的建构,不断构建民族内部的身份认同,充实并完善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内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具有“正统性”地位,始终与中央王朝的目标保持一致,并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在民族地区构建起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共识。思恩府曾是明清时期桂西土司管辖范围最广泛、儒学教育发展最繁荣的地区。明嘉靖后地方官员逐渐在桂西、桂南土司辖区创办书院,清朝时旨在培养基层治理者的书院教育在桂西土司辖区呈现出中兴之势。书院的广泛设立是为“存土设流”管理模式下基于地方实际培养基层管理者。通过梳理广西书院发展情况发现,明清时期思恩府的儒学发展水平居桂西土司辖区前列。地方流官以兴文教、修书院、招募地方官员等措施加强与基层群众的联系,一方面保障地方势力的利益延续,另一方面从基层社会入手打破土司的绝对话语权,逐渐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重建基层社会管理秩序,尽可能地消除流官与当地群众之间的隔阂。

(一)书院教育旨在培养基层治理者

明朝趁改流之际“防察土官”,推动了国家意识向西南民族地区传播。桂西土司辖区长期以发展军事驻地为重,交通相对闭塞,地广人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和族内矛盾导致桂西与桂东地区的社会行政管理方式和文教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因此,中央王朝重视在土司辖区设置流官对土司行监督之责,同时履行“用夏变夷”,对当地乡民实施教化。流官上任后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一,桂西地区高山丛林密布,人员往来较少,各族的生活习惯和生计方式不同,语言各异,即便是土司也不能将其全部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导致部分劣绅对百姓的压榨无人问津。其二,土司直接由中央任命,采取世袭制,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在土司手中,国家权威难以树立。其三,流官

缺乏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不利于进行治理。因此,新上任流官急需招募熟悉当地语言风俗的助手以协助管理。《明史》332卷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总督潘蕃、太监韦经、总兵毛锐调集两广、湖广官军土兵十万八千余人,分六哨……援崖而进……诸军围攻之,浚死。兵部议浚伏诛,不宜再录。其后,田州府土官岑猛,世济凶恶,自陷府治……降猛千户,徙福建沿海卫,尔府皆改流”,“臻选才望熟知夷情者,假以方面职衔莅之”,在土司辖区设“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16]13-14}。杨庭硕先生经考究认为,由本地土职充任之职位前加“土”字,以示区别。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并非土司,其编制与职权皆与内地府、州、县和同级别的流官等同。区别在于选任方式上,土职由当地人充任,无需经过科考,由地方最高管理者选拔土司家族人员或品学兼优、能力卓著者充任,直接受中央王朝委任,不可调离。“土流并治”是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理想治理方式和施政目标,通过不断调试对土官与流官的选任方式达成治理上的制衡和制度上的互补^[28]。下属流官和土官亦可自行招募土弁履行辅佐之职,土弁的任职时间和职位不受朝廷限制。中央王朝重视对土司区土职及下属土弁的选任,避免地方势力的干扰,将中央王朝的国家权威影响至基层社会。嘉靖十八年(1538年),中央王朝为了将四峒纳入国家管辖范围,改“峒”为“都”,划归南宁府管辖。此时对“四峒”之地采取与内地民族地区一致的治理模式条件尚且不足,因而地方官员为四都之地制定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四峒之争久矣,图籍无归,易于丛恶……不若以其地割属南宁府,特设抚民通判一员治之。筑城建署,戎以指挥。分保甲,设峒老,而番役于通判。内能抚辑其众,无奸法者,给冠服荣其身。通判指挥,能其职,奏旌之,以五年期效。”^[29]这则记载中明确将当地的基层治理人员称为“峒老”,其中能力卓越者也可加封,即有“给冠服荣其身”的礼遇,说明“峒老”也分为不同的级别和职权,统一采取选贤任能制。他们直接受命于通判,担任地方流官的辅佐之职。要满足如此大量的人才需求,举办书院培养人才是一条重要途径。

明代前书院的创建多分布于桂林、柳州等地区,整个明朝广西创建书院达70多所^[30]。明嘉靖后,广

西书院发展进入鼎盛期,如南宁府所辖范围内的书院多达14所,邕宁5所,横州6所;思恩府创办书院4所;在此前从未有创办过书院的崇左和钦州亦开始创建书院。明朝时期广西共产生文举人5098人,书院的创办为拣选基层治理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思恩府创办的4所官办书院,在桂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创办时间较早,完全继承了敷文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为改流后的善后措施。桂西各土府共有4所流官创办的书院,与该地区的官学数量基本相当。由此可见,地方流官以兴办书院、亲自讲学的方式,为当地广大百姓提供学习儒学的机会,从中挑选贤能,使德才优厚者进入官僚系统内部,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施政的有力助手。通过书院教育来选拔和培养基层治理者的方式,也是广西书院自兴建之初便呈现出明显官学化特色的原因之一。例如,明朝思恩府出文举人163人,中进士者3人。在为当地培养大批文化人才的同时,思恩府府治所在地的武鸣诞生了许多本土官员学者的著述,包括明代刘定贞的《四书讲义》《灵溪文集》等,黄虞臣的《岭西客对》,黄凤祥的《就正集》《就玉集》,李璧的《名儒录》《剑阁集》《剑门新志》《皇明乐谱》等,这些文化成果在桂西民族地区名列首位。其中影响最深远的非思恩府阳明书院莫属。据《建思恩军民府儒学记》载:“旧基有阳明书院,建自浚党平治后,似不可废。然以文庙视书院,则有缓有急矣。遂即其院而大之,为殿为庑,为门为祠,为堂舍公廡殊,较他郡更新焉。”^{[23]906}由此可推断,思恩府阳明书院最早可追溯至平定岑浚叛乱后,思恩府知府侯国治迁建阳明书院于府治西,后兵燹塌废。思恩府城外东南两江合流处,相传为王阳明讲学地,因多榕树,故名榕树园,后为土官岑氏园。清道光间,知府李彦章重建阳明书院于榕树园,筑天一阁藏书,生徒数百人。李彦章自号榕园主人,曾率诸生333人于王阳明生辰祭奠先生。咸丰年间院园俱废。光绪年间知府黄鸿藻复设书院,刻王守仁石像供院中。宣统二年(1910年)改为小学堂,1912年改堂为校。随后改名为阳明高等小学校。1943年由蒙培勤、李宗儒、黄铭珊等筹办成私立阳明初级中学,1948年更名为武鸣县立第三初级中学,1969年9月改为武鸣县府城高级中学,办学至今。

(二)对“华夷一体”观念的践行

清朝“大一统”经过历代儒学先贤的传承和发展达到高峰,“华夷一体”的观念逐渐形成并成为清政府对西南民族地区实施统治的重要理念。对基层土官的大量需求不仅是为配合中央王朝的施政需要,还受自然环境影响。广西土司地区气候恶劣,明清时期烟瘴严重,导致前往赴任的流官多染病殉职。随着改土归流的全面推进,外地官员由于水土不服导致的各类问题愈发严重,土司辖区官员的供需不平衡状况更为严峻。雍正《广西通志》卷二《气候》记载在有土司分布的六府中,除南宁府外,其他各地烟瘴皆相当严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广西按察使司黄性震疏称:“粤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土司杂处,瘴疠熏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请敕该督抚,就近选择熟悉风土、廉能官员,如三年内果称厥职,照台湾例,即加优升,以示鼓励。”^[24]自此,广西四个府的通判、知县及以上官员所属的流官,不再归吏部选任,而是由督抚就近选任熟悉当地风俗人情和能力卓著的官员调补并缩短其升任期限。“烟瘴缺”作为一项积极的用人制度激励并保障地方官员的有效配置,加大了对基层官员的恩恤。这样的边疆人才选用机制使人员和岗位配置逐渐趋于合理,同时从根本上使得对边疆地方管理人才的需求激增,而官员的供需矛盾刺激了广西书院的迅速发展。“康熙二十五年颁发御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于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并颁日讲义经史诸书”^[25]。这段话反映了中央王朝对书院的鼓励态度,并开始对书院的授课内容进行管理。清代广西共创建书院272所,其中桂西52所,思恩府至少有16所^[26]。在民族地区创建书院,目的在于向基层群众开展思想引导和政治教化,扩大对地方管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保证所选派之流官能抵御烟瘴之毒。长期以来,书院作为官学的补充,规避了科举考试的弊端,亦是对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的重要补充。

清时思恩府治域在今广西武鸣、宾阳、上林、马山、田东、平果、都安等县(市、区)。道光五年(1825年)七月,李彦章来到思恩府为官时言“难得边人尤信道”。李彦章(1794—1836年),福建侯官(今福州

市闽侯县)人,先后创建阳明书院,增建西邕书院,修复琴泉义学。清朝道光六年(1826年),李彦章带头捐银并亲自率领思恩府一州三县(即宾州,武缘县、迁江县、上林县)和土巡检九司(即白山、兴隆、那马、定罗、古零、下旺、旧城、都阳和安定)诸土酋,恢复重建阳明书院,自兼掌教,书院分为10斋26轩,皆统于实学、实用2斋^[34]。现武鸣中学内仍留有大批李彦章石刻题记。此外,李彦章还亲自制定《榕园学矩》,编教材《榕园识字编》《榕园辨韵编》《江南催耕课稻编》,讲学其中。书院有劝学联:“智欲圆而行欲方,心欲小而志欲大;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书院大门楹联:“服其教、畏其神,故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遍为尔德;官先事、士先志,有君子之词,而无君子之行,莫入吾门。”^[35]李彦章在广西思恩府为官七年(1825—1832年),扩建思恩府试院(故址位于今宾阳县职业高中内),规模居广西之首,成为附近乡邑优秀人才的聚集之地,生员纷纷来此应考。此外,他还推广“双季稻”种法,使当地民众收获颇丰。他以朱熹、王阳明所推行的保甲制为蓝本,整顿社会秩序,采取有力措施杜绝抢占土司官田现象,当地民众称他“仁周边土”,为其建立生祠^[36]。李彦章力主罗波庙为思恩府属城隍庙,内祀土官岑瑛。罗波庙由于思恩府知府李彦章的脩崇且纳入官方祀典而获得了“正统性”^[34],并留存至今。庙门正上方的“罗波庙”三字由曾任岭山书院、阳明书院山长的韦丰华提写,其庙界等同于思恩府的行政区划,充分体现了民间信仰领域国家的在场,在礼制层面贯彻并实践了“华夷一体”的观念。李彦章与当地各土司共管共治,振兴当地文教,通过不断的交流与融合,营造了共同的地域历史文化记忆,创造了思恩府辉煌的古府文化。流官对基层的统治权威在当地逐渐树立起来,在有效地削弱地方势力的同时,将国家意识和内地管理模式融入当地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治理模式,激发了少数民族文学著述的创作。书院的创办实则是将受教育的权利从土司子弟扩展至基层社会,拓宽了选拔地方人才的渠道。地方官员以创办书院并主持授课为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定向培养边疆治理人才,是中央

王朝实施文教戍边的重要内容。在外来流官、土司和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地区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夯实。

结语

明嘉靖后在广西尤其是土司辖区由地方官员创建的书院,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与选拔基层管理人才。从客观效果看,它是中央王朝加强对桂西民族地区治理的具体措施,拓宽了社会关系网和获取信息的途径,有助于了解地方百姓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增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基层社会培养了新的道德文化共同体。明清时期思恩府创建书院近20所,其中以思恩府府治所在地的阳明书院影响最为深远。明嘉靖六年(1527年)后桂西民族地区新建的52所书院中,田州、宾阳、崇左、百色等地第一次建有书院,在土司管辖范围内的府、州、县、乡、圩、寨均有创办书院的记录^[33]。书院作为边疆治理的具体措施,突破了地域、民族和社会阶层的界限,为改土归流的实施扫除了障碍。“改土归流”是对土司单线世袭制度的修正,广设书院则是基层人才管理制度的革新,推动了广西土司辖区和平改流之进程,为传承和践行“大一统”思想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 [1]邓敏杰,邓滔.广西书院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
- [2]李彦福,雷剑.试论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书院[J].广西社会科学,1986(4).
- [3]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4]高敏贵.广西的书院[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5).
- [5]陈业强.广西书院研究[J].广西地方志,2004(2).
- [6]蓝武,黄东成.明代广西书院发展的历史分期、时代特征及其多维成因[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2).
- [7]罗振宝.清代桂林书院与地方文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0.
- [8]张维.“岭西五大家”说书院[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 2006(1).
- [9]孙先英,覃明. 敷文书院与王守仁的书院教育思想在广西的传播及影响[J]. 广西社会科学, 2010(3).
- [10]陈晨. 书院与清代边疆文化治理的走向[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3).
- [11]高福顺. 边疆治理视阈下的中国古代边疆文教[J]. 史学集刊, 2012(2).
- [12]蒋金玲. 边疆治理视阈下的明代边疆文教[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20(2).
- [13]苏雪娟, 乃艳飞, 黄碧红. 平果市旧城镇兴宁村走访见闻[EB/OL]. (2022-12-29)[2023-07-21]. http://zhuanti.bsyrjrb.cn/content/2022-12/29/content_204232.htm.
- [14][清]汪森. 粤西文载:卷四十四[M]. 黄盛陆, 等, 点校.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280.
- [15][清]汪森. 粤西文载:卷六十四[M]. 黄盛陆, 等, 点校.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1409.
- [16][清]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7][清]汪森. 粤西文载:卷七十四[M]. 黄盛陆, 等, 点校.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 351-352.
- [18]蒙荫昭, 梁全进. 广西教育史[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 176.
- [19][明]佚名. 明实录:明宣宗章皇帝实录 115 卷之二十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9.
- [20][明]李贤. 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五[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 13.
- [21][清]金鉷. (雍正)广西通志:卷一百五[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38.
- [22]邓洪波. 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
- [23][清]谢启昆, 胡虞. 广西通志:第 6 册[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24][清]金鉷. (雍正)广西通志:卷六十七[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5.
- [25][明]佚名. 明实录:明世宗肃皇帝实录 566 卷之八十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2.
- [26][明]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第 3 册[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
- [27]莫炳奎. 邕宁县志[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 861-862.
- [28]杨庭硕, 李银艳. “土流并治”:土司制度推行中的常态[J]. 贵州民族研究, 2012(3).
- [29][明]焦竑. 国朝献徵录:卷三十九[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 73.
- [30]蓝武, 黄东成. 明代广西书院发展的历史分期、时代特征及其多维成因[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9(2).
- [31]本社. 清实录: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之一百二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2.
- [32][清]张廷玉, 等.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758.
- [33]全昭梅. 广西书院与地方文化研究[D]. 广西大学, 2015.
- [34]黄世杰, 廖振姣. 武鸣罗波庙历史人类学解读[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 [35]邓敏杰, 邓韬. 广西书院钢沉(二)[J]. 广西地方志, 2016(6).
- [36]黄保万. 论林则徐与李彦[J]. 福建学刊, 1989(3).

责任编辑:许立坤

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发展及经验研究

阳 阳, 覃蕾璇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 回顾中国与东盟 30 多年来的合作历程, 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成果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亮点。在共同体视域下, 坚持相互契合的理念作为共同价值基础, 坚持全面覆盖的合作机制和多元包容的合作精神, 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主要经验。

关键词: 共同体; 中国—东盟; 合作关系; 经验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14

[中图分类号]D822;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099-08

引言

“共同体”观念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面对城邦之间不断混战的局面, 柏拉图试图以国家名义建立一个超越城邦的共同体。他在《理想国》中指出: “建立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 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1]亚里士多德也提出: “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 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 很显然, 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 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2]此外, 卢梭的“契约社会”、康德的“世界公民”和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共同体的内涵, 但都没有实现对全人类层面的人文观照。以前人为鉴, 马克思指出: “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 总是相

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 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 因此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 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 而且是新的桎梏。”^[3]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出关于共同体的实质性内涵, 但指明了方向: 真正的共同体应该超越一切阶级和阶级利益, 以维护每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的利益为基础, 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 真正的共同体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与作为个体的人在价值与利益上的和谐统一。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出发, 这种和谐统一的共同体能够产生, 必须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当前, 人类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在客观上要求人类结成超越一切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共同体, 以共同解决危机。

收稿日期: 2023-09-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22XGJ004)。

作者简介: 阳阳, 女,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副研究员,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东南亚政治、经济; 覃蕾璇, 女, 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方向 2021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越南政治经济。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是一个整体,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就需要基于共同价值而非个人价值或特定群体价值作为意识基础。这也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即“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4]。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内涵进行阐释:“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

回顾中国与东盟 30 多年来的合作历程,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成果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亮点,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双方通过相互契合的理念为中国—东盟合作构建了共同价值基础。由此建立的全面覆盖的合作机制,形成的多元包容的合作精神,都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了保障。

一、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发展与成效

(一)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此时也是整个亚太地区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从战争走向和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启对话并走上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1. 合作关系确立。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苏联解体,两极争霸的格局也随之结束。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的形势也发生了改变。1991 年《巴黎和平协定》签署,标志着僵持已久的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东南亚实现了和平,迎来了地区稳定发展的有利时机。同时,域内各国都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从对抗真正走向了合作,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缓步启动^[6],东盟建设持续推进。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增强。东盟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为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有着相同的需求,在地区利益和地区安全问题上有着共同目标与利益,对地区的繁荣与和平稳定有同样的期望。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与东盟国家就有了政治、经济的合作基础。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

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高。1990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东盟成员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新加坡开展了友好访问,期间中国与印尼恢复了外交关系,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经济上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了 66.9 亿美元^[7]。1991 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受邀出席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开幕式,并与东盟六国外长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正式对话关系的开始。

2. 合作关系发展。1996 年,中国升级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1997 年,中国—东盟首次首脑会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双方在会上交换了友好交往、合作共赢的愿景,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东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中国—东盟的伙伴关系建立之后的 4 年间,中国分别与多个东盟成员国签署了双边合作框架文件,建立了互信友好关系。进入 21 世纪,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加强。根据中国建议,中国与东盟 2000 年就建立自贸区问题开展专家论证。2001 年,第五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宣布,在今后 10 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就 21 世纪初重点合作领域达成共识,其中包括把湄公河流域开发确定为 21 世纪双方合作的优先事项。2002 年,第六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正式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启动;双方首次发表《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启动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双方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中国与东盟外长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等等。

3. 合作关系提升。在 2003 年“10+1”会议期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盟对话伙伴中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国家。同时,中国—东盟确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签署发表了《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自 2005 年起,中国与东盟就双方合作计划与目标连续

制定了《落实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并圆满完成,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与东盟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5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正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9年,中国和东盟发表的《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称,双方认识到对接合作将有助于区域互联互通、和平稳定、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9]。2020年,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由东盟十国发起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今世界人口最多、规模最大、潜力最足的自贸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朝着更为深广的方向发展。

2021年以来,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继续提升。2021年11月22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和东盟共同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制定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中国重申支持东盟保持中心地位,支持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加强中国—东盟疫情疫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长期可持续发展^[9]。随着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也正式开启磋商,中国—东盟合作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成效

历经30多年的发展,中国—东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经济领域的成果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一大亮点。

30多年来,中国—东盟贸易额逐年攀升。1990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为66.9亿美元,如今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即便2020年暴发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市场,三年来中国—东盟的贸易总额仍保持持续上升^①,体现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关系的韧劲。2022年双方贸易额达到了9753.4亿美元,增长11.2%。其中,出口5672.9亿美

元,增长17.7%;进口4080.5亿美元,增长3.3%^[10]。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23年前5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2.5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9.9%,占外贸总值的15.4%,东盟继续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东盟出口1.5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6.4%;自东盟进口1.0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4%;对东盟贸易顺差5238.6亿元人民币,扩大64.3%^[11]。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平台,如中国—东盟博览会至2022年已成功举行19届,期间中国—东盟博览会共发布80多份合作倡议、发展报告、白皮书、年鉴等,建立20多个领域部长级磋商机制,催生30多个合作平台,启动10多个培训基地,共有110万客商参会^[12]。

中国—东盟在传统经济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在海洋经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海洋经济方面,现已建立起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国家海洋合作论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国家海洋合作论坛已举办了7届,来自东盟各国的代表与学者在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气候检测、资源保护等领域展开探讨合作^[13]。2022年举行的第十二次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取得了多项新成果,不仅与文莱、柬埔寨、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盟国家工商会联合发布《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工商界共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南宁倡议》,并且涉及港口物流、产业链等领域的合作相继签约,如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PSA国际港务集团合作备忘录,北部湾港与文莱摩拉港共同促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和东盟东部增长区互联互通合作备忘录等^[14],推动了中国—东盟的蓝色经济合作。《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中提出要鼓励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15]。目前,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虽仍处于开端,但加强双方海上合作联通,共同保护和开发海洋资源,对于中国—东盟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是当前中国与东盟所重点关注及发展

^①2020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6846亿美元,2021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8782亿美元,2022年中国—东盟贸易额为9753.4亿美元。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的领域之一。2020年发布的《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中指出,数字经济是亚太乃至全球未来发展重要方向,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更是凸显了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并对中国—东盟的数字经济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倡议^[16]。2021年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提出,将《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与《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对接,如今中国—东盟的数字经济建设集中在数字产品制造、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要素驱动三大领域。中国不仅与越南、缅甸、老挝等国家搭建跨境光缆,中国企业如小米已在越南建厂生产手机,云服务商如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等在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国家建立起了数据中心^[17]。数字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比传统经济更为广阔的市场和目标人群,符合中国与东盟双方的发展需求。推动数字经济合作不仅能带来巨大收益,更能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朝更高质量的层次发展。

二、中国—东盟合作的主要经验

中国—东盟双方在多年的合作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推动了双方在观念层面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合作发展的共识,积淀了厚重的经验。

(一)理念契合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共同价值基础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其中“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心心相印、坚持开放包容”是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内涵的核心阐述。这一阐述不仅对过去双方合作共赢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也为未来双方合作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的轨道迈进指明了方向。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题为《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与东盟在发展实践中获得的最重要经验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包容互鉴,同时提出“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的五点建议,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人

文内涵。此外,习近平强调,中方将坚定不移以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东盟共同体建设,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18]。

关于表述东盟中心性最早的文字可见于2007年签署的《东盟宪章》第15条宗旨,以“中心地位”作为东盟对于自身角色定位的追求:“在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地区架构内,维护东盟在同外部伙伴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和积极主动作用。”^[19]东盟对“中心地位”的坚持,是东盟共同体从冷战到和平发展时期汲取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东盟在发展对外关系实践中获得的最宝贵经验。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变动复杂的大背景下,谋求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体量相对较小的东盟各成员国来说十分重要。东盟地位“中心性”的定位符合东盟自成立以来所坚持的在涉及本地区事务中“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宗旨,以整体性的角色面对世界,有助于提高在世界舞台的话语权。2015年东盟宣布东盟共同体建成,并发布了《东盟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其中指出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致力于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以东盟作中心,加强区域内部的凝聚力和一体化程度,做地区事务的“主导者”^[20]。

对比可见,两种理念在根本上高度契合。一是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地区成员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这反映出中国和东盟对外部环境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和判断;二是平等与尊重是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条件,体量大小不同的国家都拥有相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与权利,表达出中国和东盟各国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共同诉求;三是合作共赢是发展对外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唯一途径,这是中国和东盟从合作实践中取得一系列发展成果的经验总结;四是相互肯定和支持对方的理念,这对中国和东盟在未来实现增进互信与深化合作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基于两种理念的高度契合,中国和东盟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和空间寻找相同点和共通点,为双方从互联互通走向民心相通提供了可能性。

(二)全面覆盖的机制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制度依托

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中国与东盟之间建立不同的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双边机制主要是中国—东盟“10+1”机制。该机制自1997年成立以来,双方合作不断扩大与深化,现已发展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之一。1997年,中国—东盟双方举行第一次“10+1”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后每年定期召开一次的领导人会议。“10+1”下设12个部长级会议机制,分别是外交、经济、交通、海关署长、总检察长、卫生、电信、新闻、质检、打击跨国犯罪、文化、青年事务。此外,还有5个工作层级的会议机制,分别是高官磋商、联合合作委员会及工作组会议、经贸联委会、科技联委会和商务理事会,以及中国—东盟中心和东盟博览会等^[4]。

多边机制则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东盟—中日韩“10+3”机制。1997年,东盟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参加非正式会议,形成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其成员包括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韩国。各成员在20多个领域建立了66个对话与合作机制,组成了以每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为核心,以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大使级会议(CPR+3)和工作组会议为支撑的合作体系。部长级会议主要包括外交、经济、交通、海关署长、总检察长、青年事务、卫生、电信、新闻、质检和打击跨国犯罪等内容。

二是东亚峰会。2000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了“东亚峰会”的概念。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举办。东亚峰会成员国所涉及的地理范围较大,不仅有处于南亚的印度,还囊括了太平洋地区的新西兰、澳大利亚,后俄罗斯、美国也在2010年参与进来。东亚峰会是年度领导人会议机制,由东盟轮值主席国主办和主持,经贸、能源、教育部长期进行会晤。东亚峰会重点合作领域在能源环保、金融、教育、东盟互联互通等。

三是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地区论坛(ARF)于1994年成立,成为亚太地区官方多边安全合作的开端,现有27个成员,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

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欧盟。东盟地区论坛的架构较为特殊,其组织形式依靠东盟,未设置独立的秘书处与其他的常设性机构,每年在东盟轮值主席国内举办论坛会议,并由东盟轮值主席国负责论坛议程的设定和具体事项。论坛下设高官会、安全特别会议,建立信任措施与预防性外交会间辅助会议均为每年召开一次。此外,一年内还有5次会间会(救灾会间会、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海上安全会间会、防扩散与裁军会间会、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安全会间会)和2次国防官员对话会。中国不仅参加了历届外长会,还主办和参加了各类的合作项目,为维护地区安全作出了贡献。

四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澜沧江—湄公河机制是李克强在2014年11月举办的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合作机制。这是由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组成的一个次区域合作机制,主要围绕澜沧江—湄公河沿途区域进行合作建设。2015年11月12日,首次外长会议在云南景洪举行,会议通过了《澜湄合作概念文件》和《首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六国外长就澜湄合作目标、原则、重点领域、机制框架和首次领导人会议相关安排等达成一致,决定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打造更为紧密、互利合作的澜湄共同体。2016年3月,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此次会议全面启动澜湄合作,共同发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和《澜沧江—湄公河国家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提出合作的重点领域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区域经济、水资源、农业以及减贫等。

五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由亚洲开发银行于1992年发起,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共同参与。自发起以来,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已

形成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总体合作架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信、贸易投资、能源、农业、禁毒、旅游等9个领域,以经济合作项目为主导,合作重点有基础设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私营部门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六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2006年“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首次提出建设中国—东盟海上次区域合作机制,将中国与越南的环北部湾经济合作范围延伸到隔海相邻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等临近北部湾的国家。合作重点在加强港口物流合作,加快产业对接与分工,促进贸易投资,大力发展海洋工业,联合开发海上资源,加快临海城市发展。同时,以陆地交通如铁路、公路干线为依托,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通过沿线重点城市合作和跨境合作,吸引各类相关产业在此集聚并形成市场,在中国与中南半岛之间形成一个日趋繁荣、辐射力强大的经济走廊。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机制丰富多样,在规模上包括了区域与次区域,层次上覆盖了首脑与地方,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个领域,呈现纵多层次与横向领域交织,构建出一个全面多元的合作网络,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

(三)多元包容的精神是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保障

中国参与了东盟牵头和主导的多个多边机制,并在其中扮演了积极合作的角色。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有关南海问题的和平对话持续推进,安全领域的合作继续深化,体现出多元包容的精神内涵,为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发表后,中国和东盟举行了多次高层会议,推动全面落实DOC的进程。2011年中国和东盟达成《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指导方针》,指导方针强调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宣言,继续推进和平对话。2013年“南海行为准则”(COC)全面启动磋商。COC是《南海各方行为

宣言》的增强版和升级版,在多方努力下于2017年通过文本性框架,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目前,COC已进入二读。

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于2002年发表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声明》,开启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确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信息交流、人员交流、执法合作方面具有共同利益^[21],并制定了中长期的合作规划,各国执法部门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展开合作。截至202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的“平安航道”扫毒行动已破获2万件毒品案件,抓获2万多名犯罪嫌疑人,并缴获各类毒品15.6吨^[22]。2011年12月9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在中国云南关累港启动,湄公河国际航运全面恢复,开创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新模式,到2021年四国联合巡逻执法已达到第101次。在第101次的联合巡逻执法中,中老缅泰共派出执法船艇5艘、执法人员134人,总航时33小时,总航程612公里;检查车辆36辆、人员52人、货物21.6吨,持续震慑流域内各类违法犯罪活动^[23]。

从2002年中国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到2013年“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强调以积极的态度与东盟进行合作,在地区安全方面扩大了合作范围。在2017年10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十国首次就开展海上联合演习达成一致,并于2018年8月和10月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2023年中国宣布,由中国—马来西亚为原始成员开展的以“和平友谊”为名的系列联演将继续扩员,中国将在今年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进行六国联合多边联演^[24]。“和平友谊”系列联合演习每次都有新内容及新的东盟国家加入,意味着中国和东盟在防务安全上的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关系愈发密切,已然成为地区安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中国与东盟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东盟成员

国政府关于文化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后续的发展规划和行动计划等落实协议也相继签署并实施,有力促进了人文旅游、文化交流对话以及教育互访等形式的合作。在新冠疫情未爆发前,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员双向往来互创新高,超过6500万人次^[25]。2006年在广西启动的中国—东盟文化论坛,成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之一,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8届。2008年启动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也连续举办了15年,已成为中国—东盟进行教育合作、高层次教育事业交流合作发展的平台。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中国—东盟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升级版”,希望实现双方学生流动总规模于2025年达到30万人次的目标^[26]。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基于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合作促发展的共同认知,形成了全领域覆盖的合作机制与多元包容的合作精神,在取得一系列成果同时也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走深、走实,形成如今政经互促、人文互通的良好局面,为未来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环境。

结语

从哲学角度看,形成共同体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从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冷战时代的历史教训、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合作是发展的有效途径等认知,为中国和东盟建立合作关系奠定了认识基础,而世界进入区域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则客观上要求国际社会成员突破各种界限和壁垒,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东盟开启合作并树立了合作共赢的典范。

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发展是观念与实践互构的过程。从中国—东盟3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合作共赢的共识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共有的理念基础,成为联结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和东盟“印太展望”的契合点。在这一基础上,双方通过建立全面覆盖的合作机制、发扬多元包容的合作精神,推动中国—东盟关系行稳致远。随着由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加之逆全球化现象持续抬头,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愈加严峻。面对这一形势,中国与东盟现有的共识与合作机制、成果也愈发弥足珍贵。坚持共同的价值基础,提升现有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多元包容的精神,将是未来中国与东盟共同克服挑战的关键所在,也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5.
-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4.
-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
-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 [6]曹云华.东南亚国家联盟:结构运作与对外关系[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163.
- [7]陈宝鏊.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新发展[J].现代国际关系,1991(4).
- [8]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EB/OL].(2019-11-04)[2023-01-23].http://switzerlandemb.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201911/t20191104_9386088.shtml.
- [9]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面向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EB/OL].(2021-11-23)[2023-01-25].http://www.gov.cn/xinwen/2021-11/23/content_5652616.htm.
- [10]2022年中国—东盟贸易增长强劲[EB/OL].(2023-01-13)[2023-01-25].<http://asean.mofcom.gov.cn/article/>

jmxw/202301/20230103379201.shtml.

[11]中国外贸保持强劲韧性,前5月进出口总值超16万亿[EB/OL].(2023-06-12)[2023-07-21].https://www.163.com/dy/article/I7195SDH0519QIKK.html.

[12]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东盟重要的开放合作平台[EB/OL].(2022-11-23)[2023-01-29].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gnwjmdt/sb/sbqt/202211/174979.html.

[13]第七届中国—东南亚国家海洋合作论坛召开[EB/OL].(2021-10-27)[2023-02-15].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110/t20211027_2700268.html.

[14]第十二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开幕,发布多项新成果[EB/OL].(2022-07-08)[2023-02-15].http://bbwb.gxzf.gov.cn/ywdt/t12777474.shtml.

[15]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23 年愿景[N].人民日报,2018-11-16(3).

[16]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EB/OL].(2020-11-12)[2023-02-15].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dnygjlm_673199/zywj_673211/202011/t20201112_7492262.shtml.

[17]张群.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合作的机遇、挑战与前景[J].国际关系研究,2023(3).

[18]习近平.命运与共 共建家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34).

[19]ASEAN Charter[EB/OL].(2007-11-5)[2023-05-18].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images/archive/publications/ASEAN-Charter.pdf.

[20]ASEAN 2025: Forging Ahead Together [EB/OL].(2016-01-05)[2022-05-13].https://www.iseas.edu.sg/images/pdf/FINALWEBSingleJAN16ASEANFocusSpecial.pdf.

[21]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Bangkok[EB/OL].(2004-01-10)[2023-02-18].https://asean.org/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between-the-governments-of-the-member-countries-of-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and-the-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cooper/.

[22]李晨阳,杨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J].国际关系研究,2022(4).

[23]中老缅泰圆满完成第 101 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EB/OL].(2021-01-30)[2023-02-18].https://m.gmw.cn/baijia/2021-01/30/1302080407.html.

[24]中国和东盟国家“和平友谊”演习再扩员! 专家:发挥安全稳定器作用[EB/OL].(2023-05-29)[2023-06-18].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3-05/29/c_1212193161.htm.

[25]中国—东盟文旅为“媒”探索“后疫情时代”可持续发展[EB/OL].(2021-12-27)[2023-02-23].https://newqcom/rain/a/20211227A06Q8L00no-redirect=1.

[26]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多点开花[EB/OL].(2017-09-11)[2023-03-02].http://www.scio.gov.cn/31773/35507/35514/35522/document/1563187/1563187.htm.

责任编辑:杨绪强

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提升服务教学科研水平的途径

——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为例

农晓芬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广西南宁 530007)

摘要: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加强图书馆建设,是服务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提质增效的客观需要,是提升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水平的客观需要,是顺应图书信息资源数字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坚持以服务教学科研需求为导向,立足功能定位,树牢数据思维,不断优化空间布局,着力打造“四大类型”的统战文献馆藏和“三大特色阅览区”,逐步提升网络信息服务能力,营造优美舒适的阅读环境,为提升教学科研质量提供支持。新时代新征程,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可通过突出特色、整合资源、推动信息化、优化环境等途径,着力打造统战特馆藏资源,多渠道搭建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阅读体验感,不断提高服务教学科研的水平。

关键词: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教学科研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3.05.015

[中图分类号]G251;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3)05-0107-06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统一战线教学科研工作^①是社会主义学院的主责主业。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强调:“社会主义学院应当建立能够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图书馆(室),建设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文献资料信息中心。”^②社会主义学

院加强图书馆建设,是服务教学科研的重要举措,也是更好地落实《条例》、推动社会主义学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一、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加强图书馆建设服务教学科研的重要意义

(一)满足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提质增效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文献资料信息的主要来源地,是服务教学科研的重要窗口。《条例》规定的社会主义学院基本任务,其中

收稿日期:2023-08-15

作者简介:农晓芬,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网图部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特色图书馆建设。

一项是“培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其他领域代表人士,培训统战干部,培养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人才,承办党委和政府举办的有关专题研讨班”^[1],培训对象涵盖了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以及统战干部等。培训对象范围广、领域多,给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提出了新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加强图书馆建设,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提质增效的客观需要。

(二)提升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水平的客观需要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是根据读者的需要,有针对性地为用户提供服务。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培训对象更加多元,包括党内、党外,体制内、体制外,国内、国外等不同领域的统一战线成员和统战干部,呈现出范围广、类别多、层次多等特征,培训需求也多种多样。这些新特点新需求,内在地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不断提高个性化服务水平,特别是文献服务、阅读环境、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个性化服务水平。文献服务个性化主要指图书馆在提供阅览、检索等服务同时,针对学员和教研人员的需求、兴趣、研究领域等,提供信息推送、网上虚拟服务等个性化定制服务^[2]。阅读环境个性化主要指营造一种聚集统一战线信息资源和人气的知识空间和文化氛围。教育服务需求个性化主要是图书馆通过举办读书分享会、主题展览、文化讲座等活动满足社会主义学院不同培训对象的个性化要求,如宗教界人士、港澳人士、海外人士等的个性化培训需求。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开展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可以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教学科研工作前沿动态信息,为读者提供定制信息,节省读者时间,提高图书馆的工作效率。

(三)顺应图书信息资源数字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智能信息化时代,图书信息资源数字化发展是一个重要趋势。从读者阅读的便利性和喜好来看,电子数据资源更加受到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青睐;从图书馆的馆藏便利和数量来看,电子数据资源有利于提升服务工作水平。图书馆将纸质图书文献数字化,具有保护纸质文献,提高馆藏利用率、开展科学研究和管理等作用。当前,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依靠数字化手段积极服务学院进行教学改革,服务提高教学质量,帮助读者及时掌握教学科研的前沿动态和获取有效资讯。如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使用移动图书馆 APP、微信公众号平台、QQ 群、触摸屏阅读媒体设备等新媒体^[3],可以建立更优良的数字化阅读环境,更好更及时地为读者提供图书信息资源。

二、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提升服务教学科研水平的实践及成效

近年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着力建设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图书馆,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提升学院教学科研水平提供了支持。

(一)坚持需求导向,“四大类型”的统战文献馆藏不断丰富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坚持政治性、统战性、实用性相结合,主动开展教学科研图书信息需求调查,充分征求教学科研人员、学员等读者的意见,做到按需采购。图书馆多渠道掌握统一战线领域图书资料更新信息,做到及时采购、及时上架,如大型文献《复兴文库》出版后,图书馆第一时间联系采购上架。近年来,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根据教学科研需要,突出特色建设,重点建设了统一战线相关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文献资料,中华文化相关文献资料等“四大类型”的统战文献馆藏。至 2022 年底,图书馆全年入库图书 422 种,其中统一战线相关文献资料入库图书 94 种,占比 23%;马列著作及相

关研究成果入库图书 49 种,占比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文献资料入库图书 140 种,占比 34%;中华文化相关文献资料入库图书 98 种,占比 21%。可以说,以上“四大类型”图书在全年的入库量占了绝大部分比例。“四大类型”文献的不断丰富,凸显了图书馆按照教学科研需求导向丰富馆藏的特点。

(二)立足功能定位,“三大特色阅览区”服务教学科研成效明显

一是建设统一战线理论图书阅览室。为了体现图书馆“便捷、开放、自由”的人本理念,让读者更便捷查阅最新的统战图书,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在原有空间基础上改建装修,打造统一战线理论图书阅览室。统一战线理论图书阅览室布置了四个主题板块,分别是统一战线工作理论文献资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书籍及学习读本,各个主题板块摆放相关的文献资料。其中,统一战线工作文献资料板块根据统战工作各个领域细分统战理论、民主党派、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侨务工作、台港澳工作、人民政协等区域,各个区域摆放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打造空间载体,让馆藏统战文献直接面向读者,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文献信息中心的作用。

二是打造中华文化图书阅览室。学院高度重视中华文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独特作用,着力打造中华文化图书阅览室。中华文化图书阅览室由中华文化精品图书区和中华文化相关主题区两个板块构成。其中精品图书区主要摆放二十四史、四库全书荟要、中华国学文库、著名文化大师文集、大藏经等图书;中华文化主题区细分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广西民族文化、中国茶文化、中国书画、中医文化等区域,以阅览室为载体形式展示中华文化文献,与馆内茶文化体验室、书画体验室相辅相成,有利于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习。

三是开设红色主题阅读体验区。在上级部门的

指导下,学院图书馆建立了红色主题阅读体验区,打造学院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新载体、党员教育的新平台、党群干群关系的新纽带,促进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等业务工作融合发展。红色主题阅读体验区分为图书陈列区和阅读交流区。其中,图书陈列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主题读物为重点,突出党建类、文史类出版物;阅读交流区可以举办各类读书会,通过推荐主题阅读图书、分享读书心得,打造集合型阅读空间,为读者进行主题学习活动创造条件。

(三)树牢数据思维,网络信息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在广西统一战线网络学院上开设了数字图书馆,全区各级统战部门干部和统战成员通过远程登录,阅读、下载使用知网、超星、读秀等数字资源。同时,学院图书馆还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围绕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时政要闻、教学内容及科研人员需求等收集、整理、编辑相关专题信息资料,定期编印《统战资料选编》,更好地服务读者和满足教学科研人员对统战文献信息的需求。

(四)优化空间布局,打造出优美舒适的阅读环境

为满足读者对休闲阅读的需求,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在原有馆舍条件基础上装修改造,优化图书馆布局,充分利用露台空间,开拓多功能阅读的空间,营造舒适的书香阅读环境。学院与国家行政学院国正书吧合作,在图书馆开设了国正书吧、小报告厅、茶文化体验室和书画艺术体验室,并提供咖啡、茶饮等。通过环境改造,将阅读、休闲、娱乐、学习等多方面功能整合在一起,通过灯光、色彩、绿植装饰的搭配营造温馨舒适、人性化的空间,突破了传统藏书库、报刊阅览室、阅览大厅的概念,馆内任何一处都可以成为阅读空间。此外,读者可以在图书馆内欣赏电影、品茶道或者挥毫泼墨等;教研人员可以在图书馆内组织开展读书交流、阅读分享等活动。

三、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提升服务教学科研水平的途径

(一)突出特色,着力打造统战特色馆藏资源

特色藏书是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根据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教学科研工作的新趋向、新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打造特色图书馆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1.突出统战特色。一是扩大统战特色图书资料馆藏量。统战特色馆藏数量的采集,以统战工作12个领域的文献为重点,包括统战理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新的社会阶层、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港澳台工作、侨务工作等方面。二是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等基础学科馆藏文献数量。增加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文献藏书,如政党制度、政治协商、民主政治等。三是适当开发学院和统一战线成员优秀科研成果数量,打造特色数据库。结合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工作情况,对教研人员和学员完成的科研成果、优秀论文和调研报告等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统战资源库,以满足教学科研工作及领导决策对信息的需求。四是利用“联合党校”优势,整合各民主党派图书室资料,搭建包括民主党派的社情民意信息、参政议政档案、重大课题等在内的统一战线特色资源库。五是利用社院图书馆特有的统一战线资料文献优势建立数据库,保证读者可以直接检索统一战线信息,方便快捷。

2.突出中华文化特色。围绕中华文化学院教学科研和文化工作职能,重点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书库、书架。中华文化学院主要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国情教育和中华文化研修,同时面向民族、宗教界等人士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培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类图书更是浩如烟海。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在选择这类图书时,应根据本馆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增加经典书籍。一是优化中华文化经典书籍文献布局,有针对性地采购经

典图书,如《经》《史》《子》《集》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二是适时采购当代优秀的中华文化学术成果和经典图书,做到与时俱进。图书馆馆藏建设突出中华文化特色有助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促进海外侨心凝聚,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

3.突出政治共识特色。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教学科研工作要紧紧围绕增强统一战线广大成员的思想政治共识展开,特别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贯彻到教学培训中,以“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图书馆作为社会主义学院教学科研支持部门,在馆藏文献建设上更要突出政治特色,注重入藏政治类、社科类等文献,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文献,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

(二)整合资源,多渠道搭建服务平台

充分发挥“联合党校”和统一战线资源优势,整合各类图书信息资源,建设合作开放、特色突出、环境出色、服务优良的专业化图书馆,不断丰富服务平台。

1.整合馆藏资源。一是优化馆藏布局。合理配置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华文化经典藏书,拓展经济、科技、教育、艺术、哲学等方面图书。二是合理搭配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建设比例。传统的馆藏资源建设以纸质文献为主,而在信息时代读者阅读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使用手机、电脑、平板阅读成为习惯,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建设比重呈上升趋势。数字资源将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在网络上供读者使用,覆盖面广、容量大,读者可以在网络上自由搜索所需,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可以通过购买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网页检索以及使用图书馆图书管理系统管理图书、自建数据库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建设数字资源,给读者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

三是打造视频资源数据库。适应现代信息化、可视化发展和满足人们对音像视频资源需求量增加的要求,充分发挥社院统一战线教育培训优势,打造在线数据库,加快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2.整合社会资源。一是整合馆际资源,开展馆际互借。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要主动联系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基于共建共享的原则建立馆际互借机制,提升图书馆的文献服务水平。二是与社会力量合作办馆。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可以通过整合社会力量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吸引更多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参与图书馆建设,通过合作的方式弥补自身资源或服务的不足,共享各自的资源和服务。三是通过馆企合作,利用超星、知网、万方等数据公司技术优势,打造社院特色数据资源库,将教材、教案、课题、资政等成果数据化。四是依托“联合党校”,充分利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人才优势,联合举办名家讲座、文化讲坛、书画展等活动,提升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三)推动信息化,持续提升服务教学科研能力水平

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移动终端和信息服务平台,发挥网络平台作用,增加用户和图书馆之间的互动性,实现在线咨询、好书推荐、移动图书馆集成等功能,逐步往智慧图书馆方向发展^[4]。

1.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统一战线信息共建共享。在信息化条件下,大数据、云系统正深度介入图书馆的日常工作。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应结合自身实际,运用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云端服务,打造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强化教学科研平台和图书馆服务云平台的合作,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一是推动实现学院内部共享,主要针对教师、学员对文献资源的共享,以及图书馆与计算机中心、信息档案部门、各部室的文献资源共享。二是实现干部院校和高校教学、科研成果、理论研究和宣传资源的共建共享。三是实现各

级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机关、工商联、商会组织以及各级社会主义学院等系统内资源的共建共享。四是积极构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议案资源数据库建设,实现各类信息资源、调研课题、参政议政成果的数据库资源共享,为教学科研人员提供丰富的实践资料。

2.加强网络服务平台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社交软件和短视频APP、抖音等成了人们获取知识、了解时事的重要媒介。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应充分运用网络服务平台进行图书馆功能的开发应用,提高图书馆利用率。例如,微信公众平台已融入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读者可以通过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在相应界面进行图书检索、续借,浏览新书推荐、活动公告以及了解图书馆的微服务等;还可通过视频方式与图书馆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了解相关情况。图书馆则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科研与活动资讯,发布读书活动记录,摘录读者阅读心得,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5]。

3.强化资政信息资源的建设。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建设要紧密围绕强化资政信息资源建设,为提高资政能力提供资源支撑。一是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收集、整理、编印资料选编,供教研人员学习、研究、参考。二是打造国情、区情信息数据库,加强对本地区成功经验、统计数据、对策研究等相关信息收集。三是建设资政成果数据库,把主要资政成果及教学转化成果分类整理编印,供相关部门和人员参考,为科研资政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撑和保障。

(四)优化环境,努力提升阅读体验感

为适应现代图书馆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要不断优化环境,拓展服务范围,提高读者阅读的舒适度和体验度。

1.不断拓展图书馆功能。积极适应新时代读者

需求,从传统的藏书、借书、读书单一服务的提供者,向以图书为核心的文化休闲服务的集成者转型,使图书馆成为集“藏书空间”“阅读空间”“社交空间”“休闲空间”为一体的文化休闲综合体^[6]。一是增加开放阅读区,为读者提供一个休闲阅读与思考的空间。二是打造经典图书阅读区,以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为基础,重点打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区。三是搭建娱乐休闲区,通过影视、音乐欣赏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不断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条件允许的图书馆还可以开设咖啡厅、书吧、茶室等新型特色休闲阅读场地,为读者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

2.建立完善图书馆主题空间。图书馆主题空间是指“主题文献馆”,是为满足读者对主题文献信息的需求、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组织馆藏资源并开展多样化的服务、实现图书馆功能的一种新型图书馆^[7]。社会主义学院图书馆应着力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中华文化等方面突出特色,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图书馆主题空间。一是统战特色的图书馆再造,突出统一战线、中华文化、政治共识教育的展示。二是立足当地的统战工作特色,充分挖掘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事件、行业、人物等主题信息资料,打造图书馆主题空间。在装修风格和空间布局上,以主题特色为统领,追求空间效果与文化气息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N].人民日报,2018-12-26(1).
- [2]李彩霞.数字化网络化条件下的图书馆服务创新[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8(4).
- [3]殷玲.图书馆基于新媒体服务方式探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9(3).
- [4]张怀涛,刘巧英.现代图书馆的服务原则与服务内容[J].创新科技,2015(10).

[5]葛陈鸣.高校图书馆营销探索——以“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为例[J].高教论坛,2020(32).

[6]王予典.图书馆文化休闲综合体构建初探[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0(1).

[7]李桂芬.高校专题图书馆建设实践与启示——以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法律研究中心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1(12).

责任编辑:杨绪强